

目 录

前 言	1
导 言	4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工会运动發展情况簡述 ...	4
美国工人阶级及其組織的形成	4
美国工会运动中的两种倾向	9
帝国主义时期美国工会运动中两种倾向斗争的尖锐化 ...	12
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美国工人运动的影响	17
1929—1933年經濟危机和特种蕭条时期的阶级斗争	26
产业工会联合会	30
上 編	37
第一章 战后壟断組織的进攻和工人阶级的斗争	37
处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二阶段的美国	37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壟断組織和美国工人阶级	45
1945—1946年的大規模罢工	51
1946—1948年的經濟“景气”	58
塔夫脫—哈特萊法	58
馬歇尔計劃	65
1947—1948年的罢工	69
从馬歇尔計劃到大西洋集团	72
美国国内政治制度的法西斯化	73
1949—1950年罢工运动的高漲	78

**第二章 美国帝国主义对朝鮮的冒险,美国工人状况
的进一步恶化和罢工运动的新高涨…… 86**

美国軍国主义化的加强…………… 86

經濟軍事化的日益成熟的危机…………… 89

麦卡倫法…………… 94

“紧急状态”,对共产党员和进步工会的迫害…………… 97

麦卡錫主义…………… 104

掠夺劳动者的制度…………… 110

美国工人貧困化的增长…………… 116

美国工人的社会無权地位…………… 119

1950—1951年的罢工运动…………… 127

罢工运动的新高涨…………… 133

1953年的罢工斗争…………… 139

下 編 …………… 143

**第三章 美国壟断組織的代理人在美国工会运动中
的破坏活动…………… 143**

美国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思想影响…………… 143

美国工会运动落后的原因…………… 147

劳联和产联的反动头子們的真面目…………… 150

反动的工会領袖欺騙群众的形式和方法…………… 161

在工会“中立”的招牌下对工人阶级政治利益的
背叛行为…………… 170

反动的工会領袖同美国法西斯組織和警察組織的关系…………… 173

**第四章 美国反动的工会領袖在国际舞台上的
分裂活动…………… 173**

劳联和产联的头子是美国壟断組織的帝国主义
計劃的傳导者…………… 178

美国反动的工会领袖的破坏活动.....	182
劳联和产联的头子是美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统一的敌人.....	185
第五章 美国进步力量反对垄断组织、争取工人	
团结和争取和平的斗争	193
进步力量的增长.....	193
大规模的罢工是“美国生活方式”的特点.....	194
在战斗岗位上的美国共产党.....	199
进步的工会.....	206
保卫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争取工人阶级的统一	219
美国工人阶级和保卫和平运动.....	228
译后记	241

前 言

美国帝国主义现在充当着世界宪兵的角色。它是战争危险的主要来源，是国际反动势力和法西斯主义的最重要的支柱。美国的无产阶级正在国内进行着斗争，目前对和平和各国民族独立的主要威胁正来自这个国家。美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的最重要问题现时所特有的意义就在这里。

美国帝国主义的狂妄的掠夺野心和侵略政策，不是由于它有力量，而是由于它外强中干，无力解决它内部的极其深刻的矛盾。在苏联，经济不断高涨，没有危机，因为它的发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上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美国的经济却不是为社会服务，而是为了保证一小撮垄断资本家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因而陷入日益加深的资本主义总危机，不能自拔。

美国帝国主义者企图逃脱资本主义体系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因而走上了军备竞赛和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道路。美国垄断组织为了打击劳动人民对统治集团反人民政策的日益增长的反抗，正在使国家法西斯化。在美国帝国主义者用来镇压工人阶级的各种势力中，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走狗——反动的工会领袖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帝国主义者用来准备新的世界大战、镇压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急剧降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各种阴谋手段

的武器庫中，分裂工人运动的政策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奉行这种反人民的分裂政策的美国反动工会領袖們，是工人階級統一的主要敌人，是战争挑撥者的帮凶和帝国主义的奴僕。

領導着美国劳工联合会和產業工会联合会的美国反动的工会官僚，一贯忠順地支持华尔街的一切計划和措施。他們徹底而坚决地把自己的命运同美国壟断資本的命运連在一起。如果說美国資產階級也像其他国家的資產階級一样，变得更加反动，失去了同人民的联系，并因而削弱了自己，那末，美国資產階級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美国工会官僚也一模一样。他們越来越反动了，他們在工人群众中越来越不得人心，他們的地位也越来越不可靠和不穩固了。

把持着劳联、产联和鐵路工人工会的反动集团支持美国的侵略的对外政策，因而也对华尔街企圖把人类推向新世界大战的深淵的陰謀負有責任。他們也应对美国壟断資本的反动的对内政策負責，这些政策是：使經濟軍国主义化，殘酷地掠夺劳动者，制訂反劳工的立法，力圖分裂工会，促使美国法西斯化。

但是，美国統治階級及其工会走狗的反动的对内政策和侵略的对外政策的反劳工的本質，已越来越为工人階級广大群众所識破。美国帝国主义在朝鮮軍事冒險的三年清楚地証明，資產階級和工会官僚并不能在工人运动的队伍中煽起沙文主义情緒，并不能以战争歇斯底里迫使工人階級容忍对自己政治权利和經濟权利的进攻。全国罢工运动的高漲令人信服地表明，美国工人决不向壟断組織对工人生活水平和民主自由的侵犯行为妥协。在美国工人階級队

伍中，进步力量逐渐成长和巩固起来，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以后，定将在争取和平和反对美国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取得它应有的主导地位。

由于工业军事化、国内经济危机日益发展和对劳动者进行残酷掠夺而引起的阶级矛盾尖锐化，越来越顽强的阶级斗争，美国工会反动的上层分子与这些工会中的工人群众之间的对抗日益增长。这些就是目前美国工人运动中所形成的那种局势的基础。本书作者的任务就是阐明美国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阐明反动的工会领袖与工人群众之间日益增长的对抗。

本书分导言和上、下编三部分。导言简要地评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工会运动历史的发展。上编顺序论述从1945年底到1954年这段时期中美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特别是罢工斗争的各个发展阶段，并阐明在美国总的社会经济背景上出现的一些现象：经济危机的增长，工业的军事化，工人状况的恶化，国家的法西斯化。下编论述现代美国工会运动的基本问题：美国反动的工会官僚在国内或在国际舞台上所奉行的政策的思想、组织原则和基础。在下编的末尾，对美国工人运动中的进步力量，主要是进步工会，作了评述。本书作者力求通过这样的叙述方法，不仅按照年代的顺序指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各个主要阶段，并能更充分地说明工会的基本问题，阐明造成美国工会运动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落后的原因，更确切地评定美国工会运动中现存的两种力量：一种是目前在美国各工会中占优势的反动力量，一种是进步力量，而未来是属于后一种力量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工会运动 發展情况簡述

美国工人階級及其組織的形成

1775年，北美洲大西洋沿岸的十三处英国殖民地爆發了起义，反对英国的統治。战争持續到1783年，結果这些殖民地取得了独立，并統一为一个联邦共和国，定名美利坚合众国。

以美洲移民的胜利告終的独立战争，加速了美国资本主义关系的發展。这次战争为美国工業無产階級的形成奠立了基础，从而为美国工人运动的發生創造了先决条件。

正是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交替的时期，工人組織在美国出現了。这个时期也是美国罢工斗争的起点（第一次大規模有組織的罢工于1799年發生在費列得菲亞城——簡称費城）。階級冲突十分尖銳，常常达到相当大的規模，并且往往进行得异常猛烈。在費城以及其他許多城市，这种斗争的結果使工人們第一次爭得限制工作日的時間。但是，工人階級的成就大半是不巩固的。虽然罢工运动在繼續不

断地成長，并且越来越有群众性和越来越頑强，但是工人的組織还是軟弱的和不穩固的。它們由于受到政府和企業主的極殘酷的迫害，产生得虽快，瓦解得也同样迅速。而且，它們的活动范围照例不超出个别的城市和工業区。直到十九世紀最后三、四十年間，穩固的全国范围的工会联合組織才在美国形成起来。甚至当它們产生之后过了半个多世紀，即在1949年，美国共产党主席福斯特在評述美国工人运动时还这样写道：“这个运动在經濟方面是比較有力的，而在其他一些重要方面——思想、組織和政治方面，却还是薄弱的。”^①造成这种現象的原因，是美国历史發展的特点，首先是美国工人階級形成的特点。

独立战争虽然加速了国内資本主义的發展，却没有消除阻撓美国建立大工業的一切障碍。首先，美国对英国很大程度的經濟依附还繼續存在。美国的工業依靠英国供給机器設備，而英国的工業家却不願在大洋彼岸出現自己的竞争者，于是想方设法阻撓对美国的机器供应，阻撓美国大工業的發展。妨碍美国工業發展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資本主义已有發展的美国北部和奴隶制的美国南部之間的日益加剧的矛盾。南方的奴隶主都是些种植場主和英国的原料（棉花、菸草）供应者；他們同北方的工業家相反，对于在美国建立一个統一的全国性的国内市场，对于国家的經濟独立以及对于美国大工業的發展，全都不感兴趣。他們用一切方法来維護自己对黑人的奴隶占有和奴隶式劳动的“权利”。工業的北部和奴隶制的南部之間的这些矛盾，終于引

① 参看戈登·福斯特“世界資本主义的末日”，世界知識出版社1953年版，第99頁。

起了1861—1865年的国内战争，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矛盾是如何的剧烈了。北部在国内战争中的胜利，基本上解决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的任务。虽然黑人在法律上的“解放”实际上很少改变南部各州的奴隶制度，但是南部的奴隶主由于在国内战争中的失败，已经丧失了以前对整个国家命运的那种影响。工业发展速度的急剧增长，也加速了工业无产阶级的形成。

但是，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有些情况继续阻滞着美国无产阶级及其组织的形成。这些情况中包括：美国工业工人民族成分和种族成分的复杂，基于工人的流动性以及工人和小资产阶级之间长时期缺乏明显的界限。

美国工业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从一开始就是欧洲的移民，从十九世纪中叶起还有东亚、中美和南美的移民。这样就产生了美国工人阶级民族和种族的复杂性。美国资产阶级向来就利用这一点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煽起纠纷，并阻碍无产阶级的团结。美国资产阶级经常力图把所谓“土著的美国人”和广大的移民群众对立起来。它一贯唆使各个不同民族和种族的移民团体互相仇视。恩格斯在1892年给美国工人运动的一位活动家的信中，在评述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的这一特点时写道：

“……外来的工人被区分为十分众多的民族，他们彼此互不了解，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懂当地的语言。而你们的资产阶级却善于……唆使某一民族去反对另一民族——唆使犹太人、意大利人、捷克人等等去反对德国人和爱尔兰人，并且唆使他们之中每一个人去反对所有其余的人……”^①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俄文版），第44页。

当从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的黑人(他們被迫同意接受任何工作,接受任何工資条件,因而降低了国内工資的平均水平)出現在劳动市場上的时候,资产階級便立刻利用这一形势,唆使所有白种工人去反对所有非白种工人。除黑人外,来自中国、日本、墨西哥、波多黎各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受到殘酷压迫的移民,过去和現在都属于非白种人的范围。种族和民族歧視直到現在仍然是美国統治階級社会政策最卑鄙的特征之一,它加深了国内工人的种族和民族混杂这一事实的影响。

在国内战争以前和战争以后,美国西部夺自印第安人的“自由土地”的存在,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美国無产階級的階級自决。这些“自由土地”吸引了不少因在欧洲極端貧困和沒有土地而来美洲寻找出路的移民,特别是农民移民。他們之中很多人来到美国以后,首先关心的是設置农場,其中有些人被迫当了工人,却常常把自己在工厂里的工作看成是临时的。

形式上每个人都能得到的“自由土地”的存在,使經常有一部分劳动者从东部迁往西部,从而引起了人口流动,妨碍了国内工業中心劳动力的稳定。人口的迁移,一批批新的地区的垦殖,也在長时期內妨碍着工人和小资产階級之間树立清楚的界限;因此,与小资产階級的無产階級化的同时,相反的过程——工人变成独立的小生产者(手工業者和农民)——也起着不小的作用。

当然,远非所有的新农民都能保持住土地,保持住即使是很有限的独立性,而避免淪为雇农。但是,为数众多的工人都想变为农民这一事实本身就已具有重要的意义。工人群众大家都想从这条道路上寻找摆脱自己可怕处境的出

路，这种念头妨碍了美国無产階級作为一个階級而团结起来，它使工人产生了能够用离开工厂走入农村的办法免于資本主义剝削的幻想。从十九世紀中叶起工会和其他美国工人組織的許多活动家所散播的这些幻想，阻碍了同时也不能不阻碍工人的階級自覺的提高。

美国工人階級的形成只是在上一世紀八十到九十年代才完結。这时，“自由土地”已成为最無耻的投机买卖的对象，它基本上已被資本主义壟断組織所攫取，各种农业烏托邦已不复像先前那样对美国工人运动起着小資产階級机会主义影响的源泉的作用。但是，到十九世紀末，机会主义的另一个源泉开始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随着美国从帝国主义以前的时代过渡到帝国主义，美国資产階級愈益有可能用自己的壟断利潤来收买工人的上層，使它和劳动者基本群众对立起来。結果，根据列宁的論断，在美国也如在英国一样，分化出来一个職業的、狹隘的、自私的、冷酷的、貪婪的、市儈的、有帝国主义情緒和被帝国主义收买的、腐化了的“工人貴族”的强大階層。

較劳动者基本群众处于优越地位的“工人貴族”，成了壟断組織对無产階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影响的支柱和主要傳导者。它阻碍着無产階級階級自覺的提高，束縛着無产階級的战斗積極性。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美国工人尚未能建立起坚强的和稳固的工会組織，而从八十年代起，当这种工会組織終于建立后，資产階級化了的無产階級“貴族”上層就吸引这些工会組織与資产階級实行“階級合作”。無产階級的“貴族”上層把工人运动推向毀灭的道路，使工人階級的利益服从华尔街巨头們的利益和領導，使工人階級丧失作为独立

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意义。

美国历史发展的这些特点，妨碍了美国无产阶级广大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在美国工人阶级完全形成以前，国内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已基本上解决，这一事实本身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状况，即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面前不存在某些巨大的、全民性的民主任务”。列宁指出：“……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四十年间，无论在英国，无论在美国，无产阶级都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政治独立性。这两个国家中的政治舞台——在几乎绝对不存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历史任务的情况下——已全部被凯旋的、洋洋得意的资产阶级所霸占……”①

当然，美国资产阶级要尽一切可能来维持这种状况，以便把工人阶级阻留在垄断资本的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治影响的范围之内。“工人贵族”的作用，它的领袖们对工人运动脱离政治和工会“中立”的要求，这些归根到底，就是如列宁所说的，要加强并进而保证“使无产阶级完全服从于资产阶级的政策”。

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条件基本上就是这样。这些条件决定了资产阶级思想对无产阶级的显著影响，因而延缓了无产阶级阶级自觉的提高。这些条件决定了美国工人运动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软弱性，并影响了美国工会的发展。

美国工会运动中的两种倾向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产生的美国工人阶级的第一

① 参看“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社1950年版，第189页。

批組織，基本上是手工業、行會性質的聯合組織。它們開始時主要是擔負互助會的任务。工業的北部在國內戰爭中的勝利既然為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打下了基礎，因而也就加速了工會的成長，為在全國範圍內將工會組織聯合起來創造了必要的前提。全國性的工會聯合組織還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就已產生。例如，全國勞工聯合會在1866年成立，並很快就與第一國際建立了聯繫。可是，全國勞工聯合會也和當時其他許多工會組織一樣，壽命不長，過了幾年就瓦解了。

國內戰爭以後，美國工會運動是在極殘酷的警察迫害的環境下，而主要是在缺乏堅守馬克思主義立場的群眾性工人政黨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這種情況使工人階級的工會組織離開政治鬥爭，離開社會主義運動。此外，美國已出現的社會主義團體和組織在自己的活動中犯了一些極重大的錯誤，這些錯誤使它們脫離群眾而陷於宗派主義的孤立地位。例如，在1877年成立的以馬克思的追隨者左爾格為首的社會主義工黨，並未能變成工人階級的群眾性的政治組織。馬克思主義者在社會主義工黨內不得不進行接連不斷的鬥爭來反對各種機會主義分子和宗派主義分子，因為這些分子促使該黨脫離工人階級的工會組織而孤立起來。美國業已成立的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團體和組織也站在機會主義或宗派主義的立場上。這些條件使形形色色的反動分子易于在工會組織中奪取領導職位。此外，在上一世紀後半期，產生了一些存在最久的和穩固的工會組織，這些工會組織多半是在“工人貴族”的代表人物中間建立起來的。“工人貴族”是工人階級中技術熟練的上層分子，他們不但不進行爭取無產階級全階級利益的革命鬥爭，反而力圖與資產階級妥協。這些情況歸根到底也決定了機會主義傾向的加強，

而机会主义倾向直到如今在美国工会运动中还占优势。

这种在美国工会中占优势、以工联主义著称的机会主义倾向，既不符合美国广大工人群众的利益，也不符合从十九世纪刚开始时就已形成的国内群众性工人运动的战斗传统。

美国向来就是骇人所闻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国家，绝大部分美国工人的状况始终是十分困苦。不仅在十八世纪，而且在十九世纪中，工作日长达十四小时，有时甚至达十六小时。正如美国进步活动家比姆巴在其著作“美国工人阶级史”中所指出的，对于劳动者说来，“身受烙刑、鞭撻和因欠债而坐牢的事情，就是在进入十九世纪以后、工业得到发展的时候也并未绝迹”。

伴随着从十九世纪初起周期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而来的，总是原已低微的工资的急剧降低和使工人及其家庭难免饿死的大规模失业现象。工人只要稍有一些为着有组织地捍卫自己的利益而联合起来的企图，就毫无例外地引起残暴的镇压并往往引起屠杀。还在1876年，访问美国的法国工人代表团团员就已指出：在美国，“人们迫害工会会员，就像疯狗咬人似的”。但是，工人不愿极残酷的镇压，仍然建立了工会，并进行着争取他们的生存权利的斗争。

美国规模巨大的罢工运动的特点，是罢工几乎发生在本国历史的全部过程中，特别是在国内战争时期。

国内战争刚结束以后，立即展开了席卷广大工人群众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运动。与这个运动同时，在1886年出现了发展到顶点的罢工运动的高潮。1886年5月1日，在美国宣布了总罢工，以支持限制工作日为八小时的要求。共有数十万工人参加了这次总罢工。在芝加哥，不断爆发

流血事件。由于罢工工人遭到最狠毒的射击，5月4日在該市广场之一——色納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街头群众大会。有个挑撥者向似乎是被派来为群众大会維持秩序的警察投了炸彈。这场挑衅成了大规模逮捕工人运动活动家的借口。有四个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帕尔松斯、斯巴斯、恩格尔和費歇尔因被誣告杀人罪而被判处死刑并被絞死。但是，这次镇压也如以前在七十年代中期屠杀煤矿工人罢工运动的领导者們一样，只不过反映了资产阶级在不可遏止地發展着的群众性工人运动面前的恐惧而已。

在这一时期——六十、七十、八十年代——中，美国無产阶级曾数次試圖建立代表广大劳动群众的工会組織，以与熟練工人的行会性的工会組織对立。这种試圖的最明显的表現就是1869年劳动騎士会的成立。它起初是一种秘密組織；从1878年起开始公开活动，1886年时已有七十万以上的會員。在九十年代，在煤矿工人、采矿工人、铁路工人中产生了第一批产业工会，其中进步分子的力量是强大的。

在美国工会中反动的、机会主义的工联主义發展的同时，与之对立的进步倾向也在成長。反动的倾向与进步的倾向之間的相互斗争，决定着美国工人运动进一步發展的内容。

帝国主义时期美国工会运动中两种倾向 斗争的尖锐化

美国劳工联合会^①这一作为熟練工人行会性工会的联

^① 1881年建立的“工会联合会”乃是第一个工人貴族組織。从1886年起，它开始称为美国劳工联合会，简称劳联。它是熟練工人的工联主义組織。——譯者注

合組織产生于1881年，它是反动的工联主义最充分的体现。行会性现在仍然是劳联的组织结构和全部活动的基础，它的领袖们顽固地坚持这些古老的原则；这些原则实质上意味着在壟断組織反劳工的統一战綫面前分散工人阶级的力量。劳联的上层领导人物一贯地奉行这样一种政策，其实质在于：维护阶级合作，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迎合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拒絕阶级斗争。

从劳联的創始人葛培尔兹（他未間断地领导劳联达四十多年之久）起，劳联领导者們的叛卖政策的特点一直就是如此。葛培尔兹的政策是分裂工人阶级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把美国“工人貴族”狹隘的自私的利益同無产阶级全阶级的利益对立起来。劳联的领导集团是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中的真正的代理人，它分裂着工人阶级的队伍，并使工人阶级反剝削者的斗争趋于瘫痪。

伴随着美国进入帝国主义时期而来的是工人所受资本主义剝削的加强，無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的發展。因此，尽管劳联的反动头子們夺取了美国工会运动中的統治地位，美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在这一时期却扩大和成長起来了。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全国掀起了罢工和示威的强大浪潮。在罢工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站在阶级斗争立場上而与劳联不同的战斗的工会。其中有在1893年成立的西部开采工人联合会和在1905年成立的“世界产业工人”这一工会联合組織。

“世界产业工人”的建立是由于美国工人阶级对劳联反动领导集团背叛行为的不滿情緒的增長而引起的。“世界产业工人”通过了与劳联的綱領針鋒相对的宣言。这个宣言提出了“爭取消灭雇佣奴隶制的阶级斗争”来反对同资产

階級的‘階級合作’。它主張按照產業把一切工人，無論是熟練工人或非熟練工人，都團結在統一的、共同的組織的隊伍中，以反對按照職業只把熟練工人組織起來的行會性原則。這個宣言摒棄了為勞聯領導集團所堅守的那種工人要支持資產階級兩大主要政黨之一的原則。可是“世界產業工人”的創始者們，一方面公正地摒棄了這個與無產階級利益相抵觸的原則，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另一個同樣與勞動者利益相抵觸的原則：他們一般否認工人階級有參加政治鬥爭的必要，也反對建立群眾性的工人政黨。他們要求工人運動成為純粹經濟性質的運動。

這些重大的無政府工團主義性質的錯誤並不是偶然發生的。這些錯誤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美國工人階級本身當時還沒有有一個能指導它沿着正確道路前進的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世界產業工人”的宗派主義錯誤也是十分嚴重的，這些錯誤使戰鬥的工會活動家們遠離那些加入了勞聯的工會而孤立起來，因而使美國大部分有組織的工人仍繼續處在反動首領們的領導之下。但是，儘管有這些嚴重的錯誤，“世界產業工人”因為領導了美國無產階級一系列的戰鬥發動，曾在美國工人運動中起過顯著的作用。

1905—1907年俄國第一次革命給了美國勞動者以巨大的影響。美國工人運動的先進分子歡欣鼓舞地慶賀俄國的革命事件。“世界產業工人”第一次代表大會在1905年夏季黑海水兵起義後幾天開幕，會上代表們不止一次地在發言中援引俄國工人的英勇行動，認為是值得效法的榜樣。西部開采工人聯合會的領導人、“世界產業工人”的發起人威廉·赫伍德在代表大會上說：“我希望這個工業運動在全國擴展起來，直到把絕大多數工人吸引進來。我希望這些工

人要像俄国工人所已經做了的那樣，舉行起義來反對資本主義制度。”赫伍德的話引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

1905—1907年俄国革命促進了美国工人运动中进步傾向的加強。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美国罢工的浪潮壯大了。侨居美国的、有着丰富的罢工斗争經驗的俄国工人，在这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战争时期，两种傾向之間的斗争極其劇烈和尖銳。反动的工会領袖們完全支持本国資產階級的战争政策，而这时进步的工人組織正領導着群众性的反战运动。在这一时期，在进步的力量中，“世界产业工人”的活动特別積極。“世界产业工人”揭露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質，領導了美国無产階級許多次反战的、罢工的和其他的發动。“世界产业工人”的活动引起了政府方面越来越殘暴的压迫。

1917年9月，“世界产业工人”的許多活动家都被投入監獄。为了对付这个組織的領導人，曾根据專門以鎮压工人运动中的进步力量为目的而通过的“間諜活动法”制造了一次审判。在此以前不久，美国工人运动的进步活动家慕尼和比林斯因被誣告謀杀未遂而被判处無期徒刑。这时美国統治集团支持并大肆贊揚美国劳工联合会反动的領導集团所采取的立場，因为劳联的領導人物是全心全意为帝国主义者服务的。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領袖們在專門發表的宣言中斷言，似乎战争不是帝国主义性質的，而是为了民主的胜利而进行的。劳联領導集团答应禁止罢工，这就是說他們担任了公开的工賊的角色。最后，劳联的領導人在欧洲的工人中展开了一个宣傳运动，力圖保證欧洲的工人支持美国帝国主

义的战争政策。为了这个目的，劳联的执行委员会按照华盛顿的指令组织了一些所谓“工人代表团”到欧洲各个国家去旅行。正当美国工人阶级真正的领导人坐在监狱中的时候，葛培尔兹和劳联的其他领袖们却企图在欧洲劳动群众面前充当美国工人群众的代表，说服他们把帝国主义的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

可是伪装成工人领袖的美国帝国主义的使者遭到了彻底的破产。甚至驻在伦敦的美国大使馆，看到劳联的代表在欧洲工人中印象不佳时，曾建议国务院不要再派遣这样的“代表团”。

劳联领导集团打算在美国工人中散播沙文主义情绪的企图也没有成功，它并没有能破坏美国的罢工运动。仅在1916年一年中，美国登记下来的罢工和同盟歇业达到三千七百八十九次，参加的工人有一百五十九万九千名。1917年罢工次数达到四千四百五十次。

无论是法庭一警察的恐怖，或是劳联领导人的工贼行为，或是沙文主义的宣传，都不能阻止美国工人运动中进步力量的成长。成百成千的工人运动的新战士来接替已经离开队伍的战士。在劳联内部，进步力量也在成长和壮大起来。1916年，曾经试图在劳联的队伍中建立一个进步的国国际工会宣传联盟。虽然当时这个试图没有成功，但过了几年，类似的组织终于建立起来了。

由此可见，美国帝国主义发展的初期所具有的特点就不仅仅是工会运动中机会主义障地的加强，而且还有工人阶级进一步的显著的积极化、战斗的进步的工会组织的发展，不过这些工会组织在思想上还是软弱的。工人运动中两种倾向之间斗争的尖锐化在这一时期不仅影响到工会的

狀況，而且也影响到美国社会党的狀況。由查理·魯登堡所領導的美国社会党的左翼，積極地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該党反动的領導集团。

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 美国工人运动的影响

資本主义的总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發生。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給世界資本主义帶來了致命的創伤。世界資本主义丧失了它先前統一的和無所不包的世界經濟体系的地位。除了世界資本主义体系以外，还有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体系誕生并开始發展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無产階級革命的胜利，动搖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附屬国内的基础。資本主义的总危机表現在以下几个方面：大多数資本主义国家中工業經常开工不足，千百万人由后备的失業大軍变为常备的失業大軍，資本主义世界中社会矛盾和階級斗争急剧尖銳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間，这种經常的工業开工不足和大規模的失業現象，無論哪一个国家都沒有美国严重。甚至在1929—1933年經濟危机的前夕，即正当資產階級經濟学者把美国的經濟狀況描写成“繁荣”的时候，根据極不完全的資料，美国工業企業的开工不足占生产能力总和的百分之十九。根据同一資料，1939年美国工業的生产能力总和中未被利用的部分已达到百分之三十三^①。就是在所謂“繁荣”的时期，国内还是有大规模

① 見“經濟危机与‘冷战’”，美国进步經濟学家代表會議文件彙編，苏联外國書籍出版社1950年版，第65頁。

業現象。在1929—1933年經濟危机当中，失業人数达到一千七百万（几乎有半数工人沒有工作），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十年中，每年平均失業人数也不下于九百万到一千万。

資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还在其發展的第一阶段就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地位發生了深刻的和全面的影響。它也引起了美国工人运动中根本的变动；这些变动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工人运动的全部进程。

美国工人运动中的进步傾向形成并巩固了，进步的和社会主义的两种傾向之間的斗争也在急剧地尖銳化起来。

1919年底，美国产生了两个共产主义的組織。1921年12月，这两个組織合并成立了統一的工人党，后来就叫做共产党。参加建党工作的有美国社会党的左翼分子和进步的工会活动家。共产党的建立对以后美国工人运动的全部發展具有巨大的意义。它促进了国内进步力量的結合，并第一次在美国無产階級面前揭示出階級斗争的鮮明的远景和目标。列宁致美国工人的几封信对喚醒劳动者的階級自觉有很大的意义。这些信揭露了血腥的美国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号召美国工人階級支持并保衛年輕的苏維埃共和国。

1919—1920年，在美国国内展开了与苏維埃俄国劳动者团結的群众性运动。美国工人在好几千个群众大会上要求停止反苏的武装干涉。在美国国内并成立了名为“不許干涉苏維埃俄国！”的專門組織。

美国碼頭工人用示威来拒絕裝載供給干涉軍的軍需品。甚至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内部，不願它的反动領袖們的反对，保衛苏維埃俄国的运动在这一时期也成長和扩大了。当地主波蘭在美、英、法帝国主义者的要求和支持下向年輕

的苏維埃共和国进攻时，保衛苏維埃俄国的运动特別活躍起来。加入劳联的一些工会組織，例如芝加哥、西雅圖等地的工会联合組織，都要求劳联的領導集团宣布以不許美国給地主波蘭提供武器为目的的总罢工。美国干涉軍的士兵在好些場合下都对美国統治集团强迫他們执行的可耻的任务表示不滿和憤慨。

保衛苏維埃俄国的群众性运动在华尔街集团及其劳联工会走卒中引起了恐惧和仇恨，这些人从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初几天起就成了苏維埃国家的死敌。劳联的領袖們散布着最無耻的誹謗，企圖在美国劳动者面前侮辱苏联，抹煞苏联人民斗争的全世界历史意义，从而阻碍美国工人群众阶级自覺的苏醒。反动的工会領袖是反苏的武裝干涉和封鎖的直接帮凶。劳联的領袖們由于对推翻了資本主义压迫的俄国人民瘋狂仇恨，甚至企圖禁止美国工会参加援助俄国飢民委员会。甚至当武裝干涉和封鎖已經失敗，当世界资产阶级想用飢餓之神的手来勒死苏維埃政权的希望已經破灭时，劳联的主席葛培尔茲还繼續坚持不讓美国政府承認苏联。1923年，劳联的头子們还从国务卿尤茲那里获得了一項关于美国將不承認苏联的書面声明。

美国反动的工会領袖打算主持十字軍来不仅反对苏維埃共和国，而且反对全世界工人运动中的进步力量。劳联領袖們在1918年成立的所謂“汎美劳工联合会”，就是局部地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它已成为华尔街为鎮压拉丁美洲国家工人阶级的进步力量及其爭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的輔助机关。劳联的反动的領導人是1919年建立黄色的工賊的国际工会中心(在历史上叫做阿姆斯特丹国际)的發起人之一。美国反动的工会領袖們，也和其他国家的反动的工会領袖

們一樣，他們建立這個背叛的國際，是希望用這個辦法來使蘇聯工會孤立于世界工會運動之外。

可是美國資產階級及其在工人運動中的代理人的任何陰謀都終究無法掩蓋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意義，無法蒙蔽美國廣大的勞動群眾。在俄國工人的歷史榜樣的影響下，美國工人運動中的進步力量日益壯大，無產者群眾為反對壟斷組織而鬥爭的積極性不斷加強。

美國資產階級企圖用恐怖手段來阻止工人運動的高漲。1918年底，在長達六個月之久的審判丑劇以後，“世界產業工人”的一些領導者和積極分子總共被判處了八百零二年的苦役。1919年司法部長巴爾墨組織了“反赤色分子的十字軍”。國內開始了大規模的逮捕。剛剛產生的兩個共產主義組織被迫轉入地下。鎮壓的風暴襲擊着進步的工會組織。殘酷的警察迫害給了“世界產業工人”以沉重的打擊。由於大批的進步活動家被逮捕，這個組織的領導權轉到了反動分子手中；這種情況加速了“世界產業工人”於戰後開始的衰落，在二十年代中“世界產業工人”實際上已不存在。雖然“世界產業工人”的產生引起了美國工人運動的分裂，但是它仍然在往後美國工人運動的歷史上留下了顯著的痕迹。“世界產業工人”規定的把美國工人階級基本群眾團結在工會里并按產業原則加以組織的這一要求，後來成了美國工會運動左翼的主要口號之一，並大受工人歡迎。在罷工鬥爭方面，“世界產業工人”繼承了上一世紀八十到九十年代罷工運動的優良的戰鬥傳統，而且這些傳統至今還繼續存在。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美國壟斷資本家因為不願放棄戰爭年代中那樣的巨額利潤，加緊了對勞動者生活水

平的进攻。这个进攻是同进一步剥夺美国人民的民主权利，同成立财政资本的各种逞凶的反动组织糾結在一起的。美国比意大利和德国先建立了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反劳工组织——美国军团，它的目的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要粉碎进步的工人组织。劳动者以强大的罢工运动来回击壟断组织的进攻。根据十分不完全的统计数字，1918年約有一百三十万人参加罢工，1919年罢工人数超过了四百万。1919年有几次罢工十分猛烈，其中首先是西雅圖的总罢工和鋼鐵工業的总罢工。在这兩次总罢工中特別鮮明地表现了美国工人的日益增長的阶级自觉和阶级团結。

美国太平洋沿岸最重大的海港之一西雅圖的罢工，是以造船工人的罢工开始的，但很快就發展成为这个拥有三十万人口的城市的所有劳动者的强有力的发动。下列这种情况是十分重要的：虽然工人属于各个不同的职业组织，可是在罢工进程中却建立了工人阶级的統一战线。劳联的领导集团激烈地反对西雅圖的罢工，宣布它是“非法的”，但是劳联所属各个工会中的工人却积极参加了这次罢工。这次罢工虽然由于劳联上层分子中的叛徒在罢工者中間展开了破坏活动而被镇压下去，然而它作为下层工人战斗的团結的最初范例之一，是有巨大意义的。

在美国工人运动的老战士威廉·福斯特的领导下所进行的鋼鐵工業工人的总罢工有着更大的意义。这次罢工开始于1919年9月22日，到1920年1月8日为止，持續了三个多月。約有四十万工人参加了这次罢工。它使美国鋼的生产瘫痪了。在这次罢工之前，曾有过一次要把凡是沒有組織起来的鋼鐵工人全部团結到工会里去的运动。鋼鐵工人罢工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巩固这次运动的成果。承認工会并

和工会签订集体合同，在罢工者的要求中占着最重要的地位；过去领导争取把钢铁工人团结到工会里去的运动的全国组织委员会，也领导了这次的总罢工。

罢工进行得如火如荼。工人对“钢铁大王”、政府和反动的工会领袖的统一战线进行了三个半月的英勇斗争。无论猖獗的警察恐怖，或是工贼匪帮，都不能击破罢工者。可是劳联领袖的背叛行为终于使罢工遭到了失败。

劳联当时的主席葛培尔兹向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如下的声明：“您也许不知道我们的工作，我们为保持企业主和工人间尽可能良好的关系所作的努力的性质和责任……我们从不侵犯——我们是绝不会这样干的——财产权或生产管理权。”在声明的结尾，劳联主席提出愿为破坏罢工而效劳。劳联的反动领袖们所想的仅仅是如何从背后来打击斗争着的工人。只有工人的战斗的积极性和他们把罢工进行到胜利的意志，才阻碍着“钢铁大王”来彻底利用劳联领导人背叛工人利益的行为。罢工迫使企业主不能在钢铁工业中普遍降低工资。但是，摆在这个生产部门的工人面前的基本问题——他们的组织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钢铁托拉斯仍和从前一样拒绝承认工会，在冶金工人罢工以后，钢铁工人中工会会员的人数又逐渐减少。

1919—1920年间其他大规模的罢工也遭到失败。大多数工会由于组织结构是行会性的，它甚至不能充分地团结同一产业部门内的罢工力量，更谈不上使不同产业部门间的罢工行动协调一致了。劳联反动领导集团不仅不关心这种协调一致，而且甚至还尽一切可能以“阶级合作”之名来破坏和削弱罢工斗争，使罢工遭到失败。

1919—1920年罢工运动的教训是明显的。这些教训无

可爭辯地斥責了勞聯反動領導集團的政策和工會中的行會習氣。這些教訓無條件地要求戰鬥的策略、在產業原則上改組工會、把非熟練和半熟練工人基本群眾團結到工會里來；實踐証實了美國無產階級最先進和進步的組織原先已作出的那些結論。1919—1920年的罷工運動及其教訓，首先是勞聯的背叛的領導集團的被揭破，以及美國工人階級為保衛蘇維埃俄國而進行的鬥爭，促進了工人群眾階級自覺的提高，並促使勞聯內部與共產黨產生的同時，或在共產黨領導下，產生了革命的工會反對派。

例如，1920年勞聯內部成立了工會宣傳同盟。現在美國共產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威廉·福斯特在工會宣傳同盟的組織建設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工會宣傳同盟在和勞聯不斷絕組織關係的情況下，在加入勞聯的工人群眾中做了很多的工作。它領導着爭取按產業原則改組工會、爭取以階級鬥爭的精神教育會員、爭取建立工人階級的政治組織的運動。它不倦地揭露勞聯領導集團的反動性質並系統地向美國勞動者闡明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意義。它不顧反動的工會領袖們的反對，展開了派遣工會代表團訪蘇的運動。有數十萬勞聯的會員，不顧勞聯領導集團的壓制，支持工會宣傳同盟，並參加同盟的工作。

工會宣傳同盟的活動主要是從1921年的經濟危機到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之間這段時期中。這是資本主義相對的、局部的和暫時的穩定時期。

美國從1923年起進入工業的和交易所的“景氣”——急劇活躍的時期，這個“景氣”是由於美國資產階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所發的橫財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引起的。美國的資本所以有巨額的積累，一方面是由於在四年戰爭

中間按投机价格向欧洲交战国家供应軍火，另一方面是由于在战争期間和战后最初几年同样按投机价格向这些国家出售粮食和其他日常消费品（当时被战争破坏了的欧洲感到食品和消费品極其缺乏）。同时，这也为美国夺取西欧市場以及新的殖民地市場打下了基础。这个过程，因为战争强使資本主义世界的金融中心从倫敦移至紐約和西欧对美国的金融依附的增長，得以加速和巩固。最后，不仅美国大資產階級，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中等資產階級因战争而大發橫財，也引起了战争时期和战后最初几年中对国内市場的需求的增加。美国商品的国内市場和国外市場的扩大，刺激着美国工業方面和資本主义生产“合理化”方面投資的增加。

这个經濟“景气”的基础是十分不穩固的。生产“合理化”是靠急剧加重对工人的資本主义剝削而进行的。美国無产階級絕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日益增長，劳动者——美国消費者的基本群众的購買力不断降低。同一时期中西欧資本主义相对的和暫时的稳定也加强了威胁欧洲市場和殖民地市場上的美国商品的竞争。因此，在美国的“繁荣”的外表的背后，在这个“繁荣”本身所造成的条件下，灾难深重的危机的前提日益成熟。

但是，美国資產階級的經濟学家、政論家、政治活动家，也和工会与社会党的反动領袖們一样，力求尽一切可能利用二十年代中期的經濟形势来从思想上影响無产階級，以达到破坏工人运动的目的。美国資本主义的思想家頑固地企圖使劳动群众相信，似乎美国的資本主义制度充滿着力量，本身蘊藏着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最大可能性。他們在十字街头鼓吹說，在美国条件下工人似乎可以成为資本家，那

些直到現在一直在忍受着失業、貧困和殘酷的血汗剝削制度的工人，也將很快獲得“繁榮”的果實。

1928年底當選總統的胡佛宣稱，他執政的任務將是不折不扣的“消滅貧困”。反動的工會領袖們心甘情願地為這個無恥的蠱惑家宣傳，他們硬說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被推翻了，工人信仰的不應該是馬克思，而……應該是汽車大王福特——血汗制度的創始人。鑽進美國共產黨隊伍中的叛逆、變節分子正是以這種面目出現的。他們的領袖澤依·洛夫斯頓以篡改了的馬克思主義詞句發表了一套美國帝國主義“例外論”的謬論，似乎美國帝國主義管保不會發生危機似的。反動的工會領袖和洛夫斯頓之流的叛徒中的福特崇拜者，企圖解除美國無產階級的武裝，從思想上和組織上解除它的武裝。

這種對工人階級思想上的破壞行為也留下了痕跡。到二十年代中期，美國罷工運動開始減退，工會會員人數下降。企業主抱着破壞工會的目的，在工業中培植了自己的、由工業公司的代理人領導的所謂“公司工會”。

在這種情況下，進步的工會宣傳同盟及其鼓舞者共產黨的活動具有極重大的意義。工會宣傳同盟促進了工人的階級自覺和組織性的增長。

共產黨驅逐了洛夫斯頓和在他以前的托洛茨基分子凱能，進而堅忍不拔地團結了黨的隊伍，清洗了叛徒。洛夫斯頓及其美國帝國主義“例外論”的謬論被徹底揭破了。美國工會運動的進步力量對資產階級及其工會走狗的有害的思想影響進行了頑強的鬥爭。用鎮壓的辦法來消滅進步力量的企圖，並沒有成功。相反地，進步力量的影響增長了。進步力量越來越緊密地和群眾聯繫在一起，并使無產階級有

准备地去迎接工人运动的新高涨，即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特种萧条时期扩展起来的新高涨。

1929—1933年经济危机和特种萧条 时期的阶级斗争

1929年秋开始并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础上扩展起来的世界经济危机，以特殊的力量打击了美国。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经历过像美国那样工业生产一落千丈，也没有一个国家产生过像美国那样庞大的失业后备军。这一时期国内的阶级矛盾急剧地尖锐化起来了。美国劳动者反对资本主义奴役的斗争的特点，不仅是极其紧张，而且是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这个斗争表现为规模宏大的示威、有数十万失业者参加的反饥饿游行，表现为强大的和长时期的罢工、农民的罢工。1929年，由工会宣传同盟改组成的工会统一同盟在这个运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从1928年中期起，工会宣传同盟就已在那些因为劳联领导集团的叛卖活动而没有工会或工会十分软弱的工业部门中着手组织工会。1928年9月，工会宣传同盟按产业原则组织了全国矿工联合会和全国纺织工人联合会，四个月之后又组织了产业性的组织工人联合会。1929年8—9月在克利夫兰（俄亥俄州）举行了进步工会代表大会，共有十八个州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劳联所属工会中左翼反对派和無组织的工人也有代表参加，会上成立了独立的进步的工会中心——工会统一同盟。同盟的总书记是威廉·福斯特。

这个新的组织首先是作为美国无产阶级罢工运动的领导者出现的。1931年宾夕法尼亚四万矿工的罢工就是在进

步工会领导下进行的最大的罢工之一。加入了工会统一同盟的全国矿工联合会，领导了数万矿工为反对企业主集团、政府机关和劳联反动工会领袖而斗争。

因全国矿工联合会影响扩大而惊惶不安的企业主力图不惜任何代价来镇压罢工。为数众多的工贼匪徒在警察的保护下被派到因罢工而瘫痪了的矿上去。还在罢工最初几个星期内就有几百名罢工者被逮捕，其中有许多人被判了各种期限的徒刑。两千多工人遭到毒打和身受重伤。不下十万成年男女和儿童被从他们居住的、属于煤矿公司的房屋里赶到街头，他们在公司的铺子和其他商店里赊购货物的信用也被剥夺了。企业主妄图用饥饿来粉碎工人的反抗。

镇压并没有能损害矿工的斗争精神。“已经获得这样成就的工人能够勒紧裤带，为争取自己最低限度的生存权利而斗争”的口号深受工人欢迎。于是剥削者就采取欺骗手段。企业主集团和劳联反动领袖们终于破坏了这次罢工并迫使罢工者复工，哄骗罢工者说他们的要求将会得到满足。长达数月之久的宾夕法尼亚煤矿工人的罢工虽然失败了，却给美国工人的广大阶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证明了即使是在存在着大规模失业现象的危机时期，罢工也是完全可能的。

美国太平洋沿岸最大的港口旧金山于1934年爆发的、为了声援罢工的码头工人和海员而举行的总罢工，具有重大的意义。政府企图以武力镇压罢工，把军队派遣到太平洋海岸。有八个码头工人被枪杀了。但是，罢工者队伍的统并未因此破坏，政府和企业主不得不接受罢工者的要求。这次罢工在实际上为美国太平洋沿岸海员和码头工人中间的进步的工会运动奠定了基础。这次罢工同时还推动

了美国罢工斗争的进一步开展。罢工运动与美国工人其他群众性的战斗发动结合起来。

共产党和进步的工会组织从经济危机的最初几天起就加强了在失业者中间的活动，说明工人只要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就能够减轻他们所受的灾难。共产党人从1929年12月起成立了一些失业者联合会，并在工业中心举行了失业工人的示威。在1930年3月6日即国际反失业斗争日，党员人数尚不多的美国共产党已能领导一百多万人在纽约、芝加哥、底特律和美国其他许多城市举行示威。不顾警察的最残暴的恐怖，这些示威终于举行。只是纽约一处，为了对付失业者，出动了一万八千名警察和七千名消防队员，美国军团^①雇用的匪徒还未计算在内。由于警察和黑帮匪徒对工人的许多次攻击，有几百人受了伤。许多示威者被逮捕。但是，1930年3月6日的示威起了重要的作用，帮助群众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这些示威强有力地推动了失业者进一步的斗争。

1931年下半年在一些工业中心由地方的失业者联合会组织了反饥饿进军。参加反饥饿进军的有数十万工人。虽然由于警察恐怖，许多工人被杀害，好几百工人受伤和被捕，但1931年12月间终于有可能举行第一次全国失业者反饥饿进军。这次反饥饿进军的参加者都是在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和从芝加哥到墨西哥湾全国各地举行的成千上万次

① 美国军团是美国的一个反动的退伍军人组织，由美国一些陆军军官(包括大资本家的代表)于1919年在巴黎商定成立。美国军团向来积极反共，亲法西斯。它公然用恐怖、劫掠、暗杀、私刑、破坏等手段对付进步人士和工人领袖，并在各地随时组织警察，协助政府破坏罢工。——译者注

群众大会上选举出来的。他们的任务是向国会提出一些要求，首先是关于立即援救失业者和在美国实行国家对失业者的社会保险的要求。

这次进军在一定的程度上触及了全国所有的工业中心。虽然国会和总统拒绝考虑由失业者进军的参加者带到华盛顿的各项要求，但这次进军的意义仍然是十分伟大的。它为工人阶级一连串的新的群众性发动打下了基础。

在这些发动中起极重要作用的是失业退伍军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加者的进军。被失业和贫困逼到完全绝望程度的退伍军人动身到华盛顿去，企图得到政府的救济。这次进军的发起者是受美国共产党支持的前军职人员工人联盟。但是由于这次运动参加者的社会成分复杂，其中有工人、破产的农民和破产的小店主，以致退伍军人特别在初期是处于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领导之下。因此，当进军的参加者到达华盛顿时，警察机关便得以把自己的直接的走卒派进去领导这个运动，他们用一切办法力图使前军职人员工人联盟和共产党人脱离退伍军人群众而陷于孤立。然而随着运动的发展，运动开始摆脱反动分子和警察奸细的控制。于是美国垄断资本和唯命是从的政府赶紧采取措施来武装镇压退伍军人。1932年7月28日，步兵在机枪部队和坦克的支援下向和平的退伍军人展开进攻。这次对贫困到极端绝望程度的、美国军队的前军职人员的骇人听闻的镇压，是由作为美国人民以及菲律宾和朝鲜人民的刽子手而臭名远扬的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

继这次在国内产生巨大影响的退伍军人的发动之后，接踵而至的是1932年12月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失业者反饥饿进军。席卷着千百万失业者的日益发展的运动与罢工斗争

的積極化同時發生了。社會衝突的緊張達到極端尖銳的程度。在美國形成了一種威脅着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形勢。驚慌失措的美國大資本主義集團為了尋求解救的出路，把羅斯福提任為總統，把如斯大林所說的“在私人資本主義活動的基礎上，在不改變經濟基礎的條件下來清算危機”的任務放到羅斯福的面前。

當然，這個任務是無法解決的：不消滅產生着危機的資本主義，就不能消除經濟危機。於1933年3月危機已經開始讓位給特種蕭條時就任總統的羅斯福的政府，實際上只企圖減輕對資產階級有害的危機的社會後果。正是抱着這個目的，羅斯福政府提出了所謂“新政”，並於1935年實行了華格納的勞工關係法^①，這個法案在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從法律上迫使企業主承認工會，不阻撓工會的活動並與工會簽訂集體合同。

產業工會聯合會

羅斯福政府在社會立法方面所採取的措施並沒有使美國勞動者的狀況發生重大的變化，他們繼續遭受着壟斷資本的殘酷剝削。但是，在羅斯福時期，作為統治集團對群眾壓力的不得已讓步的立法和由這些讓步而引起的罷工運動

^① 這是美國一個比較民主的勞工關係法，本名“全國勞工關係法”。1935年7月5日由參議院民主黨議員華格納和眾議員康納雷提出，經國會通過。法案規定了最低工資和工作時間，同意工人組織工會、參加罷工或自願仲裁等權利。在這個法案實行期間，反動派屢次提出另外法案來破壞它，如凱斯法案，等等。到1947年杜魯門執政時期，產生並通過了塔夫脫—哈特萊法，工人從華格納法所得到的權利全被剝奪。——譯者注

的大大高漲，為美國工會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工人不僅踊躍地加入當時已經存在的各個工會，而且爭取在托拉斯化了的美國工業部門，如鋼鐵工業、汽車工業和其他工業的工人中建立新工會的運動也發展了；工會統一同盟在這些工業部門中所進行的巨大工作也促進了這個運動的發展。主要靠最受危機殘害的非熟練工人和半熟練工人群眾而產生的工會運動隊伍的擴大，工會統一同盟的活動和影響的增長，改變了美國勞工聯合會內部的力量對比關係。1935年春工會統一同盟所通過的關於該同盟所屬進步工會的會員可自行退出並加入勞聯所屬相應的工會的決議，大大促進了力量對比關係的改變，提高了勞聯內部進步力量的比重和影響。

在勞聯的隊伍中展開了反對勞聯領導集團反動政策的運動，參加這一運動的不僅有進步力量（在其本身的活動中反映了美國工人階級廣大群眾的憤慨和積極化），而且有相當一部分“工人貴族”。1929—1933年的危機在美國資本主義的歷史上第一次不僅給勞動者廣大群眾，而且給工人的“貴族”上層以殘酷的打擊。在先前的危機期間工人階級的這個上層因失業而受苦難的情況比較少，而在三十年代中美國失業的熟練工人共達九十萬人，此外有四十六萬熟練工人是作為半熟練的、甚至非熟練的勞動力而工作的。於是很自然地，“工人貴族”中間也出現了顯著的不滿情緒，其中一部分還轉入了已經在勞聯內部形成的與反動領導集團的立場相對立的反對派的陣營。

為了將這一陣營聯合起來，就要求用把無組織的工人群眾組織起來和按產業原則改組工會的辦法來加強工人階級的陣地。進步力量一貫地捍衛着這個綱領；它所提出的

要求向来就是美国工会运动左翼的中心口号。“工人贵族”中具有反对派情绪的这一部分人之所以暂时支持这个纲领，是因为他们打算借着玩弄这些在群众中受欢迎的口号，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以便与企业主集团进行更顺利的交易。领导运动的主要是这样一些工会，它们是与在劳联中占统治地位的行会性组织原则相对立的产业性的工会，首先是巨大的矿工的产业工会。这些工会的许多领袖虽然是反动的，但他们为了不失去对他们所领导的工会会员的影响，不得不附和着这个运动。他们从一开始就打算趁适当的机会把这个进步的运动扭转上旧的、机会主义的道路。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反对劳联上层人物的行动中表现了不少的主动性，乐意充当与劳联上层人物不可调和的反对派的领袖，力图夺取建立群众性产业工会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工会统一同盟的宗派主义错误对他们也有不小的帮助。1935年以前工会统一同盟在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属的工会中没有充分进行工作，这妨碍了它对劳联中的反对派的领导，虽然这个反对派是在工会统一同盟的口号下行动的。结果，在进步力量起最积极作用的反对派阵营的领导人中间，鑽进了一些反动的工会领袖，其中起最重大作用的是联合矿工工会主席、蛊惑家约翰·路易斯。

1935年10月在大西洋城召开的劳联第五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近百分之四十的代表支持反对派的进步纲领，而同年年底支持这一纲领的联合矿工工会和其他七个工会还专门设立了产业工会委员会。它的任务是在工人几乎完全没有组织起来的最重要的重工业部门中建立新的群众性产业工会。

负有这种任务的委员会的设立，比大西洋城代表大会

上反对派的出現，更加使勞聯上層人物惶恐不安。勞聯的头子們因为害怕新的產業工会將大大地加强反对派，害怕反对派將夺去他們在勞聯中的領導地位，在1936年就要求解散產業工会委員會并取消委員會所已經建立的一些新工会。当这些要求遭到拒絕以后，他們就开始走上分裂的道路，把所有支持產業工会委員會的工会从勞聯中开除出去。这样就建立了美国第二个全国性的工会中心，它在1938年匹茨堡代表大会上最終形成并名为產業工会联合会^①。

產業工会联合会把数百万最受压迫的、受到特別殘酷剝削的非熟練工人和半熟練工人联合在工会里。產業工会联合会也和產業工会委員會一样，在把美国劳动者广大群众吸引进工会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在美国重工業的主要部門中建立并巩固了工会組織。还在1940年初，產業工会联合会就联合了四百万以上的工人。

在美国工業的首要部門中出現巨大的產業工会是美国工人运动的發展上的重要轉折点。这些產業工会的出現为开展反对叛卖的“階級合作”、反对資產階級对工人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的斗争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但是这些可能性并没有实现。

產業工会联合会联合了美国工会运动中战斗的和最积极的力量。可是这些力量还缺乏思想上的一致。他們没有一个共同的明确的綱領，不少人还有意造成一种虛幻的希

① 1935年建立的“產業工会委員會”，是一个新的、联合非熟練工人和半熟練工人的群众性的產業工会。1938年改名產業工会联合会，简称产联。产联成立时是一个进步組織，美国共产党在协助建立产联中曾起了不少作用，但由于壟斷資本家的陰謀以及白勞德路線的錯誤，产联領導权逐漸落入右翼分子之手。——譯者注

望，似乎“新政”所特有的資本主义国家对劳資关系的干預（实际上反映了政府机构日益直接服从于壟断組織）会解决摆在工人阶级面前的問題。此外，产联中除了进步的力量，还有着从劳联轉移过来的具有“反对派”情緒的“工人貴族”集团和与这些集团联系着的、繼續奉行“阶级合作”政策的工会官僚。最后，准备建立产联并保証其巩固的罢工战斗的浪潮，把加萊和路德之流的各种冒險主义分子帶到了浪头上，他們赶紧混入新的組織以求个人的升迁。由此可見，产联从一开始起就分成了代表进步力量的左翼和实际上是劳联領袖和华尔街的代理人的右翼。

在整个战前时期中，左翼在产业工会联合会中有更大的影响。由此产生了这一时期中产联政策的进步方針和它的战斗的策略。

还在产业工会委员会的活动中就已表現出来的左翼的影响使該組織的右翼集团大为不安，以致委员会的某些领导人，例如女裝縫紉工人工会主席杜宾斯基拒絕加入产业工会联合会，并于1938年和他們所領導的工会一起返回劳联。1940年根据同一根本原因，产业工会联合会第一任主席路易斯与产联絕裂了，而他所領導的联合矿工工会也在他的压力下退出了产联。路易斯辞职以后，他的职位轉入另一个反动的工会官僚、另一个出身于美国劳工联合会上層人物的分子莫萊的手中。莫萊力求适应产联内部現存的状况。他的最終目的是把这个組織攬为己有，以便把它轉上劳联所走的出卖工人利益的道路；因此，他在初期举止十分謹慎：保持他那种中派立場，穩立在左翼和右翼之間，避免和进步力量發生冲突并小心地隱藏自己的反动观点。

產業工會联合会若干年来在美国工人运动中具有进步的意义。产联的建立表明：尽管美国资产阶级对劳动者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尽管有反对工人运动的法庭—警察恐怖和对工人运动活动家不止一次的血腥镇压，美国统治阶级都未能阻碍把工人组织进产业工会内的工作和整个工会运动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美国工会已成为对国内政治形势发生着重大影响的巨大的社会力量。

由于一般不允许成立工会的企图遭到失败，美国资产阶级就试图至少要极其严格地限制工会组织扩展的范围。美国资产阶级想要为“工人贵族”狭小的首脑阶层保证对组织的垄断权，因而把“工人贵族”和没有参加组织的广大工人群众对立起来，使工人运动陷于分裂。但是，资产阶级并没有能够阻挠主要工业部门中群众性工会的建立。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工会会员还不到美国雇佣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可是在煤矿、冶金、机器制造、铁路、公路运输和海洋运输这样一些主要生产部门中，绝大多数工人已经组织起来了。

这些部门的基本群众（不包括铁路工人）已经组织在一些同时联合着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产业工会里。美国工人运动的进步力量始终捍卫着这一按产业组织工会的原则，把产业工会组织看作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分裂政策的支柱，是无产阶级统一的支柱，是把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联合起来的保证。产联的建立给这种联合提供了基础和广泛的可能性。由其左翼鼓舞着的产联政策的进步方针是争取实现这些可能性的方针。

类似的前景引起了资本主义反动阵营中的惊慌失措。

从产联一成立起，壟断集团就为反对产联的进步政策、反对它的左翼进行了殘酷的斗争。壟断集团經常获得产联右翼領袖的秘密支持和莫萊的所謂中派集团的秘密协助。但是这个反动的运动在战争以前并没有获得成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中，反法西斯德国的武装斗争的国际环境、苏联在这一斗争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促进了美国进步力量的成长和影响。因此，莫萊及其周围的人 and 先前一样力图避免同产联左翼发生冲突，以便左翼不妨碍他们一步一步地巩固右翼集团的障地。但是，当战后美国国内状况发生了变化时，莫萊集团就同冒险家加萊和路德这样一些反动的右翼的领导人联合起来，并在华尔街的直接帮助下展开了殘酷地迫害那些属于产联左翼的工会组织的运动。

与产联领导抛弃过去的进步方针并公开支持壟断组织的侵略计划的同时，在产联中所发生的这一变化，实质上是為了反对美国無产阶级的統一。这一变化是美国工人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中所处的环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上 編

第 一 章

战后壟断組織的进攻和工人階級的斗爭

处于資本主义总危机第二阶段的美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了帝国主义陣营的經濟、社会和政治矛盾的进一步尖銳化，加深了資本主义的总危机，开始了世界資本主义体系总危机扩展的新阶段——第二阶段。伴随着战争而来的是，社会主义体系和資本主义体系之間的力量对比發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进一步急剧的变化。“战后时期是世界資本主义体系进一步削弱和民主与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壯大的时期。”^①

苏联对德国法西斯及其同盟者的全世界历史性的胜利，在很大的程度上增强了苏联的实力，提高了这个偉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国际威信，因为它从法西斯蹂躪者的鉄蹄下拯救了世界文明，从而贏得了亿万人們的热烈的尊崇。

^① 見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頁。

苏联所奉行的保衛和平和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政策，愈益加强了人們对它的尊敬。全体进步人类都支持苏联的和平政策。

苏联現在再也不是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那样是唯一的消灭了剝削者統治的国家了。今天，地球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經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桎梏，从帝国主义剝削制度的鎖鏈下解放出来。中欧和东南欧几个国家已經脱离了資本主义体系。帝国主义在亞洲的陣綫已經被突破。在中国、朝鮮、越南这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誕生了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的偉大胜利，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在長时期的英勇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殖民地和附屬国的巨大規模的民族解放运动，都証明今天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实际上正在日趋瓦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摆脱了帝国主义体系的欧洲和亞洲的国家，联合成为一个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陣营，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陣营相对立。过去統一的、無所不包的世界市場業已不复存在。两个平行的、同时又是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場形成了。統一的世界市場的瓦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經濟方面的最重要的結果，它进一步加深了資本主义的总危机，因为战后資本主义剝削和殖民地掠夺的世界范围大大地縮小了。

当然，在業已縮小了的資本主义世界的范围中，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还是能够依靠牺牲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来暂时扩大它的商品銷路并一般地加强它的經濟和政治的地位。美国帝国主义利用它的主要的竞争者——英国、法国和在战争中被击潰了的德国、日本、意大利的被削弱，在战后攫取了相当大一部分世界資本主义市場。美

国帝国主义破坏了历史上已形成的各资本主义国家間的多方面的經濟联系，而代之以这些国家与美国單方面的联系。美国帝国主义推行着迫使西欧和东欧隔离的政策，而东欧向来就是西欧国家銷售其大部分工業产品以換取粮食和原料的地方。美国壟断組織打着“援助”的幌子，滲入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經濟，夺去了英法兩国的殖民地的原料和銷售市場。但是英国，跟着英国的还有法国，都在竭力掙脫美国的束縛，以便保証自己独立自主的地位和在世界市場上有保障英法兩國壟断組織获得高額利潤的地盤。美国和日本之間，美国和意大利之間，美国和西德之間，也都同样存在着極其尖銳的矛盾。

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尖銳化的同时，美国帝国主义本身一切極重要的內部矛盾也尖銳化起来了。

世界资本主义市場的縮小，必不可免地使资本主义国家工業生产机构开工不足的現象愈加扩大。美国壟断資本家曾經指望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結果不仅能控制世界资本主义很大一部分市場，而且能控制世界一切市場。他們想統治全世界。但是，他們的打算落空了。因而美国壟断組織的生产能力和战后时期它們所生产的商品的銷售能力之間的矛盾就急劇地尖銳化起来。

在整个战后年代中，美国工業总产值始終落后于它在1943年战争时期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同时，美国工業的生产能力在这几年內有相当的增長，那主要是由于在战后一直沒有停止过軍备竞赛。根据官方的材料，美国加工工業的生产能力从1945年到1952年增長了百分之五十。因而很明显，企業开工不足的現象，美国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也沒有排除，現在比战前时期更为严重了。

也和在前战一样，美国现在是经常有大规模失业的典型国家。根据官方统计机关的统计，在战后时期，美国每年平均完全失业人数已达二百万人以上。但是，这一数字还没有表明目前美国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不足的情况。要表达这种劳动力使用不足的实际规模，还要将这二百万的数字增加一倍，因为美国武装部队在1946—1953年每年平均人数较战前年代约多二百万人。其次，即使对于这个数字，还应当再加上五百万——这是官方统计任意从失业者范围中划出的那一部分人的每年平均数字。官方统计有这样的借口：或者是说虽然这些人没有工作，但是似乎他们并不找工作；或者是虽然他们在找工作，但是却不可能找到工作；或者是，他们尚未工作；或者是，他们似乎只是“暂时”被解雇或正在等待已经“允诺”他们的工作。最后，应当注意到美国在战后年代局部失业现象的普遍增加，并且在局部失业者中间有不少人每周只有几小时的工作，或者甚至……每周只有一小时的工作。在1946—1953年这一时期内，根据官方的材料，每年平均局部失业的人数将近九百万，但实际上比这个数字多得多。而且上述现象还是出现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即由于军事订货大量流入，美国许多工业部门已呈现出活跃的景象。

不用说，美国生产力的经常的“过剩”具有相对的性质。它是由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所决定的。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在美国也像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生产不是为了满足居民的需要，而是为了保证一小撮资本主义剥削者的最大限度的利润。在苏联没有剥削者，由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因而苏联没有“过剩的”生产

力，沒有企業开工不足和失業現象。相反地，在美國，也如在一般資本主義條件下一樣，“過剩的”生產力、“過剩的”生產能力和“過剩的”工人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要保證剝削者的最大限度利潤就只能依靠不斷地掠奪受資本主義支配的各國的人民群众，而對群眾的掠奪就必不可免地又使得人民購買力降低。

勞動者日益增長的絕對貧困化和相對貧困化，一小撮剝削者和工人群眾之間階級矛盾的不斷加深，是現代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必然的產物。美國的实际情形處處都証實了這一點。

根據對美國官方統計材料進行批判分析的蘇聯經濟學家的統計證明，占美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勞動者的工資和一般收入的總額，在1920年，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之後，為美國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二點五；到1940年，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美國國民收入中勞動者的份額降低到百分之四十七點四，而到1951年又降低到百分之四十一點九^①。由此可見，在這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群眾貧困化的過程不僅不停歇，而且不斷迅速地擴展着。越來越大一部分的國民收入，越來越大一部分的社會勞動的產品，都被資產階級以利潤的形式攬為己有；同時在資產階級的陣營中，掌握在一小撮億萬富翁手中的利潤、財富和經濟資源的集中過程也迅速地擴展起來。

甚至根據業已縮小了的官方材料，美國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利潤，從1938年的三十三億美元增加到1951年的四百二十九億美元（納稅前），即增加了十二倍。1953年，根據

① 見蘇聯“經濟問題”雜誌，1952年第6期，第77頁。

官方机关的初步計算，美国資本主义壟断組織的利潤已达四百四十六亿美元。在战后七年中，美国壟断組織的利潤已达到龐大的数額——二千四百亿美元以上。这种神話般的以極大的速度日益增長的利潤，基本上是大壟断組織集團——六十个家族、四百个銀行家、制造商和鐵路大王的收入。他們控制着美国的經濟，并对美国的对內和对外政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整个美国工業生产几乎有半数是在最大的企業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最大的企業內集中了美国加工工業所利用的全部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有二千四百五十家独立的工業公司倒閉，而它們的共值五十亿美元以上的资产，已轉归壟断的托拉斯占有。壟断組織这种吞并数百个次大公司的速度在年复一年地增長着。在1940—1947年这段时期中，平均每年有三百六十家公司不复独立存在。到这一时期末尾，平均每年被壟断組織吞并的商号更达到五百家。此后，被吞并的商号的数目愈益增加，而到1951年年終时，每年轉到壟断組織手里的商号約达七百五十家。亿万富翁所有公司的总数从1941年的三十二家增加到1952年的六十六家。

美国的整个經濟現在实际上是操縱在拥有全国所有公司半数资产的、構成美国壟断資本的核心的一百五十家最大的公司的手里。这二百五十家最大的商号又为拥有这些商号三分之二资产的八个資本主义集团所控制。最后，在八个主要集团中，以摩根、洛克菲勒和杜邦家族为首的三个集团占居統治地位。

正如联邦貿易委员会1948年發表的报告对美国狀況的特点所論述的，美国壟断組織不仅將“一切經濟活动形式”

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且还把美国的国家机关也掌握在自己手里。銀行家、制造商、壟斷康采恩的經理和法律顧問已經挤进了職業政治家的行列，現在完全公开地指导着政府最重要机关的活动。美国亿万富翁及其主要的組織——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直接支配着資產階級的国家，直接行使着国家政权。

列宁早在1917年就曾指出，这种国家壟斷資本主义，对工人說来是苦役，而对資本家說来則是天堂。美国今天的情况正是如此，区别仅仅在于，在美国，也像在任何其他資本主义国家一样，工人受压迫和資本家發財致富的情况，在現在要比三十六年以前更加無比地駭人听闻了。

主要是由劳动者繳納的稅額的急剧提高，旨在降低实际工資的立法和国家的各种措施，都是筹措軍事定貨撥款的主要手段。而軍事定貨則是現在壟斷康采恩的神話般利潤最重要的来源。壟斷組織所控制的美国国家机器及其預算，是今天美国資本家掠夺劳动者的最重要的工具。

馬歇尔計劃、对所謂落后地区的“援助”、对参加北大西洋侵略集团国家的軍事“援助”，也是华尔街所直接控制的国家政策的特征。支脉广布、席卷半个世界的“美援”体系，實質上是美国壟斷組織用来奴役和駭人听闻地掠夺其他国家、特别是殖民地人民而大發橫財的工具。

但是，战争和法西斯主义才是美国壟斷組織的政策的主要内容，才是美国壟斷組織的計劃和意圖的實質。

美国統治集团要在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上，为美国帝国主义和世界帝国主义無法摆脱的矛盾寻求出路，来挽救世界資本主义体系。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結果并没有使美国能够如摩根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所打算的那样来

瓜分世界，也就是說沒有取得世界霸權，所以美國壟斷組織今天正在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以求達到這一目的。美國壟斷組織企圖挽救歐洲的資本主義和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殖民地統治體系，就把美國推向戰爭的道路。華爾街的統治者們認為無論是對於實現它的奴役東半球的計劃來說，或是對於鞏固美國本身的剝削制度來說，這都是必要的條件。美國帝國主義既然在凡是對它存在着危險的地方竭力挽救資本主義和殖民地統治體系，也就成了世界反動派的支柱。美國帝國主義肆無忌憚地步着德國法西斯的後塵，企圖破壞和消滅世界工人運動，摧毀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準備對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發動戰爭。

最後，美國壟斷組織急不可耐地熱中於軍事定貨，也把美國帝國主義推向戰爭的道路。目前，軍事定貨在美國主要工業部門中起着決定性的作用。1937-1938財政年度的軍費支出僅占美國國家預算的百分之十四，而現在竟達整個預算支出的百分之七十四。軍費支出和軍事定貨是戰後屢次延緩經濟危機到來的兩個最重要的因素。

當然，歸根到底，經濟的軍事化並不能保證避免危機。但是，壟斷集團沒有什麼別的出路，沒有什麼別的人為地刺激工業的手段。因此，軍備競賽一個階段的經濟效果一旦削弱，壟斷巨頭們馬上要求新的階段，即要求變本加厲地擴大軍事化，要求瘋狂般地增加軍事費用。在供應武器方面謀求暴利的這些念頭，也像奪取世界霸權和挽救資本主義體系的計劃一樣，把美國壟斷資本的首腦人物推向瘋狂的軍備競賽和軍事冒險的道路。而為了給這些冒險準備後方，他們就走上了使美國法西斯化的道路。

國內面臨着的時而日趨尖銳、時而暫且被人為的手段

所緩和的經濟危机的威胁，社会矛盾的加深，阶级斗争的愈益熾烈，統治阶级用法西斯手段摧毀工人运动的企圖——这些就是美国在战后时期国内状况的最重要的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壟断組織 和美国工人阶级

战后时期的特点是，美国工人阶级以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罢工，来回击资本主义壟断組織的殘酷进攻。这种对美国劳动人民生活水平和民主权利的进攻已經早就准备好了。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的亿万富翁們就已企圖給在三十年代日益成長和壯大起来的工人运动以致命的打击。他們就是在战争时期也沒有放弃过这些試圖，而战争結束的消息一傳來，华尔街巨头們就感到这正是对美国工人阶级及其組織总进攻、徹底轉向使国家法西斯化的信号。

法西斯化的計劃，也像夺取世界霸权的計劃一样，構成了决定美国战后九年来內外政策主要方向的綱領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剛結束，壟断組織的巨头們立即就于1945年10月在阿布塞康(新澤西州)和11月在華盛頓召开的代表會議上制定了这个綱領。

国家真正的主人——以摩根和洛克菲勒集团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銀行家尤济恩·馬依尔和温特罗普·奥尔德利奇为首的最大的銀行和工業康采恩的六十六个領導人，出席了全国制造商协会在阿布塞康召开的代表會議。虽然他們的會議是严守秘密的，但是許多報紙还是透露了关于會議所討論問題的实質的消息。消息表明，阿布塞康會議拟定了“原子外交”路綫，会上討論的問題是关于利用美国帝国

主义的經濟資源和軍事力量来使全世界殖民地化的办法。

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摩根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已經开始醞釀并且甚至着手准备新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反对美国在反希特勒德国和軍国主义日本的武裝斗争中的同盟者苏联的战争。当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繼續的时候，这些血腥的計劃及实现这些計劃的准备工作是十分隱蔽的。但是，到了战争結束，特别是进入战后时期，伪装的面目变得越来越掩盖不住了，美国帝国主义的惡毒陰謀和它准备进行世界范围的侵略冒险行动，也就越来越露骨和越来越目标明显了。这种情况也不能不影响到美国的对内政策。

壟断組織所开展的反工人运动的进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华尔街冒险主义的对外政策、为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准备后方的政策所决定的。但是并不仅仅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軍事行动停止这一事实本身，給靠战争大发横財的美国壟断組織造成下列危险：銷售市場縮小，利用它們在战争时期大大增加了的資本获取高额利潤的可能性减少，因而它們的利潤也就降低。因为壟断集团無論如何总力圖維持战时的利潤标准，甚至提高这个标准，力求像在任何时候一样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潤，所以当它們預見到生产縮减的現象时，就于1945年底提出普遍降低工資的要求。失業現象在战争年代里减少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有一千二百万人应征参加了武裝部队），但还在日本投降以前又开始增長；这种失業現象，在华尔街巨头們看来，正是可以徹底压榨工人的有利条件。

壟断集团对失業現象增長的态度是二重的。一方面，它們对数百万失業大軍重新出現的趋向大为震惊。它們对

1929—1933年的記憶猶新，害怕大規模失業現象引起嚴重的社會後果。但是，另一方面，大資本主義集團對失業者人數擴大到一定的、相當廣泛的限度很感興趣，因為它們指望利用失業現象的增長來迫使在業工人同意降低勞動報酬。因此，華爾街巨頭們在戰爭結束以後開展了反對任何反失業現象和援助失業者的方案的運動。

日本投降後才過了兩天，紐約州就趕緊停止召集州立法會議的專門會議；而這次會議原定是討論發放失業者補助金問題的。1945年9月美國參議院否決了關於組織失業者的社會救濟的法案。在此以前美國眾議院議員、臭名遠揚的反動分子蘭金提出了一項法案，其目的是利用數百萬復員士兵作為工賊，以便幫助資本主義康采恩達到降低工資的目的。

1945年11月初，為了所謂“保證戰後時期工業內和平”，由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起召集的企業主和反動工會領袖的代表會議在華盛頓開幕，壟斷巨頭們在會上採取了公開的挑釁立場。他們明目張膽地表示，他們考慮的絕對不是“工業內和平”，而是如何降低勞動者的生活水平，並用粉碎工人組織的辦法來強力鎮壓勞動者的反抗。當時銀行家的機關報“華爾街日報”寫道：“許多企業主力圖通過這次代表會議制定出禁止工會舉行罷工的新規章。”1945年12月，冶金公司的機關刊物“鋼鐵”雜誌也挑釁地寫道：“代表會議對究竟是由工會來管理國家還是由國家來管理工會這一問題不得不加以抉擇的時刻臨近了。”

這種威脅的意圖是不難理解的。美國壟斷資本的巨頭們認為，他們長久盼望的日子終於到來。因為據他們看來，當時國內所形成的情況使他們有可能給工人運動的有組織

的力量以致命的打击，有可能清算工会和取消美国無产階級在三十年代中由于多年頑强的罢工斗争而取得的那些社会改革。

这些改革并不是什么尽善尽美的。相反地，这些改革是十分殘缺不全的、有限的。美国在实行这些改革以后，在社会立法的發展水平方面仍旧居于資本主义国家中最末位之一。如果說，这些改革在美国工人看来还是有意义的，那只是因为美国劳动者处于極端無权的社会地位；在美国，長时期来，資方的專橫不受任何限制，甚至毫無掩盖，这种專橫乃是調整美国劳資关系的唯一“法律”。

1933年所进行的調查証明，由于訂了集体合同而劳动条件获得調整的人当时只占美国全部在業职工的百分之九点三，在个人合同中占重要部分的是使簽訂契約的工人承担不加入工会和不参加罢工的义务的所謂“黃狗契約”。

最大的工業公司实行所謂“开厂制度”原則^①。在發生罢工时，企業主往往求救于法院，控告罢工的組織者，說他們損害企業的“商業利潤”。法院根据这种控告，發布“命令”，即橫暴地禁止組織罢工糾察队、禁止工会活动家在卷入罢工的工厂地区內居留或禁止罢工。

还在三十年代初，美国沒有任何的国家社会保險和社会保障。掌握政权的共和党“原則上”反对这些措施。該党一个極著名的活动家厚顏無耻地譏諷地宣称，只有被关在監獄里才能得到完全的保障和保險，發放失業救济金是与“地地道道的美国生活方式”相抵触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

① “开厂制度”原則是指对工会會員和非工会會員一律雇用的一种办法。——譯者注

領袖們不僅沒有進行爭取社會立法的鬥爭，反而反對關於失業的國家保險，他們實質上是同壟斷組織在共和黨中的反動走卒們一樣在竭力辯護這種“觀點”。

美國的工業、交易所和銀行的巨頭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和在大戰期間所夢想恢復的、三十年代初期在美國占優勢的那種秩序就是如此。他們急不可耐地等待着自己的時機，指望出現能夠實現這些美夢的條件。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他們以為這個時機來到了。

戰爭加強了美國壟斷資本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軍火供應養肥了的資本主義康采恩能夠依靠自己的最大限度的利潤，花費比以前更多的資財來加強帝國主義的主要社會支柱、賄買“工人貴族”和工會官僚。它們對於“工人貴族”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落空的：由於大規模生產的標準化和發展，企業中熟練勞動力的比重不斷降低，這就不可避免地摧毀了工人的“貴族”上層的影響。但是，工會官僚階層——具有反動情緒的工會領袖和工會官吏，這些工人運動中的職業的破壞者業已擴大和鞏固了。摩根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一貫把工會官僚作為自己的忠實走狗。

壟斷集團十分希望工會官僚的令人麻痺的影響將能阻礙工人階級鬥爭的發展。它們也估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所形成的經濟情況。在1945年中期業已開始生產縮減的情況下，由於罷工而發生的企業停閉並未給企業主造成重大的物質損害。同時，壟斷集團指望：挑撥起長期的罷工，使罷工者的家庭陷於飢餓，並用失業者的工賊行為來威脅罷工者，以迫使工人投降。

看來，億萬富翁陣營估計到了一切並相信自己是會勝利的。它的代表們極其厚顏無恥地要求取消任何的社會立

法，并回到“开厂制度”和“黄狗契約”的时代。但是，反动派在这些口号下所进行的反对美国工人运动的大进军，并没有得到胜利。华尔街的策略家的算盘打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促进了美国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增長，它同时也在美国劳动群众的政治觉醒方面起了巨大作用，加速了美国無产阶级的阶级自觉的成長和摆脱资产阶级政治影响与思想影响的过程。当然，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地加强了工人运动中的反动分子——工会官僚。但是战争也同时增强了与工会官僚相敌对的工人运动中的进步力量的地位。

美国共产党在1944—1945年所經受的和前此該党领导人之一艾尔·白劳德的背叛行为所引起的危机的結局，在这方面是很好的例証。从修正主义立場墮落成为华尔街的直接代理人的叛徒白劳德解散了美国共产党而改組为所謂“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白劳德终于受到了毁灭性的反击。在1945年7月举行的美国共产党非常代表大会上，全体一致地痛斥了白劳德的背叛行为，并把他开除出党。在威廉·福斯特和尤金·丹尼斯的领导下，美国共产党人在反对白劳德主义的斗争中和在危机之后争取恢复党的斗争中所表現出的这种毅力，它本身就說明了美国工人运动先进的进步力量的朝气蓬勃和坚忍不拔，說明了美国工人的积极性和阶级觉悟的提高。进步力量的發展及其在劳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工人阶级的全面成長，同美国工人阶级組織性的提高及其在国内大企业里进一步集中分不开的。

單只美国加工工业和建筑业的在業人数，在1941—1950年这十年中，根据官方人口調查的材料，就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以上。拥有五百以上工人的美国大企业，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前夕雇用了全部产业工人的百分之四十，到大战结束时已达百分之六十二。现在集中在每个雇用一万人以上的巨大企业中的产业工人，已占美国全部产业工人的百分之三十以上，而在大战以前只占百分之十三。这个过程本身促进了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加强了他们的阶级团结的感情和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加强了他们组织起来的愿望。

1945—1946年的大规模罢工

在1945—1946年罢工斗争的进程中，清楚地表明了美国工人阶级组织性和团结性的增长，当时美国无产阶级曾奋起反击垄断组织战后第一次对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工会权利的进攻。这两年因罢工运动的巨大高涨而著名。1945年罢工四千七百五十次，共有三百五十万工人参加；1946年罢工四千七百次，共有四百六十万人参加。

在战争时期、特别是在战后最初几个月里，工人实际工资的急剧降低，是这些尖锐的冲突的近因。1945年10月，加工工业工人的每周平均工资，根据产联的材料，比1944年10月降低了百分之二十五。1946年春季所支付的工资总额，和1945年春季的水平相比，至少缩减了百分之三十（这是由于在业工人工资降低和失业者增加所致）。许多工业公司一个跟着一个蛮横地拒绝了工人们关于提高工资的合理要求。这是主要的垄断资本康采恩蓄意挑衅的策略。垄断组织力图把劳动者推向公开的斗争，指望这样不仅迫使工人同意业已降低了的劳动报酬，而且给工会组织以打击。

1946年1月，参议员凯尔果尔曾着重指出，摩根钢铁托拉斯和“通用汽车公司”康采恩一道，“故意使关于工资的谈判陷于僵局，以便破坏工会的作用”。产联的一个领导人当

时也抱怨地说：“工厂主正在想方设法消灭工会，挑起罢工。”1945年8月中旬，即还在大战结束之前，美国劳工联合会纽约州组织的主席汤姆士·摩莱也曾说：“由于许多企业主采取不负责的和挑衅的立场，罢工更加难以避免。”摩莱着重指出：“所有这一切，造成了一种不安和不满的气氛，可能在工业战线上引起爆发。”

实际上爆发终于接踵而至。还在1945年10月，美国就有四十五万工人参加了罢工。11月，共有三十多万汽车工厂工人参加的、持续十六个星期之久的罢工开始了。1946年1月，七十五万钢铁工业工人，二十六万二千肉类罐头工业工人，二十万电气工人，几乎在同时举行了罢工。4月1日，四十万煤矿工人的罢工爆发了。5月，二十八万铁路员工停止了工作，使全国铁路运输瘫痪了两天。6月，政府和企业主以匆忙答应工人的要求为代价，好容易在最后时刻预先防止了二十多万海员和码头工人已经宣布的罢工。美国过去从来没有见过具有这样的规模、这样的实力、主要是这样的组织性的罢工运动。这一时期的罢工，照例是总罢工。这些罢工使整批生产部门停顿了，有时一些生产部门同时或几乎同时都停顿了。例如，冶金工人的罢工使二十九个州的一千三百家钢铁厂陷于瘫痪，电气工人的罢工使十六个州的电气工业部门七十九个最大的工厂不能开工。罢工者在不屈不挠地坚持着。企业主们的一切计谋都被打乱了。镇压罢工运动，迫使罢工参加者屈服，粉碎领导罢工的组织，这在当时都是不用想的。

反动的工会领袖这一次也帮助不了华尔街的巨头们。不用说，他们是很想救助陷于困难处境的主子们的。美国劳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对于罢工斗争采取了公开的叛卖立

場。当时的劳联主席格林宣称，虽然有不少工人一一加入他所领导的劳联的工会的会员参加了这些罢工，但他与罢工毫无关系。劳联的正式的机关刊物写道，罢工对于工人是“不利的”，并且令人厭惡地重复着华尔街报刊一贯誣蔑的老調，說罢工似乎是……“根据来自莫斯科的指示”而組織的。

1946年春，海員統一委員會（它是由七个海員和碼頭工人工会組織成的，其中有六个工会屬产联）成立了，委員會領導了海洋運輸工人罢工的准备工作。这时劳联的领导人掀起了一个粗野地攻訐海員統一委員會的宣傳运动，說它不折不扣地是蓄意……要把美国的航運業交到苏联的手里。格林、米尼（当时的司庫，現在的劳联主席）和領導过东海岸碼頭工人工会的碼頭“霸王”雷揚，出面勾結船主，企圖阻碍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屬工会的会员参加已經醞釀成熟的罢工。劳联的領袖們向政府提出保証要搞垮海洋運輸業的罢工，并設法履行这一諾言。他們也企圖对其他的罢工实行消極怠工，但是並沒有成功。

产业工会联合会的許多领导人，对罢工运动高漲的惊恐慌和出卖罢工的决心也不次于格林、米尼、雷揚之流。但是他們的处境是極其复杂的。产联的領袖們領導着許多大的产业工会，这些工会的全体会员無一例外地或者几乎無一例外地，而且是罕見地全体一致参加了罢工斗争，因此他們不敢公开地出面反对这一斗争。他們不能冒險去与他們所領導的組織的会员基本群众發生公开的冲突。当时产联的主席菲力浦·莫萊及其周圍的人，置身于产联的右翼和左翼之間，在1946年，他們还没有决心与左翼断絕关系并最終地与右翼合并。但是，右翼的代表人物，其中包括現在产联的

主席华尔德·路德，当时認為还不能公开地表明自己对资本家巨头們的奴顏卑膝态度和对左翼的战斗策略的反感。千百万罢工工人所一致拥护的，正是左翼的綱領及其战斗口号；而要想提出什么哪怕是表面上相等的东西来与左翼及其口号相对立，不管是莫萊，或是路德，都是無能为力的。

由此并不能得出結論說，产联的右翼領袖們，产联的右翼是不打算对罢工运动实行消極怠工的。他們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或多或少隱蔽的活动。在1945年底至1946年初担任汽車工人工会副主席的路德，用尽一切办法使汽車工厂工人的罢工不与鋼鐵工人的罢工同时發生，企圖从而阻碍罢工者結成一条反对华尔街巨头的統一战綫。不仅劳联的領袖們，而且产联以卡連为首的許多活动家（以其所固有的伪装）都对海員統一委员会进行陰謀破坏。反动分子在产联的許多工会中積極地污蔑进步的活动家，力圖把他們排挤出領導崗位。这些工人运动的破坏者給罢工者帶來了不小的損害。但是，他們并不能摧毀罢工斗争。在此时期的頑强的罢工战斗中，加工工業全部工人中有四分之三提高了工資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五。

壟斷組織依靠波尔、哈布斯、凱茲和杜魯門向国会提出的一些殘酷的反劳工的法案，来鎮压工人运动和破坏工会章程的企圖，也于1946年落空了。

关于凱茲的法案，当时的总統杜魯門声称，如果法案被批准，“罢工、和平的糾察队及其他合法的和平的集体行动，都可構成各种刑事罪”。对于波尔和哈布斯的法案，也可以这样說。杜魯門本人的法案也是如此。杜魯門曾經建議……把一切拒絕复工的罢工工人征召入伍，如果政府需要这样做的話。

这一建議在1946年未被通过。在罢工运动高涨的情况下，在当时产业工会联合会领导集团还不敢与产联的左翼破裂的条件下，美国立法机关认为还是不批准反动的法案为妙。波尔、凯兹的法案和杜魯門法案的基本部分都被否决了。

紐約的进步杂志“政治事务”把美国在1946年中期的情况作了简单的描述，它写道：“……罗斯福的资产阶级改良的时期结束了，而更加明目张胆的资本家专政的新时期开始了…… 壟断资本过去和现在都把降低广大群众生活水平和破坏工会这一任务作为它的战后的纲领，以便削弱工人阶级在动员人民反对壟断组织实现其争夺世界霸权的目的这一斗争中的作用。但是，广泛的罢工运动……打乱了壟断资本的这些计划，并使工人运动在这一斗争的第一阶段上大大地壮大起来了。”①

1946—1948年的經濟“景气”

壟断組織战后进攻的第一阶段沒有达到壟断资本集团所指望的那种结果。但是，壟断资本集团并没有放弃降低群众生活水平和粉碎工人运动的计划。从1946年底起，壟断资本集团就对工人阶级，对工会、首先是对美国工会运动的左翼展开了一系列新的攻击。资产阶级的进攻越来越加残酷和猖狂，日益具有明显的法西斯的特征。美国的亿万富翁们走上了在美国培植警察-恐怖制度的道路，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刻起就一直籠罩着全国的經濟危机的威胁所驅使的侵略冒险准备后方。

① 見美国“政治事务”月刊，1948年7月号。

的确，美国在1915年中期开始的工业生产的下降，到1946年3月業已停止，而在1946年夏美国进入了經濟“景气”的时期，工业和交易所內的疯狂的投机活动活躍起来了。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紧张进行的时候，官方發表的工业产量指数达到了二一七（以1929年的水平为一〇〇），到1946年下降到一五五，但到1947年又重新上升到一七〇，而到1948年达到一七五。但是，这种“景气”一半是由暂时的原因，一半是由純粹人为的原因所造成的。

产生这种“景气”的原因首先是延緩武装部队的复員。統治集团实际上拒絕工业的复員。1947年通过重新武装美国陆军、海军和空军的計劃，进行大规模的軍事建設，特别是原子彈工厂和在全世界范围内美国海军基地網、空军基地網的建設。因而，在战争結束以后，美国的軍費支出和政府的軍事定貨繼續保持很高的水平。在1947-1948財政年度，美国的直接的軍費支出共达一百六十亿美元以上，差不多比1938-1939財政年度增加了十五倍。

这种“景气”的發生还由于在战争中养肥了的大资产阶级、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本主义农场主对洋房、汽車、家具、日常电气用品的需要在战争年代中沒有得到充分滿足而“被拖延下来了”（按照美国經濟学家的說法）。美国出口的可利条件也起了不小的作用。沒有德国和日本的竞争，西欧各国經濟的破坏以及它們在战后最初几年对进口商品的大量需要，使美国有可能到1947年扩大了自己的出口，虽然还远远沒有达到华尔街巨头們所夢想的那种程度，但是畢竟达到了一百五十三亿美元，即比战前水平增加了四倍。

新的軍事定貨、国外市場和在战争上大大“撈了一笔”的美国上層剝削分子方面的需要的扩大，引起了交易所和

企業主集团的投机活动。每一个康采恩都力圖在利用重新出現的銷售条件方面超过自己的竞争者，增加使本企業现代化的投資。但是，这种瘋狂的投机活动所引起的生产機構的扩大，無論是在国内，無論是在国外，都超过了实际的需要。虽然，在1946—1948年，美国的工業总产量繼續大大落后于战争时期所达到的最高水平，但是它仍然超过了銷售的能力。由此可見，美国經濟学家还在1945年就已預料到的危机，只是被延緩下来，而“景气”，归根到底，只会促进危机的成熟。

已經越来越逼近的經濟危机每一步都是能够感觉到的。1947年春，美国工業生产呈现出短时期的、但是严重的低落。1947年夏，出口开始縮减，到1948年則比1947年几乎减少了百分之二十。美国一家主要銀行的机关刊物“花旗銀行公报”在1948年2月写道：“可以肯定地說，对于未来情况的忧心將日益增加。国家虽经历了景气，但并不感觉到平安和有信心，恰恰相反，国家只感觉到情况正逐漸地越来越加危險了。”^①

华尔街的巨头們緊張地望着周期性的經濟危机，并开始有充分准备地迎接危机。他們力圖尽量利用“景气”的条件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利潤和积累利潤，因此便降低了工資。他們并認為最大限度地削弱工人組織的地位，是准备对付危机的計劃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由于壟斷組織1946年沒有能使工人階級在罢工的战斗中遭到失敗和迫使工人階級接受工資的直接降低的条件，所以鋼鐵、汽車、煤炭、鐵路大王們还在1946年就采取了迂

^① 見“經濟危机和‘冷战’”，苏联外国書籍出版社1950年版，第76頁。

週的行動。他們動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留傳給他們的武器。這種武器就是比戰前時期大大地加緊通貨膨脹——紙幣充斥貨幣流通領域，其結果是，美元不斷貶值。

雖然在統治集團中也有必須與通貨膨脹作“鬥爭”和鞏固美元購買力這類鬼話，但實際上美國的億萬富翁們卻抱了完全相反的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他們提出廢除1942年建立的政府對物價的“管制”的要求，就足以證明這一點。當然，“管制”並不妨礙通貨膨脹的發展。它只能把這種情況遮蓋起來，因為它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暫時地阻止許多商品價格的上漲。但是正因為它能暫時阻止物價上漲，在1946年下半年，根據壟斷組織的要求，這種“管制”被廢除了，於是生活必需品的價格開始突飛猛漲起來。大資本家的經紀人所追逐的正是這個目的，雖然他們蠱惑人心地也說什麼要與通貨膨脹作“鬥爭”。物價瘋狂的上漲，不僅鼓勵了投機買賣和囤積居奇，從而也引起了市場需要的人為的擴大，這也是經濟“景氣”的因素之一。但是主要之點在於，物價的上漲必然地降低了實際工資，並使工人階級在罷工鬥爭中得到增加的工資也貶值了。

甚至根據顯然縮小了的官方材料，從1945年到1947年，美國零售價格的指數上升了百分之二十四。但是，由於1946年罷工戰鬥的結果，如前面已經指出的，工資只增加了不到百分之十五。由此可見，增加的工資到1947年早被物價的瘋狂上漲所超過了。

塔夫脫—哈特萊法

隨着美國壟斷組織對工人群眾生活水平的進攻，同時產生了想依靠旨在反對罷工、工會和國內一切進步組織的

立法和行政措施来镇压工人运动的新企圖。1947年3月，杜魯門以总统的命令施行了所謂国家公務員的“忠誠审查”。美国司法部長克拉克进一步發展了总统的命令，公布了“黑名单”，把美国一切进步組織都列入其中，并宣布这些組織是“破坏性”的。加入了这些組織，就被当作是“不忠誠”的証明和免职的理由。3月11日，劳工部長施戴林布赫提出了宣布共产党员不受法律保护的要求，过了三个星期以后，所謂“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①主席、后来因盜窃国庫被判刑的托馬斯在写給司法部長的一封信中，瘋狂地要求对美国共产党提出法律起訴。1947年中期，美国共产党总書記尤金·丹尼斯因“藐視”国会被判一年徒刑；三个月以后，著名的法律家、共产党员約塞夫遜因“藐視”“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也被监禁了。

在这种充滿了反共的歇斯底里和消灭一切进步力量的野蛮口号的政治气氛下，塔夫脫—哈特萊法这个战后时期反动的反劳工立法的基本法令，于1947年6月23日被国会通过，并于同年8月23日生效了。塔夫脫—哈特萊法是工賊分子的真正的宪章，华尔街的巨头們深信可以指靠它来消灭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并且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摧毁工会，也要使工会陷于軟弱無力。塔夫脫—哈特萊法（它是以国会中的提議人參議員塔夫脫和众議員哈特萊而命名的）几乎完全剝夺了工人在三十年代中期所取得的組織起来捍衛本身利益的那些基本权利。塔夫脫—哈特萊法令人信服地說明了，在資本主义的条件下，工人階級所取得的一切成果

^① 美国国会里所設立的一个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組織，它的任务名义上是“防範外国間諜”，实际上是打击美国的一切进步力量、統制进步的思想。——譯者注

是多么的不穩固。它比1946年的那些反劳工法案在更大的程度上証明了，現代美国的統治階級已把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旗帜抛在一边了，在美国已經沒有一絲一毫資產階級自由主义的痕迹了。

塔夫脫—哈特萊法禁止在集体合同中訂入关于“閉厂制度”即关于仅許企業行政雇用工會會員的条文。塔夫脫—哈特萊法实际上容許企業主和当局干涉工會的事情，其中也包括容許他們參加工會机关的选举运动，并策划表決由哪个工會代表某一企業的工人来与行政簽訂集体合同問題。

塔夫脫—哈特萊法限制了有組織的工人簽訂集体合同的权利。塔夫脫—哈特萊法中有許多条文是蓄意用来剝奪进步工會和工會組織內的工人的这种权利的。根据該項法律的原則，企業主只能与为全国劳工关系局所承認的那些工會进行談判和簽訂集体合同。如果工會要得到这个局的承認，工會的領導人就必須具結保證他們不是共產黨員或被司法部認為是其他“破坏性的”組織的成員。为了取得全国劳工关系局的承認，工會還必須向劳工部呈遞关于本工會財政經費及其开支的定期报告。

塔夫脫—哈特萊法規定，工會應把采取罢工行动的意圖，在罢工开始前六十天通知企業主。此外，美国总统有权要求法院作出決定，使業已宣布的或者甚至已經开始的罢工延期八十天。該項法律完全禁止国家公務員的罢工。它禁止其他企業的工人举行團結一致的罢工，禁止他們同卷入罢工的企業实行不合作。与三十年代的立法相反，它实际上恢复了“命令”制度——法院可以任意禁止工會为了保證罢工胜利所采取的这种或那种措施。它使企業主有权向

法院起訴要求工会賠償因工会會員的罷工斗争而引起的一切損失。它使企業主在全国劳工关系局的帮助下有可能根据其他借口讓工会受到法庭审判。

最后，塔夫脫—哈特萊法包含了許多鼓励工賊行为和保護工賊分子的“权利”的条文。它容許企業主招募工賊分子代替罢工工人，容許这些工賊分子参加表决由哪个工会代表該厂工人簽訂集体合同問題。塔夫脫—哈特萊法只允許工会开除不繳納会費的會員，換句話說，它不允許把有意識地破坏工会紀律的工賊分子、主子的亲信走狗和以工会會員証打掩护的警察局的奸細清除出工会的队伍。該項法律允許企業中任何工人集团要求簽訂單独的集体合同，以鼓励他們分裂工人的队伍，破坏工会或者甚至退出工会。

这一駭人听闻的法律的上述一些主要决定的意义是什么呢？

它的提議者首先力圖要使工会运动失去領導，力圖使工会运动失去最先进的、最積極的和最忠实于工人階級事業的領導者。正如塔夫脫—哈特萊法生效后辞职的全国劳工关系局領導人之一詹姆士·希尔茲所宣称的，要求工会領袖具結不屬於共产党，其目的在于反对一切“在民主工会內担任領導工作并为自己會員的利益而十分勇敢地进行有效斗争的”进步活动家。这种要求侵犯了工人最起碼的民主权利，甚至也是和殘缺不全的美国宪法相抵触的，只要拿来和1943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宪法和法律的解釋权屬於最高法院）所公布的宣言比較一下就够了。宣言中說：“如果在我們宪法的星座上有着这么一顆固定的星的話，那末这就是：任何一个領導人，無論他高居什么要职，都不能強使別人接受代表他自己的信念的言行。”但是，在这个誇誇其

談的文件公布了几年之后，而美国的最高政权机关，包括承認塔夫脫—哈特萊法具有宪法性質的最高法院在內，証明了如此庄严宣布了的信仰自由在美国并不适用于进步性質的信仰。

其次，該項法律的旨在反对进步的工会活动家的条文，試圖否認工人群众有权根据自己的意見来选举工会組織的領導人。而且还不仅如此。塔夫脫—哈特萊法还企圖讓壟斷組織的代理人所組成的、并在以法律迫害工会方面拥有無限权力的全国劳工关系局来监督美国全部工会运动。塔夫脫—哈特萊法批准以后辞职的該局的顧問温·安凱尔，曾以充分的論据說明該項法律乃是“企業主手中的工賊活动的工具”。

最后，为了得到这个企業主的代理机关的承認并有权簽訂集体合同，工会必須向政府报告它的經費的支出情况，并且工会还不得用这些經費中任何一部分来进行政治运动。但是，却沒有任何人要求全国制造商协会和企業主的其他組織履行任何一种财务彙报。任何人也不阻撓它們把千百万美元用于使自己任命的人担任总统、国会議員、各州州長的政治运动！

塔夫脫—哈特萊法的提議者不仅蹂躪了純粹形式上的、法律上的公民平等的原則，并且还居心要从工人手中夺去罢工的武器。他們力圖使工人們的罢工斗争遭到莫大困难和保証为企業主破坏罢工以及在罢工进程中粉粹工人組織造成最有利的条件。既然工人根据該項法律必須在兩個月前預先通知关于罢工的事，既然罢工还会被迫延擱几乎三个月之久，那末企業主就經常能够有把握地准备斗争，就能够儲存大量的成品，就能够靠着自己的走狗事先在工人

中間进行破坏活动和采取其他的破坏罢工的措施。工人们举行对于企业主说来是突然的、最危险的罢工的权利被剥夺了，工人们选择在对于他们说来是最有利的时刻开始罢工的权利被剥夺了。并且，因为企业主可以从容不迫地作应付罢工的准备工作，工人们在罢工延期終了时，往往不得不进行长期的斗争，这种斗争由于罢工者及其工会经济拮据，显得特别困难。按照塔夫脱—哈特莱法提议者的打算，延期也会摧毁正在准备罢工的工人的战斗力和意志。最后，就在罢工当中，工人也不不得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斗争：任何一个旨在团结罢工者队伍和预防工贼活动的步骤，都会被法院认为是“非法的”而加以禁止。

但是，扼杀罢工运动，使工会失去领导，用给企业主“赔偿损失”的办法破坏工会，向法庭控告工会，这些并不是塔夫脱—哈特莱法提议者的全部目的。塔夫脱和哈特莱以及那些拥护他们的人，都力图压抑工人阶级中的阶级团结精神，加强落后工人中所存在的庸俗的、反工会的情绪，使这些落后分子与先进的工人互相对立。正如在塔夫脱—哈特莱法生效以后不久大资本集团的机关刊物“美国新闻”所“解释”的，“该项法律对反对工会的工人加以保护”，并且首先使“那些不愿参加罢工的人”，也就是使工贼受到“保护”。该杂志直言不讳地强调说，根据这项新法律，工会无权坚持要求它的会员遵守罢工的纪律，例如要求它的会员在已经卷入罢工的企業里参加纠察队或拒绝越过罢工纠察线，换句话说，即拒绝充当工贼。接着，这个机关刊物并坦率地指出，同时企业主有权解雇那些参加纠察队和拒绝越过纠察线的工人。

“美国新闻”杂志写道，在塔夫脱—哈特莱法存在的情

况下，“工人会劝诱自己的同事退出工会。工人可以在企业内建立竞争性的工会。如果工人是工会会员，而该工会企图阻止他这样做的话，他就可以请求政府机关给予保护”，而且“工会应对不正直的做法负责”。换句话说，工会不得对自己队伍里的破坏分子进行斗争；它被剥夺了任何一个组织所具有的维护自己内部团结和统一的当然权利。“不正直的做法”，就是与垄断资本的利益相抵触的活动！我们所引用的美国亿万富翁的机关刊物并没有掩盖自己的企图，刊物说，借“不正直的做法”罪名而施行的迫害，将促使美国工会运动力量涣散，鼓励有熟练技能的工人上层分子代表人物“建立自己的工会或参加行会性的工会”，以损害联合着各阶层工人的大产业工会。塔夫脱—哈特莱法首先所强调的，正是要反对群众性的产业工会，特别要反对其中由进步的活动家所领导的那些工会。正如垄断集团所深切希望的，正如“美国新闻”杂志所明显暗示的，塔夫脱—哈特莱法定会鼓励一切能够损害美国群众性工会运动发展的事物。

在美国制造商协会直接要求和积极支持下而实行的塔夫脱—哈特莱法，按照反动阵营的打算，应当使美国工人阶级倒退数十年，使它的队伍分裂和瓦解，使它的组织瘫痪，使它完全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的掠夺和剥削进行有效的反抗。它是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总危机和崩溃时代制定的立法的典型例子，是一项法西斯专横的法律。塔夫脱—哈特莱法不仅为逐步扼杀工人运动提供了一套办法，同时也使美国在法西斯道路上更迈进了一大步。

馬歇爾計劃

1947—1948年美國工人運動的形勢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壟斷組織展開廣泛的思想進攻的影響下產生的。壟斷組織利用經濟“景氣”，首先是當時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在1947年6月5日的演說中所說的馬歇爾計劃來達到思想進攻的目的。這個計劃名義上是对西歐國家提供經濟“援助”的計劃，而實際上乃是帝國主義的“杜魯門主義”^①的進一步發展。杜魯門于1947年3月12日公開宣布了華盛頓的侵略目的及其支持全世界一切反動勢力并把它們聯合在自己的領導之下的意圖。馬歇爾計劃也就是為了實現美國帝國主義的世界擴張的目的而提出的。

正如擬定馬歇爾計劃提交國會的哈里曼委員會在報告中着重指出的，該項計劃的任務“超出了經濟的範圍。這些任務具有戰略性質和政治性質”。它規定了鞏固壟斷組織和西歐一切反動勢力的地位。馬歇爾計劃提議者的目的是：在華爾街巨頭們對西歐國家同時進行政治和經濟奴役的條件下挽救西歐資本主義。他們力求實際上取消西歐各國的國家主權和經濟獨立，使它們的經濟軍事化，使它們變成兵工廠，變成炮灰的供應者，變成美國帝國主義對蘇聯和

① 美國總統杜魯門在1947年3月12日向國會提出援助希臘、土耳其的咨文，公然聲稱美國將要支持一切反共產主義和反人民的國家對抗蘇聯。這個咨文後來就叫做“杜魯門主義”或“杜魯門咨文”。它的基本內容是：1. 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地方建立軍事基地，以鞏其現固美國霸權和準備新戰爭的目的；2. 支持作為美國帝國主義反巴爾干人民民主國家的支撐點的希臘和土耳其的反動制度；3. 干涉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內政，支持這些國家的反人民、反民主的反動分子。——譯者注

人民民主国家进行战争的基地。苏联工会在1948年2月27日发表的宣言中曾经指出，馬歇尔计划的倡议者们打算“把西欧变成美国战争挑拨者的进攻基地”。

这些侵略阴谋的积极化是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济状况有紧密联系的。壟断集团费尽心机地寻求防止日益逼近的经济危机的办法，在这方面对馬歇尔计划寄予了莫大的希望。他们打算根据馬歇尔计划打起“援助”的幌子，向欧洲大规模地输出商品和资本，来防止危机。

华尔街統治集团计划用这种别出心裁的方法把危机和失业从美国向西欧“输出”，而美国帝国主义的工会走卒们对这种在“援助”西欧的名义下掠夺和奴役西欧的计划给予最积极的支持。他们千方百计地宣扬馬歇尔计划，当然，他们对于馬歇尔计划和塔夫脱—哈特莱法的提议者同样都属于壟断集团这件事是一字不提的。他们宣布华尔街的这个计划也就是他们自己的计划，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欺騙美国工人阶级和依靠破坏美国群众性工人运动来加强反动的工会官僚的影响的可靠手段。

第一，宣言大吹大擂地（当然是虚伪地）說美国願意“援助”遭到战争破坏的欧洲，它使华尔街的工会走卒有正中下怀的借口来号召美国工人承担牺牲，首先是拒絕爭取提高工資的罢工斗争。第二，“输出”失业的计划使反动的工会领袖有可能对国内的罢工运动实行消极怠工，騙取美国工人相信，由于他们在工資方面的牺牲，他们似乎将会得到美国国内“全部就業”的报酬。第三，馬歇尔计划对一小撮“工人贵族”的上层分子是有一定的实际利益的，因而保证反动的工会领袖的这种社会支柱得以巩固。第四，美国工会官僚企图利用这种大加吹嘘的、同时被宣扬为使美国摆脱失

業的龐大計劃的“援助”歐洲綱領，來提高美國資本主義在工人面前的威望。第五，美國工會官僚指望用這個綱領來對抗工人運動的左翼的這一口號，即應當相信只有工人團結才是不可摧毀的力量，只有這種力量才是捍衛勞動者的權利和利益的可靠保證。

1946年，反動的工會官僚已無法抗拒領導着千百萬工人的進步力量所提出的要求和戰鬥的策略。產聯領導中的莫萊集團已無法在勞動者面前辯護自己對杜魯門政府反動政策的支持。馬歇爾計劃保證莫萊、他的擁護者以及所有的工會官僚有了這樣一種綱領，這種綱領在他們看來，能夠在一部分工人中間（雖然只是一部分）獲得聲望。它的蠱惑性的言詞至少能夠使一部分無產階級受到迷惑，從而削弱工人對左翼口號的支持。這就是為什麼“援助”歐洲竟引起了美國工會的反動領袖們密切注意的緣故。它成了對美國無產階級的團結進行思想打擊和政治打擊的工具，它成了分裂美國工人階級，首先是分裂產聯的工具。

產聯內部的危機早在馬歇爾計劃出現前就成熟了。從1946年年底起，反動分子已越來越猖狂和蠻橫地在產聯的隊伍里抬起頭來。海員統一委員會被卡連破壞了。卡連在產聯所有其他反動分子的協助下，在他所領導的海員工會中開展了破壞活動，力圖把進步活動家排擠出海員工會的領導。造船工人工會主席、右翼社會民主黨人約翰·格令強迫工會作出了禁止讓共產黨員和其他具有進步觀點的人擔任領導工作的決定。格令還企圖，雖然沒有成功，在企業主的幫助下使進步的國際開采和冶煉工人工會的康涅狄格州的地方組織脫離它的領導，並強迫這些組織合併於他所領導的工會。產聯右翼的典型代表人物、投機分子加萊在格

令对开采工会进行分裂陰謀中積極地帮助了格令，而他自己則一再試圖推翻电气工人工会的进步領導，以便重新攫取这个工会的主席职位。加萊是在1941年被共产党人建議从电气工人工会中驅逐出去的。在紡織工人工会和其他許多工会中，反动分子也同样进行了反对进步活动家的运动。

这些分子对莫萊及其拥护者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們公开地起来反对产联的左翼。莫萊集团虽然繼續在表面上保持中派立場，但实际上从1947年中期起在当时業已出現的馬歇尔計劃的明显的影响下，已采取了向右轉的方針，即同产联的进步力量决裂的方針。

1947年11月，美国国务卿馬歇尔本人被邀請出席在波士頓召开的产业工会联合会的代表大会，他在代表大会的講台上号召大家支持美国“援助”西欧的計劃。在实现掠夺和奴役西欧各国人民的計劃中如能得到美国工会組織的帮助，这对于华尔街巨头們說来是極其重要的。路德以产联名義向美国国务院表示願意提供这种帮助。路德的“够格的”战友、当时屬于产联右翼而現在已投入劳联怀抱的巴尔坦茨，1948年2月在众議院的委员会上發言时也強調說，为了实现馬歇尔計劃必須把类似他这样的、能够“用通俗易懂的語句向工人解釋美国的目的”的工会“專家”派往欧洲。华尔街的巨头和国务院的領導者是乐意接受和力求实现这批衛护馬歇尔計劃的工会工作者的建議的。

1948年初，产联执行委员会不顧它的約有四分之一會員(代表进步工会)的強烈而憤怒的抗議，正式地贊同了馬歇尔計劃。这是分裂的开始。产业工会联合会的領導集团急轉直下：徹底同产联的左翼和以前的进步方針决裂，公开支持华尔街的反动的和帝国主义的政策。产联的上層分子

越来越向劳联的上层分子看齐，参加到美国帝国主义和华尔街夺取世界霸权的新战争挑拨者的国家——垄断体系里了。

1947—1948年的罢工

馬歇尔计划、塔夫脱—哈特莱法和产联中已形成的局面，其有害影响首先反映在罢工运动的状况上。1947年，正式登记的罢工总人数减少到二百二十万人，而1948年又减少到二百万人。但是就连这些数字还大约等于美国战前有案可稽的每年罢工平均人数的两倍。物价的高涨到1947年已经超过工人在1946年所获得的工资增加额，但是1947年和1948年物价仍在继续猛涨，这日益推动群众不顾一切障碍地投入斗争。1948年，甚至美国劳工部长施威林布赫也不得不承认“物价和利润增长得比工资快得多”，并承认“给实际工资所带来的损失是没法弥补的”。垄断组织依靠通货膨胀不断降低劳动者生活水平的进攻，必然遭到工人的反击，虽然斗争的条件是不利的。这个时期中的许多次罢工都是不顾反动的工会领袖的反对和禁止而举行的。

以抗议塔夫脱—哈特莱法和一般的反劳工立法为标志的、实质上是政治性的罢工，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中最重要的两次罢工是1947年4月衣阿华州十万工人的罢工和从1947年6月23日持续到7月11日的二十万矿工的罢工。

此外，1947年美国登记下来的还有十五次大罢工，每次至少有一万工人参加。1948年登记下来的这样的罢工有二十次。这些罢工中的最大的几次是：1947年4—5月全国三十七万名电话局工人持续六星期之久的罢工，1948年3—4月三十二万矿工的总罢工，1948年春十万名肉类罐头工

厂工人持續兩個多月的罷工，同年底美国西海岸和东海岸港口碼頭工人的罷工，汽車工業和農業機器製造業工人的一系列罷工。矿工在1948年总罷工时期，也像在1947年夏抗議塔夫脫—哈特萊法的罷工时期一样，显示了高度的战斗力，达到了使企業主增加交納联合矿工工会所設立的撫恤和社会保險基金的要求。坚忍不拔的西海岸港口碼頭工人的要求也达到了。

其余大多数罷工，只是以罷工者的要求得到局部滿足而結束。肉类罐頭工厂工人的罷工，由于罷工者不断遭到軍隊和警察的襲击，被鎮压下去。在反抗襲击的时候，对肉業托拉斯的武裝走卒进行英勇战斗的工人牺牲惨重，并有大批工人被捕。产联右翼和莫萊集团的工賊行为，劳联上層分子（他們始終对群众性的罷工实行消極怠工）的工賊行为，越来越露骨和徹底，这就不能不有害地影响到1947年、特别是1948年罷工运动的进程和結局。1946年和1947年初期罷工运动的特点是：罷工者有着广泛的統一战綫。1948年，产联領袖蓄意对各个工業部門工人同时举行罷工的要求不采取支持的措施，这种背叛行为阻碍了罷工者統一战綫的建立。各次罷工的参加者实际上是孤立地进行斗争的。也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警察才有可能击破肉类罐頭工厂的罷工。

1948年9—12月，得到一万四千名海船厨师和海上消防隊員工会會員支持的一万七千名西海岸碼頭工人持續九十五天的罷工，特别有力地表明了战斗的进步工会的領導作用。由美国工会运动杰出的进步活动家哈里·布里治領導的、以团結和战斗力著名的西海岸碼頭和倉庫工人工会，在罷工中起了主导作用。这也就預先决定了罢工会取得完

滿的成就，尽管企業主首次动用塔夫脫—哈特萊法来对付这次罢工。

根据這項法律的規定，工会应把开始罢工的日子延期八十天——从1948年6月延期到同年9月。企業主企圖在这八十天期滿以后罢工开始时来扼杀罢工，宣称罢工者最重要的要求——要求西海岸碼頭工人工会的代表像他們从1934年起那样繼續領導各港口碼頭工人办事处——是同塔夫脫—哈特萊法相抵触的。他們拒絕同布里治进行談判，便說因为布里治是共产党员，無权代表工人簽訂集体合同。但是，無論是这些“理由”，無論是产联（碼頭工人工会当时屬产联）領導集团的压力和工賊活动的陰謀，無論是众議院劳工問題委员会对罢工領導者的活动进行“調查”的試圖，都沒有成功。在三个月的斗争以后，船主摧毁罢工的希望破灭了。罢工者的要求被接受了，并且罢工是以工人取得胜利，企業主遭到失敗和首次动用塔夫脫—哈特萊法的試圖受到挫折而結束的。

几乎在同时——1948年11月，东海岸和墨西哥灣六万名碼頭工人持續十九天的罢工也結束了。上面已經提到过的工賊和流氓“霸王”雷揚所領導的另一碼頭工人工会領導了这次罢工，它的結局是另外一个样子，实际上罢工是被雷揚破坏了。但是，工人們不仅反对輪船和碼頭公司，而且也頑強地反对在他們的工会中主宰一切的反动的叛徒匪帮，这一事实本身同样令人信服地說明了美国广大工人群众已經積極起来了。在1947—1948年国内罢工运动發展总的情况極不平衡和極其复杂的条件下，这一时期規模大的罢工行动，虽然方式不同，程度不同，但几乎一致地表明美国工人階級的積極性和他們的斗争意志在不断增長。这种情况

在1948年下半年特別明显，当时美国已經成熟的經濟危机業已开始發生影响。

从馬歇尔計劃到大西洋集团

美国从1948年底起業已进入了經濟危机的时期。官方發表的工業产量的指数从1948年的一七五下降到1949年的一六〇(以1929年的水平为一〇〇)。美国的輸出还在1948年就已比1947年减少了百分之十八，1949年和1950年仍然繼續减少。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8月，美国完全失業者的人数增加了一倍，而到1950年2月又有七十万工業工人(根据官方的材料)失掉了工作。作为挽救危机和失業的工具的馬歇尔計劃遭到破产。正如早就預料到的，馬歇尔計劃所造成的美国經濟的“活躍”是人为的和不安固的。

提高价格(美国粮食的价格在1948年一年内提高了百分之十)和为了“援助”欧洲的撥款而增加的賦稅(1947年，联邦稅收总額为三七一亿美元，1948年則为四六〇亿美元)，降低了群众的購買力。居民的消費基金1939年占美国年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五，甚至根据官方的材料，到1948年已降低到百分之七十。此外还必须考虑到，上面所引用的数字乃是按美国全部人口的平均数字，资产阶级的購買力从1939年起是无条件地增長了，絕對地和相对地都增長了。由此可見，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降低，实际上正以比上面引用的統計材料还要大得多的速度發展着。結論是很清楚的。甚至杜魯門总统在他1949年7月向国会的报告中也不得不作出了这样的結論。

杜魯門在报告中不得不承認，美国在战后时期“某几項收入高得不合比例”，物价“以惊人的速度增長着，引起了物

价和工資水平之間的严重的悬殊”，“恰恰是按螺旋綫上升的生活費使千百万家庭陷于極端的貧困”。报告人着重指出，这些条件不能不“引起工業生产的严重破坏”。

美国帝国主义者企圖借助于国家进一步軍国主义化和美国对外侵略政策的積極化，来克服日益成熟的經濟危机。华尔街的巨头們正在加速实现他們还在很久以前就已經筹划的建立北大西洋集团的計划。北大西洋集团成了美国向国外扩张的主要工具。华尔街的巨头們提出了給予美国在这一侵略集团中的欧洲同盟者以軍事“援助”的龐大計划。1947年和1948年初，美国統治集团曾断言說，似乎对欧洲的經濟“援助”可以使美国避免大量的軍費支出，而1949年統治集团則宣称，对西欧国家的軍事“援助”乃是进一步实现馬歇尔計划的必然条件。1949年1月，杜魯門向国会提出的1949-1950年度的預算草案規定要大大地提高軍費支出，美国的报纸（“商务日报”）把它称做“冷战的預算”。1949年4月，美国新聞界主要机关刊物之一“美国新聞与世界报道”直率地写道：“軍备計划乃是人为地扶持經濟的最重要的新工具。”

美国国内政治制度的法西斯化

美国帝国主义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加速和經濟困难的加剧，就不能不影响到它的对内政策。斯大林还在1927年就已經指出：“为了进行战争，單是扩张軍备还不够，單是組織新的联盟还不够。为了进行战争，資本主义国家还必须巩固后方。任何一个資本主义国家，如果不預先巩固自己的后方，不預先制服‘自己的’工人和‘自己的’殖民地，就不能进行严重的战争。各国資產階級政府的政治逐渐法西斯

化的原因就在这里。”^①

国内政治制度逐渐法西斯化是美国整个战后时期的特点。正是为了替世界范围内的侵略冒险准备后方，为了制服“自己的”工人，美国垄断集团在締結北大西洋公約的同时，在国内培植法西斯警察制度的道路上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步骤。業已成熟的經濟危机本身把統治階級推上了这条道路。为了利用危机来把經濟实力和政治权力进一步集中在主导的垄断組織手里，为了把危机的“負担”推在劳动群众的肩上，为了防止他們的反抗，摩根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忙于扼杀群众性的工人运动，更加經常和徹底地采取了法西斯性質的方法。外交和軍事方面的考虑，使这种对内政策变本加厉了。

美国法西斯主义有一些特点。美国垄断資本巨头們企圖在“保护民主”不受似乎来自“共产主义”，即来自工人运动的进步力量的威胁的幌子下，使国家法西斯化。裝做保护宪法，实际上他們正在無耻地破坏着宪法，裝做遵守法律，实际上他們正在培植無視法律和警察專橫的制度。迫害共產黨員和所有的先进工人，經常对工人运动的进步力量采取法庭—警察恐怖手段，乃是美国在战后时期最初几年国内政治形势的特点。

1948年初，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委員亞历山大·比特曼、全国委员会書記約翰·威廉遜、黑人女活动家克洛第婭·瓊斯被捕。亞拉巴馬州共产党組織的主席門希由于散發刊載共产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福斯特关于对战争和法西斯威胁进行斗争的宣言的小册子，被判处劳役。1948年7月

^① 見“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40頁。

20日，即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几天，以福斯特为首的全国委员会的十二位委员以“阴谋鼓动用暴力颠覆美国政府”的罪名被捕。1949年1月17日在纽约开始对其中十一位委员（福斯特的“案件”则因他患病而延期了）的审判，特别确凿地表明，美国资产阶级已经认为不能再以从前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法来管理国家了，于是不再理会自己原有的宪法而采取对工人运动的一切进步力量实行恐怖镇压的方针。可以说，反动的史密斯法（共产党的领袖们就是根据这项法律被交付法庭）的复活，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史密斯法即臭名昭著的“思想管制”法，是1940年通过的。它是由全国制造商协会的忠实奴仆、众议院议员霍华特·史密斯提出的。“思想管制”法的拥护者们由于考虑到这几年的情况不利于反劳工的立法，就竭力掩盖了它的反劳工的锋芒。因此，它被作为专门的章节列入了史密斯所提出的另一项“外国间谍登记”法。这样，它就以防范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美国的间谍的措施出现在舆论面前。实际上它在战争时间几乎没有施行，在1945—1947年间完全没有施行，看来已被人们遗忘了。只是在1948年，华尔街的佣仆们着手策划对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审讯”的丑剧时才被披上法律的外衣从档案里取了出来，并开始广泛地施行。著名的美国工会问题的评论家乔治·莫里斯写道，史密斯法现在实质上就是“警察国家关于思想管制立法的流行的法典”，并“能成为威胁着整个工人运动的棍棒”。美国垄断资本统治集团就用了史密斯法这个法西斯棍棒首先来反对共产党。

史密斯法禁止“参加”旨在鼓动“用武力和暴力颠覆或消灭任何美国政府”的“阴谋”。共产党的十一位领导人，其

中包括总書記尤金·丹尼斯、劳工書記約翰·威廉遜、进步的国际毛皮工人工会副主席爱尔兰·鮑塔希都被控告有这种“陰謀”。为了把共产党的活动誣告为“陰謀”，审讯丑剧的导演者依靠所雇用的一帮伪証人，肆意“解釋”和故意歪曲共产党的綱領和党的領袖的言論。甚至据印第安納州的审判官哈里斯的供認，“控告”完全是以“特务和告密人的骯髒的情报”为根据的。除此以外，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根据。

“审讯”的方法并不是什么新花样。利用人所周知的伪証人并对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进行蛮横的审讯，在美国向来就是很平常的現象。新的花样在于，对共产党領導人的訴訟案，乃是真正对思想的审讯，乃是对思想的控告。实质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党坐在被告席上，奠定党綱基础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則被宣布为罪犯。为了造成一种“有法律根据”的口实来镇压共产党的活动，来不仅禁止共产党，而且禁止工人階級的任何进步的政治組織、甚至一般工人运动的进步組織，审判官是不惜公然違反宪法的。于1949年10月14日宣讀的事先准备好了的起訴判決書，正符合这个目的。所有十一名被告都被判处長期監禁。

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威廉·福斯特在評述判決書时宣称，“宣布共产主义为非法的政治运动，是向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福斯特着重指出：“反动派的政策在于，首先镇压共产党，而后再消灭工会……”^①

在1949—1950年，对进步工会采取的法庭—警察恐怖更加厉害了。联合电气工人工会、毛皮工人工会、西海岸碼

^① 見1949年10月17日美国“工人日报”。

头工人工会受到华尔街司法当局、联邦調查局^①（暗探局）特务、美国軍团和其他法西斯—恐怖匪帮的百般迫害。西海岸碼頭工人工会主席哈里·布里治的“案件”，特别为人所共知。布里治在1949年中期被交付法庭，在1950年4月以“陰謀伪証”的罪名被判处五年徒刑。

輪船公司的走狗們誣蔑地斷言：似乎生在澳大利亞、在1945年取得美国国籍的布里治，隱瞞了他的共產黨員的身分，乃是这种“起訴”的根据。过去，从1934年开始，对布里治不止一次地提出了类似的“控告”；当时布里治領導了旧金山的海員和碼頭工人的总罢工。还在1949年以前，壟断組織的奴才們曾三次制造了对布里治的审讯“案件”，以便使他不能取得美国国籍，并把他驅逐出美国。1949—1950年对布里治的第四次审讯，也是抱了同样的目的。当对布里治屢次采取的法庭—警察陰謀遭到失敗以后，他們再一次企圖从美国工人階級的队伍中“除掉”这个战斗的工会領袖，而使他所領導的声势浩大的进步工会失去舵手，使太平洋海岸的罢工运动失去一个最杰出而又最忠实于工人利益的組織者。

但是必須着重指出，虽然反动派的攻击首先是反对进步的工会，可是美国統治集团在1949年又提出一項方案：或者使工会全部被摧毀，或者使工会全部法西斯化，也就是使它变为完全受壟断資本控制的組織。

美国劳工联合会和產業工会联合会的領袖們准备促使

① “联邦調查局”是美国法西斯特务机关，是秘密警察的大本營。原名“司法部調查局”，屬司法部。1924年胡佛正式任局長后才改現名。調查局在華盛頓設总局，分局有五十多个，遍布美国各地。
——譯者注

他們所領導的工会联合組織變成某種類似希特勒式的“勞工陣綫”的東西，只要能夠保持自己的職位和相應的薪金和收入就行。1950年1月28日，產聯的司庫加萊所宣布的綱領實際上就是這樣，當時加萊聲稱，準備“與法西斯分子聯合起來對共產主義開火”。同法西斯分子共同反對共產主義，同法西斯分子共同反對工人運動的進步力量和一般的工人運動！領導着勞聯和產聯的頭子的領導方針過去和現在就是這樣。

美國工会官僚集團中反動傾向的增長也表現在下列事實上：從1949年起，美國這兩個工会中心的領導人較過去時期更加頑固地企圖對罷工運動實行消極怠工，首先對工人爭取提高工資的鬥爭實行消極怠工。他們要求工人不要罷工，硬說似乎在業已成熟的經濟危機的條件下，罷工是不可能的。他們重復着壟斷組織巨頭們的論調，說什麼似乎物價已經開始下跌，所以提高工資是沒有理由的。甚至官方的統計也揭露了這類胡說八道的論調。據官方的材料，1948年消費基金如前所述占美國經濟的總產值的百分之七十，1949年第一季降低到百分之六十八點四，而在1950年最後一季又降低到百分之六十五點六。這樣，群眾的生活水平不斷地下降，工人們于是不顧反動的工会領袖的一切阻撓奮起進行鬥爭。

1949—1950年罷工運動的高漲

在1929—1933年經濟危機時期罷工運動的高漲，直到這一時期結束時才出現，而從1948年底起美國業已擴大起來的經濟危機，還在1949年就使美國的罷工鬥爭大大急劇起來。1929—1933年很長一段時期中，工人群眾每次試圖

采用群众性罢工的武器来反击壟断組織强盜般的襲击，几乎都在萌芽状态中就被美国劳工联合会上層领导集团內的叛徒們扼杀了。1949年，也和其后几年一样，反动的工会領袖并没有能使工人階級的罢工斗争陷于癱瘓。1949年，有案可稽的罢工者总数为三百万，超过了1948年的二百万，由于罢工而損失的工作日超过了五千万个，几乎較1948年增加百分之五十。

美国煤炭工業中持續八个月之久的冲突，是1949—1950年罢工运动發展中最大的事件。这次冲突是1949年中期开始的，当时矿主們由于考虑到失業現象的增長和煤炭找不到銷路而大量积存，拒絕了工人关于提高工資和提高企業主交納矿工保險及撫恤基金的要求。十分明显，矿主們是想利用日益逼近的經濟危机所造成的情况，来給予联合矿工工会——国内最大的工会之一——以打击。

联合矿工工会的領導集团在1949年7月1日宣布特殊形式的半罢工，即号召矿工每星期工作不超过三天，来回击煤炭大王所持的挑衅态度。但是，这种不徹底的策略既不符合当前形势的要求，也不符合工人开始自發地离开矿井的情緒。工会主席路易斯不得不宣布四十万矿工的总罢工。总罢工从9月19日开始，持續了五十一天。11月9日，路易斯号召矿工复工，实行三个星期的“停战”。当“停战”期限屆滿而企業主仍旧拒絕工人的合理要求时，总罢工又重新开始了。这一次总罢工持續了五天。12月5日，工会的領導集团試圖再采取半罢工的策略，号召矿工重新采煤，每星期做三天工。但是，工人群众摒弃了这种策略，他們不屈不撓的勇气和战斗精神使事件的进程起了急劇的轉变。1950年1月9日，矿井中的自發性的罢工又开始了。到2

月初，已經有十萬工人擱棄半罷工的策略起而罷工了。工會的領導集團由於無法阻止神速擴展的罷工鬥爭，在2月6日又重新宣布了總罷工。杜魯門總統曾不止一次偽裝是塔夫脫—哈特萊法的“反對者”，這時却急忙動用這項法律：2月11日，華盛頓的聯邦法院根據他的建議，命令停止罷工。但是，四十萬名礦工不顧法院的命令，萬眾一心地繼續罷工下去。直到3月5日罷工才告結束，這時礦主們已被迫幾乎全部接受了工人的要求。

1950年2—3月礦工的總罷工——戰後第六次總罷工——在國內造成了巨大的印象，並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它打擊了美國礦主們反工會的陰謀，使塔夫脫—哈特萊法第二次遭受失敗（第一次是1948年西海岸碼頭工人的罷工）。它表明了，無論是反勞工的立法，無論是壟斷組織的反勞工的計劃，在具有捍衛自己的權利和利益的堅定決心的工人群眾的統一戰綫的面前，都是軟弱無力的。它也表明了，這種團結和決心，只有靠從下面上的行動一致才能得到保證，只有靠在未直接卷入衝突的工人中間發展團結運動才能得到鞏固。礦工的罷工證明了工人從下而上的統一的意義；正是在這一原則的基礎上，渙散的、分布在二十多州這樣廣闊領域上的礦工隊伍，聯合成了一支統一的強大的部隊。它掀起了一个聲勢浩大的團結運動；這一運動不僅席卷了工人群眾，而且也席卷了很多加入了勞聯和產聯的工會的基層組織。最後它證明了，甚至反動的工會領袖們也不得不考慮到群眾的情緒，如果工人以積極而又團結一致的行動來十分明確地表達和支持這種情緒的話。在礦工罷工的進程中，罷工的群眾實際上是走在工會的領導集團的前面，每當工會的領導集團避開正確的道路的時候，就迫使它回到

正确的道路上来。

关于工会领导集团和组织在工会里的一般工人群众之间的关系，在1949—1950年罢工战斗发展的进程中，是针锋相对的。从这种观点看来，就应当特别注意持续一百五十七天之久并在1949年11月以胜利结束的夏威夷群岛两千名工人（属进步的西海岸码头工人工会）的罢工。尽管罢工者人数很少，他们的顽强的斗争却具有巨大的意义。反动派为了反对罢工者，集中了一切力量，动用了一切手段：法院的禁令、雇佣的工贼匪帮、劳联和产联领袖的破坏活动、对进步活动家和进步组织的疯狂迫害。正是在这次罢工时期，开始对布里治采取法院起诉的第四阶段。当时美国总检察长汤姆·克拉克曾露骨地宣称：“如果我们对于布里治的审判获得成功，那末我们摧毁夏威夷的罢工就有可能获得成功。”但是，垄断组织所有这些指望、它们的法庭—警察恐怖行动，也正如反动的工会领袖的阴谋一样，在工人群众紧密团结和战斗的进步工会领导的坚定不移的团结这一事实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相反地，钢铁厂五十万工人持续四十九天（从1949年10月1日到11月18日）的总罢工，就是在缺乏这种团结的条件下进行的：罢工群众对工会领袖几乎无所掩盖的工贼行为进行了不断的斗争。起初，当时的钢铁工人工会主席（又是产联主席）莫莱，企图根本不向企业主提出关于提高工资的要求。在群众的压力下，莫莱才被迫在提出另一要求——关于建立由企业主交纳的冶金工人抚恤和保险基金——的同时提出提高工资的要求。当冶金托拉斯拒绝这两个要求的时候，工人准备立即开始罢工。莫莱却把罢工延缓了两个半月，他劝告工人等候杜鲁门总统的调停。但是，总统所任

命的委员会立即表明了这种“調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委员会命令鋼鐵工人工会收回提高工資的要求，并削減其所提出的企業主对撫恤和保險基金的交納數額大約一半。莫萊立即表示同意，虽然在这不久以前他本人还強調說，1949年冶金工業工人的实际工資已較1939年降低了百分之十九。但是，鋼鐵公司考虑到工会領導集团的投降主义立場并希圖給工会以打击，竟拒絕了工人那十分微小的尚未被總統任命的“調停者”所拒絕的一部分要求。只有总罢工(莫萊在企業主公开的挑衅行为和“調停”显然破产的条件下已無力阻撓)才在一定程度上使工人及其工会摆脱了工会領導集团叛卖立場的惡果。企業主被迫同意交納为数不大的撫恤和保險基金。主要的是，企業主瓦解鋼鐵工人工会的指望又破灭了。

群众的積極性和战斗力同工会領導集团的工賊行为之間的这个矛盾，是汽車工業一系列罢工运动的特点。例如，1949年5月福特工厂六万名工人的罢工和1950年1—5月底特律的克萊斯勒工厂八万九千名工人的罢工。1949年5月中旬，壟断組織的机关报“紐約时报”关于福特工厂的罢工这样写道：

“許多直接参加罢工的联合汽車工人工会的普通会员显示了不屈不撓的团結和坚定。几年来体会到在罢工斗争中这种团結一致的必要性的工人，并不願放弃自己的要求，虽然他們的工会領袖中有些人，包括路德(工会主席——作者注)在內，是非常明显地渴望尽快地用任何足以保証挽救他們声誉的办法使罢工妥为解决的。”^①

① 見1949年5月15日美國“紐約时报”。

紐約銀行家的机关报并没有顧惜类似路德之流的华尔街的工会走卒，还是道破了真相。福特工厂的罢工和大多数其他的罢工都确鑿地表明了，反动的工会領袖是美国工人运动發展道路上的十分重大的障碍。但是，这些罢工也証实了工人群众的“不屈不撓的团结和坚定”。他們越来越加积极，日益克服着反动的工会領袖的有害影响，正在自觉地或者至少是本能地另找别的领导。1949年底，另一資本主义的机关报“商务日报”焦虑地写道：“在一个又一个的工会里，普通会员都倾向于战斗的领导者。”

* * *

对美国壟断組織为了破坏和扼杀美国工人运动几乎进行了五年之久的紧张而枉費心机的努力，“商务日报”以其憂虑的評論不由自主地作了簡短而意味深長的結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壟断組織就立即提出了侵略计划和法西斯计划，它們在实行这些计划时对工人阶级展开的进攻，受到工人阶级多次的罢工行动的回击。

工人阶级的斗争在經濟形势不断急剧变化的情况下發展起来了。1945年下半年和1946年初由于战争結束而引起了工业生产的短期的但又猛烈的下降，其后兩年半被通貨膨脹、投机倒把所造成的“景气”取而代之；这种“景气”主要是由于美国在战后重整軍备和霸占西欧市場（局部地是根据馬歇尔计划打着美国“援助”西欧国家的幌子进行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的时候起，这些年来国内充滿了經濟危机和失業增長即將到来的紧张气氛。1946—1948年的“景气”所引起的一些因素暂时延緩了危机，而从1948年年底起危机又开始席卷美国的經濟，使企業停頓，把失業大軍拋向街头。资产阶级广泛地利用美国工人經常不断的、甚至在

“景气”时期也没有消除的那种害怕失去工作的心情。资产阶级骗人地断言，似乎马歇尔计划就是使美国摆脱失业现象的计划；这种断言成为战后垄断组织对美国工人运动的进步力量从思想上进行最大的破坏活动的基础。

同时，指望用法庭—警察恐怖的手段镇压这些进步力量的华尔街统治集团走上了使美国法西斯化的道路，制造了对付共产党员和进步的工会活动家的卑鄙的审讯，企图使工人运动失去它的最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的领导者。全国制造商协会所实行的法西斯的塔夫脱—哈特莱法，就是对工会和罢工运动的直接进攻；这项法律乃是美国前所未有的公开的反劳工立法的典型。

无论是垄断组织根据马歇尔计划所进行的思想破坏活动，或是反对工人运动的左翼的法西斯—警察进军，都得到了反动的工会领袖的积极支持。他们用尽一切办法妨碍无产阶级在垄断组织进攻的面前的统一和团结。反动的工会领袖最大的罪行就是产联的反动的转变，这种转变的结果是这个过去曾经是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的产联遭到分裂。

垄断组织进攻的这些结果，还远远达不到发起进攻者的希望。华尔街巨头们达到了降低实际工资的目的，但达到这种目的主要是用迂回的办法，即借助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办法。他们在公开的罢工冲突的过程中，照例都遭到了失败。他们既不能夺去工人阶级手中的罢工的武器，也不能消灭进步的工会，也不能削弱工人群众要求团结的顽强意志。

到1950年中期，即美国帝国主义对朝鲜的军事冒险的前夕，美国的罢工运动沿着上升的直线发展起来了。在日益扩大的经济危机的影响下，由于马歇尔计划而曾经在相

当大一部分工人中間存在的幻想开始减退了。从下而上的統一的思想把握了越来越多的劳动群众。进步力量的影响在工人运动中日益扩大，华尔街統治集团和反动的工会領袖营壘内部的惊惶不安也随着进步力量的增长而日益加剧。

第二章

美国帝国主义对朝鮮的冒险，美国工人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和罢工运动的新高涨

美国軍国主义化的加强

1950年6月，美国帝国主义从准备战争轉为直接的侵略行动。美国武装部队进攻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时霸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島。华尔街軍閥首腦們認為，作为侵略中国大陆領土的序幕的这种冒险，是会大有成就的。美国壟断集团利用它們准备停当的、業已开始的朝鮮战争，来进一步煽起反对民主陣营的战争歇斯底里，来对僕从国家施加压力，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使美国的侵略政策积极化起来。

朝鮮战争和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美国和西欧的龐大的軍备竞赛，加紧了美国經濟的軍事化。現在美国軍費支出占国家全部支出的四分之三。在朝鮮进行冒险的三年内，美国軍費支出的增長更为迅速。举出下面的例子就够了，在1950-1951預算年度（美国的預算年度到每年6月30日为止），即在对朝鮮进行軍事行动的第一年，美国的軍事撥款几乎相当于前一个年度即1949-1950年度軍事撥款的兩倍。在从1950年7月到1954年7月这段时期內，美国国会通过

的用于军事目的的撥款总額，几乎达到一千八百亿美元，超过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內軍費支出的一半。

美国对僕从国家軍事“援助”的支出在1949-1950年度不超过十亿美元。在以后三年內，軍事“援助”的撥款超过了一百八十亿美元。美国用在原子彈生产方面的費用，根据已公布的材料，1947-1948年度为四亿六千六百万美元，1948-1949年度为六亿三千二百万美元，1949-1950年度为七亿二千五百万美元，1950-1951年度为八亿九千七百万美元，而1952-1953年度已达十七亿美元。

用于破坏手段的駭人听聞的花費，意味着軍事定貨的巨大增加。从1950年中期到1952年年底这段时期內，軍事部門和它的供应者——首要的工業康采恩之間所簽訂的合同总值几乎达到九百亿美元。这些合同对于美国壟断組織說来意味着一种神話般的利潤。在对朝鮮进行冒險的前夕即1949年，美国股份公司的利潤总額为二百七十六亿美元(納稅前)，而1952年的利潤总額則达到四百零九亿美元，1953年据初步計算將近四百四十六亿美元。这是了解美国帝国主义全部侵略政策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必須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潤，才推动壟断資本主义去采取这样冒險的步驟，如奴役和不断掠夺殖民地和其他落后国家，把許多独立国变为附屬国，組織新战争、即現代資本主义头子們認為是取得最大限度利潤的最好‘生意’，以及企圖夺取世界的經濟霸权。”^①

战争和美国經濟軍事化的日益增長的作用，是美国壟

① 見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94頁。

断资本主义寄生性和腐朽性的特点。美国共产党主席威廉·福斯特在他1949年出版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末日”一书中写道：“……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在最近三十五年来被战争的鲜血喂养起来的。当1914年下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美国正处于经济萧条。由于战争，美国摆脱了萧条的状况……这种由堆积如山的军事定货所支持着的战争‘景气’，不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四年中，而且……也在整个二十年代中继续着。在这些‘景气’的岁月中，……直到1929年10月发生大崩溃为止，对于恢复被战争破坏的欧洲国家所必需的商品的大量输出，乃是美国工业‘繁荣’的基础……”

整个三十年代，美国工业始终是病态的和贫血的……只有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阴影布满天际的时候，重新被无穷无尽的军事定货所滋养的美国工业，才现出生机。这是十年以前的事，从那时起美国工业体系，就像寄生虫一样始终是靠军事定货滋养的……”^①

把美国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发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延缓到1948年年底的那些因素中，“冷战”、与“冷战”相联系的军费支出和军事定货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当1948年秋周期性经济危机开始以后，“冷战”阻滞了危机的发展。1949年底至1950年初，工业生产的下降停止。与“冷战”有关的花费，即美国本身的军备，对西欧仆从国家的“援助”，对希腊、土耳其师团和国民党、李承晚反动匪帮的军备和维持费，最后，对和平民主阵营的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等，根据

① 参看威廉·福斯特“世界资本主义的末日”，世界知识出版社1953年版，第46—47页。

現有的材料，从1946年7月1日到1950年11月1日这段时期內共达一千亿美元。

但是，到1950年中期，这些用于“冷战”的支出的經濟效果都耗尽了。1950年5月，“商务日报”在引証美国一个著名的銀行家的声明时指出，在沒有新的强大的“刺激手段”的情况下，国家又一次面临着較1949年更其严重的企業开工縮減的威胁。美国帝国主义發动朝鮮战争对朝鮮人民进攻，就是新的“刺激手段”。难怪侵朝美軍总司令范·弗里特將軍把这个战争称做“祝福”，并硬說，軍事行动“在这里（即‘虎’將所統轄的地方），或是世界其他地方，都是必要的”。經濟軍事化在一系列的人为的“刺激手段”中占据主导地位，如果沒有这些“刺激手段”，美国資本主义的工業就不能維持現狀了。

美国武器、彈藥和其他軍事物資的生产，1950年估計每月約为三亿美元，而1952年根据官方材料每月已增至二十亿美元。工業产量的总指数从1949年的百分之一百六十增加到1950年的百分之一百八十二和1951年的百分之二百（以1929年的水平为一百）。由于美国官方在指数的統計上采取为了壟斷組織的利益而大肆歪曲和任意誇張工業实际产量的方法，因此工業生产的实际增加应当比上面所引用的数字小得多。

經濟軍事化的日益成熟的危机

但是即使在战争情况下，生产相对地稍許提高也并不是穩固的。从1951年中期开始，預示經濟危机逼近的迹象又重新出現了。生产武器或者与軍事生产直接有关的工業部門的产量，从1950年到1952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八，工業总

产值在同一时期只提高了百分之九，而像纺织品的生产甚至还降低了百分之十二。归根到底，日用品产量的下降也影响到了生产资料的生产，1953年国家重又进入了日益成熟的经济危机阶段。美国工业生产在1953年经过最初几个月的短时期高涨以后，又开始不断下降。到1954年3月，美国工业生产的总指数较1953年初所达到的最高水平降低了百分之十点二。并且还具有这样的特点：在这一时期内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的产量，不仅未能制止总指数的下降（像1951年和1952年那样），甚至比总指数下降得更快。到1954年2月，重工业的生产较1953年初降低了百分之十三以上，钢的产量甚至降低了百分之三十。

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前，特别是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订以后，美国报刊对经济的预测是非常黯淡的。美国总统和政府集团的其他代表人物为了竭力减轻企业家的忧虑，曾强调说，尽管朝鲜业已停战，军备计划仍旧不会缩减。垄断组织首要的机关刊物之一“华尔街”杂志要求不仅不缩减军事定货，而且要求强迫美国和西欧各国的居民接受更加庞大的、以最近几十年为期的军事计划。到1953年秋季，随着经济危机现象的尖锐化，政府集团日益明显地表示准备再扩大军费支出，其中包括积累美国战略原料的储备。1954年1月向国会提出的新预算草案，规定要大大扩大对各种费用浩大的军备——空军、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电子装备等等的拨款。不久前的“通用汽车公司”康采恩总经理、美国的国防部长威尔逊透露了关于制定庞大的“美国大陆防务”（包括沿着美国边界设立连绵不断的雷达站和发射导弹的装置）计划的消息。三个新的巨大的原子工厂的建设正在加速进行。对原子工业的投资在1954年达一百亿美元。

从1953年年底起，华盛顿方面煞费苦心地进行了一切努力，想要扩大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和争取美国在这一战争中的领导地位。美国外交当局竭力阻止印度支那恢复和平。这些企图由于1954年7月21日在日内瓦外长会议上达成了越南、老挝、柬埔寨境内停火的协议而破灭，结果使美国统治集团大为狼狈。但是美国统治集团的政策并未因此有所改变。它们不仅没有放弃继续进行军备竞赛，相反地，力图加快军备竞赛的速度。它们加倍努力地试图拼凑东南亚侵略集团，以便堵塞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和在远东保持有利于挑起新的武装冲突的紧张气氛。美国报刊并不掩饰对于利用这种办法来消除美国经济危机所抱的希望，虽然对朝鲜人民发动战争的經驗说明事实完全相反：正是对朝鲜的冒险成了这个从1953年春季起扩展起来的经济危机的序幕。

当然，不这样也不可能。要想美国有或多或少稳固的和长期的经济活跃，在现时条件下也是不可能的。相反地，经济的军事化，即片面地发展与军事生产有关的工业部门和损害生产日用品的部门，必不可免地要使美国帝国主义的經濟矛盾尖锐起来，并使国家受着经济危机的威胁。

在对朝鲜进行军事行动的三年内，美国的武器、弹药和军需品的生产扩大了七倍。军事定货的巨大增长使大量投资流入重工业，并使重工业生产机构膨胀起来。在朝鲜战争的第一年中，伴随着重工业的有利局面而来的是某些生产日用品部门的一定程度的活跃，而这种有很大局限性和暂时性的活跃也反映在轻工业的生产能力有某些扩大上。但是，在美国侵略朝鲜的时期，工业产品的销售能力已经缩减了，因为军事定货并不能补偿群众购买力的低落，而且正

是軍事生产的这种片面的畸形的發展加速了群众購買力的低落。1952年軍事生产占美国加工工業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資本、設備、原料和燃料集中在軍火生产方面，不能不引起其他經濟部門的貸款利息上漲和設備、原料、燃料漲价，因而也就使这些部門的产品价格上涨了。其次，巨大的資源用于非生产性的軍事目的，就必不可免地要加紧通貨膨脹^①，也就是說要使物价猛烈上漲。美元在粮食方面的購買力在朝鮮战争前夕还不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元在粮食方面購買力的百分之三十九，到1952年由于通貨膨脹的进一步发展已降低到百分之三十二。据初步估計，仅在朝鮮战争的最初十个月內，通貨膨脹削減了美国消費者（不消說，首先是美国劳动者）的总購買力二百二十亿美元！加之，軍事預算的巨大增長和大量軍事定貨的撥款，引起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賦稅的增加，而这些捐稅的全部重負是压在國內劳动者的肩上的。

最后，与华尔街的政治走卒和反动的工会領袖关于在軍事一通貨膨脹的情况下提高工人就業的一切欺騙性的諾言相反，这种情况归根到底使失業人数日益增加。美国經濟發展的片面的軍事方向，使非軍事部門陷于停滯状态，或者甚至生产縮減，这就不能不引起这些部門的大量解雇工

① 因为生产的武器和彈藥或在戰場上消毀了，或呆滯在倉庫內，制造武器和彈藥所耗費的物質財富退出了經濟周轉过程。同时政府支付軍事产品所花費的款項仍停留在貨幣流通領域內。因此，在大部分国家預算用于非生产性的軍事目的的情况下，貨幣流通不仅不再符合經濟局勢对于貨幣的需求，而且超过了这些需求。結果是貨幣流通的孔道堵塞，即通貨膨脹和紙幣貶值。

人。至于說到軍事定貨，它們都集中于那些具有最完善的“科学的榨取血汗”(列宁語)制度的最大的康采恩的企業身上。因此，美国軍事生产的增長，主要是靠急剧提高劳动强度的办法，而絕不是靠那种可以使被从非軍事企業大批解雇的工人扩大就業的办法。

由此可見，美国經濟的軍事化，由于引起物价上漲和捐稅增加，促使失業人数增加，就必然要加速而且实际上也加速了美国工人絕對貧困化和相对貧困化的过程。正是工人和全体劳动者不断加剧的貧困化，成了美国的龐大軍备撥款和一切侵略政策的最重要的前提，成了美国壟断組織进一步神話般地發財致富的条件。当美国空中强盜剛把第一批炸彈投向朝鮮城市的时候，美国壟断組織的利潤就开始神速地增長起来。但同时也正是群众的貧困化使华尔街防止經濟危机的各种試圖必然遭到破产，使国内階級矛盾不断的尖銳化。階級矛盾进一步的尖銳化，是美国在朝鮮冒險时期所形成的局势的特点。

工人不能容忍他們的生活水平不断降低和超額剝削日益增長。从美国对朝鮮的冒險一开始起，工人就要求提高工資，以便能补偿物价的上漲和捐稅的增加。但是，如果使工人的要求得到滿足，就必然妨碍了壟断組織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潤。因此美国壟断集团就立即利用对朝鮮的冒險来进行囂張的沙文主义的宣傳，并利用它們所造成的这种战争歇斯底里气氛来重新試圖摧毀工人运动。华尔街無論依靠塔夫脫—哈特萊法，或是依靠馬歇爾計劃所沒有能取得的东西，就該当依靠朝鮮战争得到保證。而由朝鮮战争的結果所沒有能取得的东西，現在就該当自美国在远东的新的侵略行动取得保證。

还必須注意到，美国壟断組織的巨头們过去和現在都把对朝鮮的侵略、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企圖，看作是美国在亞洲、欧洲进行扩張和侵略的新行动的序幕，归根到底是美国在世界范圍内进行武装冒險的序幕。保証自己能有进行这些侵略和冒險行动的可靠后方的意願，也和靠战争获得最大限度暴利的計劃一样，过去和現在都把美国的亿万富翁推上重新試圖摧毁工人运动的道路。壟断組織康采恩的首腦們以所謂“軍事必要”的幌子为掩护，过去和現在都力圖在国内建立他們那种法西斯的“新秩序”，迫使工人忍受资本主义壟断組織对他們的殘酷的掠夺。

麦 卡 倫 法

1950年9月23日，在由反动的报刊和电台所煽起的最野蛮的战争歇斯底里的情况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典型法西斯的、甚至与美国宪法显然抵触的所謂“顛复活动管制”法。这就是麦卡倫—伍德法，它是以法案的倡議者——当时領導参議院“国内安全”小組委员会的参議員麦卡倫和众議院議員、当时的众議院“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主席伍德的名字命名的。

还在1948年，国会就接到过类似的法案；这些法案的倡議者是：参議員蒙特和众議院議員、1953年起担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由于工人群众和一切民主的社会公众的抗議，反动的反劳工立法的这些試圖当时都失敗了。但是，1950年美国軍隊侵略朝鮮以后，出現了一种对反劳工立法的試圖最为有利的政治气氛，即出現了一种充滿对一切进步力量进行沙文主义攻訐的政治气氛。产联的卑鄙的分裂活动在此时期最为囂張，它阻碍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結，阻

碍着工人阶级为反对新颁布的反劳工的蒙特—尼克松法而采取齐心协力的行动。到1950年底，劳联和产联的领导集团实际上连做做样子要求废除塔夫脱—哈特莱法也不干了，这一事实也加强了反动阵营的地位，因而包含着前此两年内一些被否决了的法案的基本原则的麦卡伦—伍德法被通过了。

这个旨在反对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力量的法律，是对美国工人阶级民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直接的进攻。麦卡伦—伍德法的倡议者由于不敢公开禁止共产党和进步的工会，就把它们放在警察的公开监视之下，企图使它们实际上不能活动。为此目的，该项法律指令那些被它称为具有“共产主义行为”和属于“共产主义阵线”的组织要向司法部进行登记。审订法案本文的最反动的家伙们把“为着完成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当前任务”而行动的组织列为第一类。把那些有同情上述第一类组织并同它们有来往嫌疑的组织列为第二类。

正如大资本集团的机关刊物“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当时所公开解释的，任何的进步组织都可以列入这一类或那一类。这个杂志强调说，因为不仅争取和平的斗争，而且甚至是支持改善社会条件的计划，都可以毫无阻碍地被宣布为具有该项法律所规定的“危险倾向”的行动。为了在每一个别情况下决定这个组织或那个组织的纲领或实际活动是否符合这一定义，1950年年底根据麦卡伦—伍德法成立了以熟悉国家公务员“忠诚审查”的里恰尔德松为首的五个穷凶极恶的黑帮分子所组成的专门的“颠覆活动”管制委员会。这种依靠职业伪证人、奸细和警察暗探一帮匪徒而横行霸道的反动组织，有权要求共产党和进步的工会向司法

部进行登記，也就是把它們放在警察的監視之下。

麦卡倫一伍德法也包含了这样一些条文，它們實質上重复着史密斯“思想管制”法，并能借口任何組織或其成員参加在美国“建立極权專政的陰謀”而將其交付法庭审判。正如美国进步报刊所着重指出的，任何大罢工的領導者，特别是在那些执行軍事定貨的企業里的大罢工的領導者，都可能被控告有这种“陰謀”。依靠雇用的伪証人和其他这类“專門人材”的帮助，必要的“証据”是不难弄到手或伪造出来的。該項法律禁止对伪証人的假冒供和誣告提出控告，因而預先保證了他們能逍遙法外。

該項法律的專門章节授权檢察机关在美国总统宣布全国紧急状态的时候，把它所認為“不可靠的人”关入監獄或集中营。最后，該項法律允許檢察机关把任何它所認為“不良的”外国人看管起来或驅逐出境，即使这个人已在美国居住了几十年。为了了解这一条文的全部意义，还应当注意到美国工人階級中有不小一部分正是这种“外国人”，他們恰恰因为是进步組織的領導者和積極分子或持有进步观点而往往沒有取得美国公民資格。

虽然麦卡倫一伍德法并不公然反对共产党，但是毫無疑問，它的鼓吹者也同樣力圖使进步的工会失去領導，并使它們的活动陷于癱瘓。进步的杂志“政治事务”在1950年年底写道：“这个駭人听闻的法律是把鎮压、扼杀和消灭工人階級的一切組織(也包括工会在內)作为它的目的的。”麦卡倫一伍德法的措詞故意含糊不清，使法庭和警察能随心所欲地采用恐怖手段来对付工人运动，它是美国在法西斯化道路上的新步驟。

麦卡倫一伍德法与史密斯法和塔夫脫一哈特萊法實質

上是一丘之貉，其目的在于削弱或全部扼杀工人阶级的政治积极性，扼杀工人运动的战斗精神，限制罢工或宣布罢工为非法。塔夫脱—哈特莱法、史密斯法和麦卡伦法，乃是对工会、对工会的活动、对工会的集会、对工会出版的著作和代表工会的演说家所发表的意见加强政府监督的基础。总而言之，它们是建立希特勒法西斯类型的“劳工阵线”的基础。它们的目的并不限于迫害工人运动的战斗力量和进步力量，它们的任务是堵塞住工人运动一切可能的发展道路，使整个工人运动陷于瘫痪，使工人运动的一切组织服从垄断组织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

“紧急状态”，对共产党员和进步工会的迫害

反劳工的法西斯法律是为华尔街进行武装冒险准备后方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些法律并不是美国资产阶级企图以警察—法庭恐怖手段消灭工人运动的最后花招。垄断集团动用麦卡伦法和史密斯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塔夫脱—哈特莱法还没有全部体现美国反动派的希望，虽然这项法律已使工人组织受到严重损害。但是，为这两项新法律所加强了塔夫脱—哈特莱法并不能保证实现财政资本巨头们的愿望。1950年12月，反动杂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代表在与当时担任参议院“共产主义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参议员汉弗莱谈话时，对谈话人苦恼地抱怨说，进步工会不顾一切迫害和反劳工的立法而继续进行活动，并在选举签订集体合同^①的工人代表时不止一次地取得胜利。参议员能用什么安慰他呢？关于这些反劳工的法律，他丧气地供认：“这种立法证明要实现它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垄断集团当然并不放弃这种“困难”的事。它们要求越来越加

殘暴的反勞工的法律。它們繼續採取鎮壓工人運動的政策。

1950年12月16日，美國宣布了“緊急狀態”。“緊急狀態”的宣布是挑釁和冒險政策的典型的表現；這種政策正是現在美國帝國主義的特點。華爾街統治集團力圖利用這一時期美國侵略者在朝鮮的巨大的軍事失利來人為地在美國人民群眾中造成驚惶不安的情緒，恫嚇他們，促使他們錯誤地認為似乎有一種外來的危險威脅着國家。這種政治氣氛乃是現時美國的主子實現其使經濟急劇軍事化和對工人立即建立軍事苦役制度的計劃所必需的前提。

還在1950年12月，杜魯門總統就利用“緊急狀態”來鎮壓鐵路員工的罷工，頒布反對進步工會及碼頭工人和海員的工會組織的命令。這個命令的頒布是馬格納森法的發展。馬格納森法是1950年8月通過的，它使總統有權監督美國領海內船舶的行動，以保障美國的“安全”不致遭到“破壞”。在保障“安全”的借口下，杜魯門12月的命令使海防指揮部有全權取締那些被指揮部認為“有破壞活動嫌疑”的人留在港口和船舶上工作。不消說，船主也立即利用這樣廣泛的海上防務的全權來解雇進步工會組織的積極分子。然而這僅僅才是開始。

1951年6月4日，美國最高法院確認公然違反憲法的

① 這種選舉——工人在企業中投票決定應由哪個工會代表工人同企業主簽訂集體合同問題——是美國1935年根據華格納法實行的。塔夫脫—哈特萊法保存了這種選舉，但卻使這種選舉具有反動的意义。現時全國勞工關係局企圖利用這種選舉把一切進步工會從企業中排擠出去，并把代表權轉交給其他由反動分子所領導的工會。但是，雖然伴隨着選舉的准备工作而來的總是對進步力量的最殘酷的迫害，但身為進步工會會員的工人照例還是以多數票證明自己對這些工會的信任。

史密斯法具有宪法性質，从而承認1949年年底对被判处有罪的共产党领导人的非法迫害是“合法的”。一年以后，1952年7月，上訴巡迴法院確認根据史密斯法对馬里蘭州共产党組織领导人的判刑有效，并宣布說，共产党本身似乎就是“陰謀”，屬於共产党这件事本身就可以看作是違反法律，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的著作得不到宪法关于出版自由的保障。在美国只有反动的著作才有出版自由！只有为华尔街服务的政党才有政治活动自由！上訴法院所作的露骨的、厚顏無耻的“解釋”就是这样，这种“解釋”实际上是得到美国最高法院核准的。

1951—1952年，在全国範圍內对共产党员进行了大規模的逮捕，并对共产党员組織了可耻的审讯丑剧，其明显的目的是要使共产党不能进行活动。除了以前被宣判有罪的党的十一位领导人以外，1951年中期在紐約又有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和紐約党組織的以爱里查貝特·盖里·福林和皮蒂斯·佩里为首的十五位活动家根据史密斯法被捕并被交付法庭审判。在馬里蘭州、宾夕法尼亞州、加利福尼亞州、西北部各州和夏威夷群島等地，也都組織了审讯共产党地方組織领导人的丑剧。

在此时期，对进步工会的法庭—警察迫害也变本加厉了。其中，进步的联合电气工人工会的司庫爱姆斯派克和該会匹茲堡地方分会领导人湯姆·庫因的“案件”最为著名。因为他們拒絕帮助所謂“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这就如一位法官所宣判的，表露了对自己工会的“利益”的忠誠（也就是犯罪！），因而被判处監禁。在聖路易（密苏里州），这个工会的地方組織的领导人聖特納也被逮捕了。根据史密斯法，他也被提出“控告”。

还在1951年6月，进步的联合电气工人工会主席费茨热拉德在所写的、附于工会出版的小册子“为什么要組織审讯丑剧？”之后的一封信中，在評述国内的法庭—警察橫暴和反劳工恐怖的猖獗时，就这样写道：現在正尽一切可能企圖强迫所有的美国人民都默不作声，并使一切抗議公司（股份公司）政策的組織陷于消沉。这本小册子里写道：“为了粉碎进步工会，公司利用种种办法，包括政治迫害，組織私人工会，在报刊上发表仇恨的誣蔑言論以及組織审讯丑剧。”

美国壟断資本二大主要組織之一——美国商会担負起了調整、改善和进一步丰富这些手段的任务。1952年3月，美国商会下附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問題”委员会發表了一篇报告，报告中首先強調指出壟断集团十分憂慮，因为进步的工会至今仍在積極活动，并且正在許多工業部門中扩大其影响。正如报告的作者被迫供認的，进步工会所以有威信，是因为它們是“工人利益的战斗的捍衛者”。但是，这也正是使商会中那些富豪們惴惴不安的原因。他們的报告并不仅仅是鎮压进步工会活动家的信号。报告提出了一套警察措施和其他措施的战略計劃，这些措施，正如报告的作者所希望的，使企業主有可能把这些活动家从工会中排挤出去，并代之以自己的亲信，归根到底，建立起他們对工会組織的監督！

众議院的“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和参議院的“国内安全”小組委员会在实现商会的計劃方面，进行了十分積極的活动。

商会的計劃显然也鼓舞了国会，使国会在1952年上半年内为了新的反劳工法案而大忙特忙。这些法案不仅發展了塔夫脫—哈特萊法的主要原則，而且按其反动性質甚至

打破了这一类法西斯法律的纪录。其中最重要的是麦卡伦（“恢复活动管制”法发起人之一）、参议员梅本克和史密斯（“思想管制”法就是出于这个史密斯的手笔）的法案。

既然根据塔夫脱—哈特莱法并不能把进步工会从企业中驱逐出去，不能剥夺它们代表工人签订集体合同的权利，所以新的麦卡伦法案就提出干脆禁止它们有任何的代表权。新法案要求，只有它们的活动得到政府（实质上也就是企业主）赞同的工会，才有代表工人进行谈判的权利。新法案并要求，只有那些被列入政府（实质上也就是企业主）同意的候补人名单中的人，才能接替工会中的领导职务。这些“主意”是由美国商会和全国制造商协会的头子们授意麦卡伦的。而直接授意者是领导原子托拉斯的机构“通用电气公司”，这个机构渴望对进步的联合电气工人工会实行报复。企图同联合电气工人工会竞争的反动的冒牌工会的头子加莱（产联的司库），也在这样梦想。在加莱秘密的赞助下，托拉斯的领导人向国会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得到了当时的劳工部长托宾的同意，并成为麦卡伦法案的基础。

参议员梅本克的法案提议“修改”塔夫脱—哈特莱法的下列条款，这项条款使美国总统有权要求把业已宣布的罢工延期八十天，但是到这一限期结束时这项条款本身还是不能阻止罢工的爆发。梅本克要求：第一，把该项法律规定的延期延长到一百二十天；第二，如果在一百二十天内冲突还没有解决，那末根据他的建议受着罢工威胁的企业应转交政府机关监督，以便由政府机关来规定工资定额，并就由于发生冲突而引起的其他问题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罢工，因为这里所指的是整个工业部门或大部分工业的罢工，所以应该禁止。这就是梅本克所提出的建议的实质。

梅本克法案是同从1952年初起美国大資本集团展开的卑鄙無耻的运动有紧密联系的，大資本集团再次——这一年中已經有过一次了！——控告工会有“壟断活动”，說工会阻碍了劳动市場的“竞争自由”。过去这种“控告”是法院反对工会的决定的一般借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部分反劳工法案的倡議者都把規定禁止工会“壟断活动”，首先是禁止在整个工業部門範圍內簽訂集体合同的条款列入法案之內。塔夫脫—哈特萊法的最初草案也包含了这样的条款，但在众議院表决时被多数异口同声地否决了，沒有列入已經通过的法律本文。目前，华尔街巨头們又要求制訂禁止簽訂集体合同和禁止在整个工業部門範圍內举行罢工的法律。例如，1952年6月，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格里德宣称：“这个问题应当用禁止簽訂集体合同和禁止在整个工業部門範圍內举行罢工的办法来彻底解决。”

最后，壟断集团提出要求禁止扩及整个生产部門的工会，實質上也就是要求把大的群众性的產業工会分散为細小的軟弱無力的地方性組織。1952年6月，紐約的报纸“华尔街日报”高兴地向它的讀者，即交易所經紀人和銀行家报道說：“有势力的共和党人和南部的民主党人正在商量着破坏那些在全国範圍內組織起来的工会的計劃。”梅本克法案就是为了实现壟断組織所有这些計劃的一个步驟。

史密斯法案与梅本克法案不同，它不仅反对罢工运动，而且也直接反对工会；与麦卡倫法案也不同，它不仅反对进步的工会，而且也反对一般的工会。为了防止或破坏大罢工，它提出由法院任命的特派員来監督受着罢工威胁的企業，監督那些有會員准备停止工作的工会。但是，如果說法案所規定的对企業的監督實質上一定是虛構的話（法官——

实际上是壟斷組織的代理人——必然会委任企業主的代表来实行监督),那末,在对工会的监督方面,它却使法院的特派員握有切实的和广泛的权力。根据法案,他們有权剝夺工会支配自己的經費,以便阻碍对罢工者支付救济金。他們可以封閉工会为罢工者設立的食堂。他們可以查封工会领导机关的房屋,以便使工会的活动完全癱瘓。最后,这个法案以向法院起訴相威胁,禁止給罢工的工人(尽管已对他們的工会实行监督)任何的援助,对他們表示任何的同情。

美国共产党主席福斯特于1952年5月写給国会的信中指出:“史密斯法案所包含的条文的实質……在于使現存的工会变为……政府和公司按照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办法加以操縱的組織……使工会法西斯化的趋势在史密斯法案中达到了新的高峰。”^①

在1952年下半年总統选举运动中,国会暂时中止了上述和其他反劳工法案的討論。1952年夏,这些反劳工法案中仍有一个草案被通过成为法律,并在1952年12月生效。这就是麦卡倫—华尔特种族主义的侨民法案,它給一千四百万尚未取得和已經取得美国公民权的美国的移民工人造成了一种备受歧視地位。事实上这项新法律使几乎三分之一的美国工人阶级——連同家屬达四千四百万人——处于警察的經常監視之下。他們經常受到威胁,即可能因同被官方指为“破坏性”組織有联系的罪名而被任意驅逐出境。麦卡倫—华尔特法的鼓吹者在恐嚇移民的同时,打算搜罗一大批可以比較容易地当作工賊来加以利用的工人,因为

① 見威廉·福斯特“打倒反劳工的史密斯法案”,紐約,1952年版,第5頁,第16頁。

他們不敢加入工会并同意接受任何劳动条件，因而可以利用来降低他們的伙伴的工資并破坏工人运动。

麦卡錫主义

在1952年和1953年交替之时，美国壟断資本的統治集团在沿着使国家法西斯化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这个步骤是由于經濟危机業已显著逼近、对朝鮮冒險的明显的失败和同这些密切有关的美帝国主义的一切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尖銳化而引起的。壟断集团力圖把日益逼近的經濟危机后果的全部重負推在工人階級身上，粉碎劳动群众的必然的反抗，給工人运动以致命的打击，从而为进一步的武装冒險准备后方，这一切为美国的法西斯化开創了新的时期。美国的法西斯化是与共和党（現在已由华尔街巨头們使其掌握政权）的極其反动的右翼領袖參議員麦卡錫的活动有着紧密联系的。

1953年中期，美国共产党全国代表會議上的报告中着重指出：“从选举的时刻起，麦卡錫主义就变成了严重的威胁。麦卡錫依靠同盟者在財政方面的新的强有力的支持，开始集中地領導国内一切法西斯的势力和团体，以便为法西斯主义打下大規模的社会基础…… 麦卡錫主义是美国帝国主义走向战争和法西斯主义运动的产物，是准备战争的主要工具…… 越来越强大的美国壟断資本集团…… 豢养着麦卡錫，以便在必要时得到一个美国式的希特勒。”^①

麦卡錫主义的影响立刻就在国会内表現出来了。国会

① 見安德魯·史塔文森“爭取和平和民主的新时期”，紐約，1953年版，第31頁。

从1953年初起——已经是新的一届国会——就已着手讨论越来越反动的劳工法案。在1953年1—2月，国会的各个委员会开始审查那些建议取缔共产党、把共产党员关入集中营、从企业中解雇同所谓“颠覆组织”有联系的工人的法案。3月间，参议员鲁卡斯提出了加快审查关于禁止整个工业部门范围内的集体合同、罢工和工会的法案的要求。参议院和众议院约在同时收到了果尔杜特—罗兹法案，它发展了于1952年提出的麦卡伦法案的主要原则，规定“颠覆活动”管制局如果把某个工会的领导人列为“颠覆分子”，就禁止该工会代表工人同企业主签订集体合同。

也是在1953年春向国会提出的参议员巴特莱的法案，在这方面较果尔杜特—罗兹法案更进了一步。巴特莱建议：只要“颠覆活动”管制局控告（仅仅是控告！）工会有这类活动，就禁止工会代表自己的会员。如果实现了巴特莱的建议，统治集团就能够要求工会会员根据1950年的麦卡伦法进行登记（也就是把他们置于警察的监视之下），和根据史密斯“思想管制”法把他们的领导人交付法庭审判。国际开采冶炼工人工会主席克拉克在1953年9月说：“巴特莱法案是公开的、直接的、恶毒的破坏工会的工具。它企图使工会运动变为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的那种劳工阵线。”

1954年初，华尔街的立法者进一步地和大肆嚣张地试图彻底取缔共产党、瘫痪罢工斗争和工会活动。1954年1月，总统向国会提出咨文，建议褫夺进步力量的代表人物的美国国籍；他们是根据史密斯法在所谓“煽动以强力或暴力推翻美国政府”的借口下被起诉的。甚至资产阶级的报纸“纽约邮报”也认为这个建议“从宪法的观点上来看比麦卡锡的任何建议都更为可疑”，这个建议已经以法案的形式向

參議院和眾議院提出。它要求宣布一切“顛复分子”即进步力量的代表不受法律保护,以及宣布全体共产党员为“非法的顛复陰謀”的参加者,国会对这一法案也进行了討論。

1954年1月,政府向国会提出了对塔夫脫—哈特萊法的一系列“修正”。大家知道,“修改”这个法案是共和党人最重要的竞选諾言之一。按照共和党人在选举前的說法,“修改”应当符合工人的利益和“社会正义的要求”。但是,正如早就預料到的,向国会提出的那些“修正”却是朝着直接相反的方向,更加加深了这项法律的反劳工性質。它們規定,如果某一个工会号召自己的會員举行罢工,政府的全国劳工关系局应当按照对工会活动进行监督的办法在这些工人中間举行投票,以决定他們是否真正同意罢工。工会的报刊認为对工会建立这类监督是使工賊活动合法化的手段。甚至像劳联的主席米尼也宣称,批准类似的“修正”将会成为“露骨的镇压罢工的手段”。

政府所建議的另一个重要的“修正”,規定扩大各州在监督工会活动方面的权限。关于这一点,资产阶级的报纸“快邮日报”写道:“坦白地說,各州的劳动立法較之联邦的劳动立法具有更加殘酷的性質……在十三个州、特别是南部各州,甚至根据塔夫脫—哈特萊法工会还保有的一些权利也都被剝夺了。”正如产联領袖之一貝恩所宣称的,如果極其广泛地采用政府所建議的这些極端殘暴的反劳工法,“工会就将寿終正寢”。

在国会內高举最黑暗的反动旗帜的現代奴隶主的法西斯陰謀、野蛮地迫害进步組織、建立集中营、联邦調查局公然炫耀在它的卷宗內保存着一亿一千三百万美国人的指紋、警察局的好細和密探匪幫到处奔走——凡此种种,在国

內造成了不祥的恐怖气氛。

1953年2月，共产党的十三位领导活动家，其中包括爱里查貝特·盖里·福林和皮蒂斯·佩里，被紐約法院判处長期監禁。

到1953年初，有四十四位美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被判处長期監禁，五十四位活动家受到法庭审讯和在待审中。1953年7月，在費列得菲亞又有六位工人和黑人解放运动的活动家被捕。这里所指的这些活动家中有许多人是著名的进步工会工作者。这些活动家中有联合电气工人工会的领导者之一戴維特·戴維斯。曾是海員工会的领导者之一的列南，由于写了一篇紀念美国共产党主席福斯特七十寿辰的文章而受到法庭审讯。刷牆工人工会紐約組織的書記、著名的工会活动家文斯托克(上面所提到的在1953年初被判罪的十三个共产党员之一)，由于在工人学校中講授美国工会运动史而被判处長期監禁。进步的国际毛皮工人工会主席本·哥尔德和进步的全国海船厨师侍者工会主席海尤·布萊遜受到控告。業已被捕的进步的碼頭工人工会夏威夷地方組織的领导人杰克·华尔也被交付法庭审讯，并于1953年春被判处長期監禁。令人值得注意的是，警察局暗探曾經秘密地向华尔提出建議，如果他同意他所领导的組織退出碼頭工人工会，就可以終止审讯。这种卑鄙的建議清楚地暴露了对工人阶级利益的忠实捍衛者橫加蹂躪的真正目的和違法性。

1953年10月，西雅圖(华盛顿州)法院把美国西北部地区共产党組織的主席亨利·卡夫及另外四位进步活动家判处長期監禁。11月初，“工人日报”駐賓夕法尼亞州的記者道尔生因为曾經要求停止朝鮮战争而被加上“煽动叛乱”罪

名)并被判处二十年徒刑。

1953年10月,被監禁的共产党領導者之一罗伯特·湯姆遜在監獄里被謀殺了。有一个显然希望获得釋放、也許是被監獄当局直接收买了的刑事犯,用金屬塊猛击湯姆遜的头部,打碎了他的头盖骨。“工人日报”特別指出,这一事件是美国現時日益扩大的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歇斯底里的險惡浪潮所造成的政治謀殺。

对1953年6月19日在紐約新新監獄电椅上被处死的美國兩位爱国者——罗森堡夫妇的嚇人听聞的殘害,也正是为了嚇唬美国人民和加强国内的战争狂热。进步的国际毛皮工人工会代表斯特勞斯在罗森堡夫妇未处死前評論这一殘害無辜者的事件时宣称,如果他們夫妇死了,这“將是美国一次空前殘暴的政治謀殺,是像希特勒堵塞德国人民的嘴巴那样堵塞美国人民的嘴巴的一种試圖”。

对美国黑人橫加种族主义的暴行和殘酷的鎮压,乃是統治集团恐怖政策的最野蛮的表现之一。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七年里,已有三千多黑人遭到三K党^①匪帮和其他法西斯匪帮的襲击,經過“审判”或未經审判而被处死或成为殘廢。对黑人凶暴的迫害和屠杀具有駭人听聞的性質和規模。

1951年,八十八位著名的美国黑人活动家給联合国大会的呼吁書里說:“在現時,任何一个美国大城市:从紐約到克利夫蘭或底特律,从華盛頓——美国的首都——到芝加

① 三K党是美国壟斷組織和南部大地主的御用工具,是一种法西斯的反动暴力組織。它于美国国内战争后,1867年在美國南部成立,最初目的为杀害黑人。一度被查禁,1915年后恢复,暗杀、恐嚇对象扩大到犹太人、天主教徒、革命工人和社会主义者。——譯者注

哥，从孟菲斯到亞特蘭大或北明翰，从新奥尔良到洛杉磯，都因杀害無辜的黑人而蒙受耻辱。”

在美国侵略朝鮮期間，在路列尔(密士失必州)，黑人威利·麦基因莫須有的强奸白种妇女的罪名被处死；在馬丁斯威尔(弗吉尼亞州)，有七个黑人也以这千篇一律的和莫須有的罪名被处死；而在米姆斯(佛罗利达州)，黑人解放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穆尔的房屋被三K党恐怖分子炸毀，穆尔本人和妻子同被炸死。但是这仅仅是最著名的事件。还有很多事件并没有为人所周知，只是在美国报纸上的簡訊杂聞欄中略略提起，或者根本没有报道。

在紐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加者黑人捷利克和克利斯青，被警察無故槍杀了；容凱斯(紐約州)黑人布萊克諾尔兩弟兄，华盛顿黑人斯莫尔烏特，霍莫斯(佛罗里达州)黑人捷費尔遜，龐恰克(密执安州)黑人男孩布朗也都被警察無故槍杀了。1952年12月3日在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州)又有一个黑人被警察無故打死，他已經是該城当年中第十二个無辜牺牲者了。亞特蘭大(佐治亞州)的地方政府同三K党一起祝賀警察耐施，因为他在南方打死黑人比誰都多。

法西斯恐怖的濁浪在國內高漲起来。千千万万公民被恐怖籠罩着。不是別人，正是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威廉·道格拉斯这样写道：“人人都怕失掉工作，都怕調查，都怕受辱示众。”

最高法院的另一个法官罗伯特·杰克遜曾声称，“人民是疲憊的和毫無幸福的”，他并強調說，“不法行为……暴行、犯罪、營私和舞弊”在美国被看作是“很自然的和理所当然的事”。

这就是美国財政寡头为了替自己的軍事冒險准备后方

所造成的状况，这就是美国壟断組織的巨头們过去和現在都認為是实现其經濟軍事化計劃所必需的条件，實質上也就是利用国家机器来駭人听聞地掠夺劳动者、使人民群众进一步絕對貧困化和相对貧困化以保証亿万富翁的最大限度利潤的計劃所必需的条件。

掠夺劳动者的制度

經濟軍事化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时期的特点。战争結束并没有使美国恢复和平时期的經濟条件。还在1944—1945年，华尔街集团就已經提出了一些战后如何組織經濟和国家机器使之具有經常的軍事性質的計劃。根据这个計劃，应当使人們的意識中不存在什么非战时的和平經濟的概念。摩根的康采恩“通用电气公司”總經理查尔茲·威尔遜在1944年1月出席全国制造商协会某一組織的會議时曾經說过：“也許，我們甚至應該丟掉‘战争經濟’和‘和平經濟’这种不正确的術語”。他实际上說出了这种“願望”：要使壟断組織和軍閥之間在战后也保持密切关系，以便美国永远变为軍国主义的国家。

这种来自权威界的“願望”，显然是被接受，并付诸实现了。杜魯門總統奉行了竭力使壟断資本康采恩的領導人和軍閥的代表充塞国家機構的政策。1953年初艾森豪威尔總統在这一方面采取了有过之無不及的新步驟。在艾森豪威尔的政府中，几乎所有的部長职位都为美国壟断資本的三个主要集团——洛克菲勒、杜邦和摩根——的領導人取而代之，这三个財閥集团在对美国武装部队的軍火供应方面獲得了数十亿美元的利潤，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把一些生产原子武器的主要企業全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随着国家最重要的职位轉到財政資本直接的代表手中，美国的軍国主义化也加速了。还在1947年，所謂“保障安全”法已为成立一个專門机构奠定了基础。这个机构的任务是：动員工業和實質上使国内尚未复員的經濟再走上战争軌道。美国侵略朝鮮为进一步扩大这个根据1950年9月所通过的“国防生产”法而成立的机构找到了借口。最后，杜魯門在1950年12月所宣布的“紧急状态”，正被壟断組織用来作为完成和运用对經濟作軍事“調整”的整个体系的新借口。

在美国軍隊侵略朝鮮的最初六个月里，美国建立了以国防动員署为首的一系列軍事經濟机关。这些軍事經濟机关的使命是按照拥护“个人主动性”、拥护榨取最大限度利潤的自由的人所要求的那样来“調整”經濟生活。“通用电气公司”康采恩的總經理查里茲·威尔遜被任命为国防动員署、也就是整个軍事經濟机关体系的领导人。

当时对威尔遜和他所领导的国防动員署的机关所提出来的直接任务，就是保証把軍事定貨和供应都集中在主要壟断組織的手里，保証按照最低的价格供应他們原料和按照最高的、投机的价格購買他們的产品。下面就是美国反动杂志“美国新聞与世界报道”在1952年10月底所引用的一些材料：一只轟炸瞄准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价值五万美元，而在朝鮮战争时期漲到二十五万美元；以前价值五万四千美元一架的战斗机，到1952年却要使国庫花費三十七万五千美元；中型轟炸机由二十一万八千美元漲到二百五十万美元，中型坦克从八万一千美元漲到三十万美元。根据这个杂志的材料，平均用在每个美国軍人身上的費用，1950年为七千六百美元，1952年达到一万一千二百美元，

1953年則要達到一萬二千七百美元。這就更加清楚地證明了，美國的軍事“調整”體系保證了壟斷組織的巨頭們空前未有的高額利潤。

“調整”體系的主要任務在於，把軍費撥款的全部重負強加在勞動者的肩上，在與通貨膨脹作“鬥爭”的幌子下降低實際工資。為此目的，根據“國防生產”法建立了兩個機關：物價穩定局和工資穩定委員會。驟然看來，這兩個機關無論對工資或者對物價都應該使之保持穩定的水平。但是，實際上“穩定價格”的政策乃是騙人的宣傳，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虛構的東西。它並不阻止生活費用的增長，而“凍結”工資定額才是工資穩定委員會的實際政策，它在經濟軍事化計劃上占據中心地位。

美國工人生活水平在美國侵略朝鮮以前已在不斷下降。可是侵略朝鮮又開創了美國實際工資下降的新時期。工資穩定委員會這個實際上代表着企業主反勞工的聯合陣綫的國家機關，採取了一系列行政命令，禁止把工資定額提高到一定限度，雖然它大大落后於市場物價上漲速度。美國工人階級直接對反對提高工資的企業主，又對工資穩定委員會規定的“限度”進行了頑強的、時常是有效的鬥爭，迫使統治集團作了一些讓步。在對朝鮮進行軍事侵略行動的時期內，美國的工資定額只提高了百分之十三，即甚至比工資穩定委員會所允許的限度還要低。可是，根據美國電氣工人工會的材料，這一時期生活費用卻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換句話說，美國工人的實際工資在1953年比美國帝國主義在朝鮮冒險的前夕更低了。

美國工人實際工資的降低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比起來更加驚人。按照主要根據加利福尼亞大學專門委員會調

查的材料所作的統計，美国生活費用指数从1939年起这段时期內提高了一倍。而根据官方的材料，在此时期美国加工工業的工資指数，扣除稅款以后，才增加半倍多一点。由此可見，1951年年底实际工資几乎比战前降低了一半，即为1939年水平的百分之五十九点六。在1952年、1953年和1954年上半年这一时期中，美国的实际工資进一步降低了。

物价不断上漲是实际工資降低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1950年“国防生产”法所規定的所謂“穩定价格”乃是虛構的东西。但是并不仅仅如此。“国防生产”法还有它自己的一段历史。这项法律經過三次——1951年、1952年和1953年——修訂，这些修改不仅对“穩定价格”毫無帮助，反而直接加剧了物价的上漲。

1951年通过的凱普哈斯的修正案，允許壟断組織只要它們能“証明”它們的生产費用已經提高（要得到由壟断組織的代表負責的物价稳定局的“証明”当然是毫無困难的）就可以提高价格。关于这种或那种被同时通过的修正案，联合电气工人工会的領導曾有充分根据地指出，它們的目的是要提高市場价格，使房租更加上漲和进一步“冻结”工資，是要以書面保証增加企業主的利潤，并促使美国人民进一步貧困化。

至于1952年的修正案，根据統治集团的供認，它們意味着使工人購買粮食的費用增加百分之二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联邦对房租的管制……也就是說使六百万家庭的房租提高了”。最后，1953年上半年，艾森豪威尔總統完全廢除了对物价甚至純粹是形式上的“管制”，而从1953年7月31日起，对房租进行的“管制”也不复存在了。

廢除对物价的“管制”并不意味着艾森豪威尔政府摒弃了杜魯門政府的政策。其实，廢除对物价的“管制”正是繼續杜魯門政府的政策，不过条件已經改变——这时日益逼近的經濟危机的征兆已經特別明显，对企業主來說單是政府允許提高价格还嫌不够，需要政府直接协助提高价格。此外，如果說杜魯門的“管制”是掩盖物价上漲的騙人的宣傳，那末，1953年所宣布的“經濟势力自由竞争”的政策同样也是騙人的宣傳。这种政策之所以需要，是因为“管制”的騙局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揭穿了。这种政策是用来掩飾某些措施（主要是扩大通貨膨脹），而壟断組織和政府企圖借助于这些措施把零售价格保持高度水平。1954年春的最新材料証明，价格不仅保持高度水平，而且还在繼續上漲。

至于房租，从1953年7月31日起，五百五十万房屋承租人的房租又显著地提高了。同时，甚至根据官方的材料，美国城市的房租最近几年来本来已經大大上漲。从1949年起，許多大城市的房租平均提高了百分之二十，而其中有一些城市的房租甚至提高了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并且正是那些生活只有最低保障的家庭，房租提高得最多。

除了物价和房租上漲而外，各种捐稅大大增加，也是在对經濟作軍事“調整”的条件下降低美国劳动群众生活水平的最重要因素。美国在1952-1953預算年度征收賦稅——直接的和間接的，联邦的和地方的——的总額約为九百二十六亿美元，几乎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多一倍。紐約“花旗銀行”公报为了清楚地表明捐稅負擔的加重，把国内居民納稅总額和他們購買粮食的費用总額作了一番比較。它得到了一个十分确鑿的結論：1929年賦稅总額要比購買粮食的費用总額少二分之一，而1952年賦稅总額則比購買粮食

的費用總額多二分之一！壓得美國人民喘不過氣來的和把人民的財富浪費在軍備競賽上來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利潤的壟斷組織的巨頭們，簡直是在奪取美國人民的口糧。

在美國對朝鮮進行軍事冒險期間，各種捐稅更加飛快地增加起來。1949年平均全國每人負擔各種捐稅三百六十七美元，1951年已經增加到五百六十四美元。僅就聯邦所得稅來說，全國每人支付稅款平均從1950年中期的一百三十美元增加到1952年中期的二百零七美元！勞動群眾交納的稅額更是急劇增加。1950年10月生效的提高所得稅法，規定對每年收入不下十萬美元的人，即對億萬富翁們，稅率增加百分之十四，而對每年收入在三千美元以下的人，即對工人，稅率增加百分之二十。以後，賦稅的負擔也是根據這種原則分派的。具有中等工資收入的加工工業的工人1952年繳納的所得稅比美國侵略朝鮮前增加了一倍半。但是，除了直接所得稅以外，美國工人還要繳納大約兩倍的間接稅，占工人所購買商品的零售價格的百分之三十六到六十三。直接稅和間接稅加在一起，至少要吞掉每個工人全部工資的三分之一。著名的美國進步經濟學家維克多·伯爾勞指出，美國工人所交納的直接稅和間接稅總額，在1952年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增加一倍。

必須着重指出，由於軍備競賽和億萬富翁們靠軍備競賽而大發橫財所引起的捐稅掠奪還絕不僅限於此。1954年1月1日，為了籌措對朝鮮冒險的軍事撥款而於1950年和1951年實行的專門稅法有效期滿。可是，稅負因而減低的只是壟斷組織和一部分比較富裕的人。而對於大部分工人，捐稅並未減少。相反地，政府用了一系列的陰謀詭計，甚至得以進一步提高對報酬最低的勞動者的課稅。即使根

据美国资本主义报刊的统计，一个全年收入二千到二千五百美元的工人家庭，1954年应缴纳的直接税比1953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以上。此外，美国报刊还预言说，主要由人民群众缴纳的新间接税即将实行。

美国工人贫困化的增长

美国加工工业——美国工人人数最多的部门——工人的平均工资几乎比官方宣布的最低生活费用还要少百分之二十。甚至根据美国政府机关的统计，全部美国工人的家庭有百分之七十五无力支付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1950年，收入不能相当于甚至官方宣布的最低生活费用的家庭要比现在少。当时它们占全部家庭数的百分之六十二，而在1947年时占全部家庭数的百分之五十八。换句话说，美国工人群众的生活水平正在不断下降，处于贫困境地的家庭数日益增多。

消费下降清楚地证明了美国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急剧降低的事实。甚至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时期，美国按人口计算的食油消费也比1951年多。1946年美国工人消费的食油也比1951年多百分之七点六，蔬菜多百分之七点四，肉类多百分之十。根据官方的材料，1952年全国按人口计算的粮食消费比1946年降低了百分之十七。由此可见，正是在美国对朝鲜军事冒险的几年内，消费特别急剧地缩减了。

盖里(印第安州)的一个熟练的钢铁工人乔·圣契斯对工会杂志“劳工进军”的记者说：“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物价不断上涨，勉强维持生活都不行，我的工资现在是分文不值。”

艰難的狀況当然并不仅仅是美国冶金工業工人的命运。例如，特倫頓(新澤西州)的“威斯汀豪斯”机器制造厂一个工人的妻子、两个幼兒的母亲艾琳·布朗对工会报纸“联合电气新聞”的記者說：“我丈夫去年每小时得到十分錢的附加工資，現在也因加班加点多掙一点錢，但是扣除捐稅以后他帶回家的錢几乎只有以前那么多。因为物价猛漲，甚至买不到以前那些东西了。”艾琳·布朗接着說：“我已經記不起我們最近一次买肉是哪一天了。”当問她有無力量購買衣服时，她摆了摆手說：“我們完全沒有力量为孩子或为我們自己买衣服。每一次，看起来額外加班所掙的錢还剩下几元的时候，就有人害病，不得不开銷医藥費。甚至連看电影的錢也攢不起来。”

美国工人的居住条件正在日益惡化。美国在很久以前就鬧着严重的房荒。1950年的住宅登記表明，美国有三百五十万家庭住着破爛的房子，而一千一百万家庭，即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住着不合正常生活条件的房子。在紐約据登記有二十六万家庭根本沒有住所，有五十多万家庭住在应拆毀的房子里。

貧民窟是紐約、芝加哥、旧金山和其他一些大城市的特点。貧民窟对房产所有者來說乃是真正的金窟。成千上万的貧困家庭住在閣樓上，住在地窖內，住在有倒塌危險的房子里，还不得不把一家之主所掙工資四分之一以上用来支付这种“住宅”的房租。例如，在紐約，貧民窟內的房子給房产所有者的投資帶來百分之百的利潤。另一方面，剛盖成的房子却常常空着，因为大多数劳动着住不起这些住宅。关怀房产所有者的利益、力圖不使貧民窟受到竞争威胁的杜魯門政府，在1952年初通过了一項关于国家的住宅建筑較

1951年縮減百分之四十五的決議，而國會在1953年中期通過1953-1954年度預算時，把住宅建築的撥款幾乎削減為零。這種政策必然意味着房荒的進一步尖銳化和美國勞動者居住條件的進一步惡化。

然而，美國工業中的勞動條件是這樣惡劣，工人現在必須比以前有更好的飲食、更高的消費和更好的居住條件，才能正常地恢復消耗掉了的精力。美國的企業主越來越不願使企業的技术設備現代化。他們更加千方百計地靠延長工作日和加速傳送機的運轉來提高產量。即使在採用新機器時，伴隨着技術的新設施而來的也一定是勞動的進一步強化、血汗制度的加強。與華爾街在朝鮮的武裝冒險有關的美國經濟的軍事化，使這種制度得到特別廣泛的運用。

根據官方1953年中期的材料，美國有四百六十萬工人一天工作九到十五小時，有二十五萬工人甚至一晝夜工作十五小時以上（雖然同時有幾百萬工人或者完全沒有工作，或者一星期只工作兩三天，甚至只工作一小時）。與此同時，從在朝鮮冒險的最初幾個月起，美國工業的主要企業中就趕緊制定並立刻實行工人“加速動作計劃”。在克萊斯勒汽車公司的工廠中，動作的速度提高了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在福特和“通用汽車公司”康采恩的工廠里，進行了一種不僅加速動作而且消除“多餘”動作的運動。

1953年初，美國的一條鐵路干綫幾乎爆發了罷工，因為管理機關要求工人（用工人的話說）提高勞動強度和加速動作到使“工作的安全受到威脅”的程度。至於工業，1949年在底特律舉行的生產衛生問題代表會議業已指出：“工業中，由於裝配設備的工作速度日益增進，患心臟病死亡的人最多。”但是，從1949年起，這種工作的速度大大增加了。下

面举出的一項事实証明美国現在加强劳动强度的方法是何等的耗人精力：如果說过去企業主避免雇用四十岁以上的工人，那末現在他們經常連三十岁以上的工人也不雇用了。

在美国各州的大小工厂中，伤亡事故的增加，乃是采用血汗制度、企業主在安全技术上的“节省”和美国工人阶级生活条件整个惡化的結果。甚至杜魯門在1952年6月發言时也不得不承認，生产中伤亡事故正在不断增加。1950年伤亡事故增加了百分之四，1951年又增加了百分之九。1952年，生产中由于不幸事故死亡了一万五千人。此外，还有一千五百人完全和永远丧失了劳动能力，將近二百万人暂时丧失了劳动能力。在冶金工業和煤矿中，伤亡事故大大增加。1952年，煤炭工業中有五百四十六名矿工死亡，三万六千八百名矿工成为殘廢。

美国工人的社会無权地位

国内存在大量的失業者和半失業者，乃是美国工人阶级生活水平降低的十分重要的因素。即使在侵朝战争时期，失業現象也是非常严重的。在最近一年来，失業現象由于經濟危机而更加急剧扩大了，虽然由于軍事生产、由于动員了数十万有劳动能力的人参加武裝部队而使失業現象的增長有了一定程度的緩和，官方的統計却掩盖了失業現象的真实規模。根据1954年3月的官方材料，“劳动力严重过剩”地区的数目增加到了六十八个，而1952年的时候不超过十八个。根据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統計，1954年4月完全失業者总人数达到了五百五十万。更精确的統計数字是八百万到九百万。局部失業者（其中包括一星期只做一小时工作的人），在1954年1月共有九百万。毫無疑問，从那时起

这个数字又增大了，因为1953年年初在業工人平均每星期有四十一小时的工作，而在1953年11月他們每星期只有三十九点九小时的工作，在1954年2月他們每星期只有三十九点四小时的工作了。

美国的报刊，特别是工会的报刊，憂虑地指出了群众性失業現象的增長。国际开采冶煉工人工会执行委员会在声明中說道：繼三十年代的蕭条之后，第一次出現了整批充滿失業者和破产的小企業的城市。在我們这个工業部門中，數千名工人被解雇了。另外一些工人的工作日和工資日益減少。其余的工人也受着失去工作和工資的威胁，因为危机开始扩及其他工業部門。在汽車工業和農業机器制造厂中，失業現象特別显著地增長起来。在1953年一年內，這兩個部門中共有二十三万七千名工人失掉工作。在冶金工業中，約有二十万失業者和二十五万以上半失業者。在紡織工業中，有十二万五千失業者和三十七万五千每星期只有兩天到四天工作的人。

失業者的状况十分悲慘。美国沒有全国性的失業保險制度，而各州政权机关給予失業者的救济又是微乎其微的。大概有一半失業者实际上被剝夺了領取補助金的权利。根据各州現行法律發給失業者的救济金，無論如何也不超过官方宣布的最低生活費用的四分之一，并且最多也只能發到二十六个星期。正如产联主席在1954年6月中旬所声明的，五十多万正式登記的失業者已經因此失掉了領取救济金的权利。

直到最近，1935年所通过的联邦社会保險法还是有效的，它禁止各州政权机关借口失業工人不同意頂替罢工同事的工作（即不同意当工賊）或者拒絕以退出工会或参加

公司工会^①为条件取得工作而不發給他們救济金。但是，国会在1930年竟根据以塔夫脱为首的反动参議員集团的提議通过了諾蘭的修正案，修正案取消了法律中关于这项禁令的条文，从而批准了企業主企圖利用失業現象来鎮压罢工斗争和削弱工会的通常做法。

諾蘭的修正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期美国国会全部活动的典型。在此期間，几乎一切社会立法的法令都使劳动条件和劳动者的狀況更加惡化了。这些年以来，几乎一切或多或少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法案，国会都未予通过。極端的社会無权地位是美国劳动者狀況的特点。無論是劳动保护，無論是每年的假日或者是妇女怀孕和生产的假日，甚至是每星期的休息日，联邦的立法和大多数州的法律都未予保証。关于工人因为生产中不幸事故造成殘廢的补偿問題，按照法律的規定，有半数以上的受难者通常并不能得到任何补偿。在四十八个州內只有四个州实行疾病保險，允許患病的工人从生病的第八天起領取少得可憐的补助金——最多只及最低生活費用的四分之一。掌握在商人手中的居民医疗設施要收費，而且十分昂貴。在最便宜的一类医院治病，每星期还得付二百美元。这就使得將近四千四百万美国人——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不能得到最起碼的医疗。

甚至根据官方的材料，每年有三十万以上的美国人由于缺乏医疗而死亡。根据同一材料，將近二千八百万美国人是慢性病患者，每年有数万人住入瘋人院，而且患精神病

① 在工業公司的代理人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以瓦解工人运动为目的的冒牌工会叫做公司工会。

的人大約占全國病床半數床位。

美國廣大勞動群眾的狀況急劇惡化已達到這樣驚人的程度，以致1952年總統選舉前夕，兩大資產階級政黨的代表在他們競選的蠱惑宣傳中也不得不涉及這個問題。民主黨的候選人史蒂文森曾就“美國人民特別嚴重的狀況”誇誇其談。他甚至承認，至少對於一千一百万美國家庭來說，軍事的“繁榮乃是一種嘲弄”。

對千百萬被億萬富翁掠奪的人們來高談“繁榮”，也就是對他們的嘲弄。在美國高談闊論“繁榮”，像反動報刊所談論的那樣，也就是對大多數美國工人的嘲弄，因為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絕大多數的美國工人沒有可能保證他們的家庭能有體面的住所、足夠的飲食和必要的醫療。史蒂文森所談到的這一千一百万家庭的狀況，是真够悲慘的。他們每年的“收入”，甚至就連美國政府機關認為是健康的和文明的生活所最起碼必需的東西的一半都不能保證得到。他們在無止境的貧困、最殘酷的剝削和壓迫的條件下生活着和工作着。他們的無權地位近似奴隸，而且往往達到了真正是奴隸的程度。

頌揚“美國生活方式”的反動下流作家，都避免談到這些備受壓迫的人的遭遇。當他們不能避而不談的時候，就轉彎抹角地和含糊其詞地談些什麼“事故的犧牲者”、“成見的犧牲者”或者“倒楣的人”，這些人由於命定的各種情況的湊合而沾不着華爾街“文明”的光。但是，要知道這一千一百万家庭——所謂“事故的犧牲者”——占全國人口四分之一以上啊！

占美國全部雇傭勞動者百分之三十以上、約一千九百万女工和女職員的大軍的極大一部分就是屬於勞動人民中

最受压迫的一部分。甚至在主要經濟部門中——在雇用了四百万以上妇女的加工工業中，她們的平均工資也要比男工的平均工資低百分之四十二。美国女工的平均“收入”还达不到男工收入的一半。四分之一以上有工作的妇女掙的工資只有官方宣布的最低生活費用的八分之一。

約有二百萬照例整个家庭(包括不滿十岁的兒童在內)都在工作的流动农業工人，也屬於最受压迫的一类。实际上他們被剝奪了一切公民权，而他們的孩子照例沒有上学的机会。1952年得克薩斯州大学所进行的專門調查表明，在該州棉花种植場、蔬菜 and 水果罐頭工厂做工的流动工人，每小时掙的工資只有二十五到四十分錢，即比官方宣布的最低生活費用少五分之四。此外，他們不得不向工厂主和种植場主的鋪子購買生活必需品，而付出比当地居民購買同样商品要高得多的价錢。

主要住在与外界隔离的地方、生活極其贫困的印第安人——国内殘存下来的从前的土著居民——所处的境遇十分駭人听闻。各种疾病(防止这些疾病的蔓延是完全可能的)灭絕着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死亡率为白种人死亡率的十倍到二十五倍。

共有一千五百五十万美国黑人劳动居民受着極其残酷的剝削和压迫。

虽然宪法在名义上保障黑人有选举权和其他民主权利，但是实际上他們并不能享有这些权利。南部各州的黑人因为試圖参加投票就会送掉性命。但是即使在北部，黑人也是在野蛮的警察專橫下生活着的。在紐約和芝加哥这样一些城市里，存在着真正的黑人犹太区，黑人違反任何不成文的种族隔离規章，都要付出昂貴的代价。只举出 1951

年初在芝加哥城郊齐采罗發生的事件，就足以确鑿地說明这一点。当时一个黑人家庭打算搬到白种人附近居住，一群被地方种族主义者所招募的凶暴的流氓在警察同意和参加下竟把这家黑人的住宅搗毀了。

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政策、对黑人的歧視、蓄意在白种人居民中挑起反黑人的情緒，这都是首先为了保証壟断資本能有源源不絕的廉价的和按低等标准支付报酬的劳动，从而攫得最大限度的利潤。

不久前公布的參議院劳工和社会福利委员会的报告不得不勉强承認，“整个說来，黑人的处境比我們白种公民恶劣”。报告中說，材料表明極大一部黑人工人和从前一样仍在从事工資低微和無需熟練程度的劳动，主要是当僕人和小工。黑人工人一年的工資不到白种工人平均工資的一半。

进步的联合电气工人工会副主席馬克里什1952年5月在美国參議院小組委员会中發言时說，黑人区的房租比白种工人区的房租高，而房子却很坏。黑人区的物价比其他区高，虽然运到黑人区發售的都是一些質量低劣的产品。即使根据官方的材料統計，从1945年到1950年，黑人实际工資的减少和白种工人实际工資的减少也为三比二。1950年在美国北部各城市，白种居民中有百分之五点七的男子失業，而有色居民中有百分之十四点二的男子失業。正如馬克里什以充分論据所強調指出的，种族歧視使得黑人居民陷于貧困。

为华尔街巨头們所雇用的政論家伪善地重复着万事如意的論調，似乎在美国劳动是“自由的”。但是事实上千百万遭受悲慘的貧困、实际已被剝夺公民权利、受到最可惡的

种族歧视和民族歧视的人的劳动岂能是自由的！数十万流动（更确切地说是永远流浪的）工人的劳动，千百万遭受残酷剥削的女工的劳动，以及被迫在“科学的压榨血汗制度”条件下为垄断资本最大限度利润而辛劳的美国全体工人的劳动岂能是自由的！

自由对劳动者来说，首先就是免受剥削、免受饥饿、免受失业威胁的自由。类似这样的自由在美国是一点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必然是被迫的、强制的。马克思曾经写道，资本主义是雇佣奴隶制度。今天美国的实际情形处处都能证实马克思这一定义。道道地地的奴隶制和强制劳动在美国并不是希奇的事。

1952年下半年，美国新闻记者史泰逊·凯纳狄提交联合国委员会一份备忘录，其中援引的大量事实证明美国有五百万以上的人处于奴隶地位，他们的劳动是奴隶式的、强制的劳动。

凯纳狄写道：“人们被强暴地抓去，当作奴隶买卖，每人的价钱在五到五百美元之间。男女遭到拷打，被圈在铁丝网内，在武装的卫队的监视下进行工作，被单独的和成群的加上镣铐。”^①

这些被奴役的人们大多数是黑人、波多黎各人和首先是根据定购合同运入美国的墨西哥人，以及非法来到美国寻找工作的人。这些人中也有来自美国南部各州的白人。他们通常在棉花种植场、农场、造林场和松节油工厂中工作。使他们沦为奴隶的主要方法就是债务盘剥。因为被迫在主人的小铺子里买一切东西，并付出三倍的代价，他们很

^① 见1953年2月8日苏联“真理报”。

快就負了一身債，這些債務由於高利貸利息和經常剋扣債戶這些因素而急速地膨脹起來。微薄的工資使工人不能還清欠債。剩下的一條路就是把自己完全交給主人支配，主人因而獲得對幾千個人的最高權力，獲得毫無限制地剝削他們和他們家屬的勞動、對他們進行買賣、甚至因“企圖逃跑”而將他們殺害的“權利”。備忘錄援引了一個宗教團體的決議：“為現時的農奴主兼債主做工的黑人要比南北戰爭前（即1861年前）我們所有的奴隸還要多得多。”不錯，美國憲法禁止債務奴隸制。但是法律掌握在現代奴隸主的手裡。凱納狄指出，奴隸式的、強制的勞動制度“按其規模來說，在美國經濟中起着重大作用”。歧視黑人、婦女和南方工人，也起着重大作用。根據現有的統計，1950年美國加工工業中的壟斷組織靠降低女工工資“賺了”五十四億美元。1949年壟斷資本康采恩靠降低在工業中工作的三百五十萬黑人工人的工資，“賺了”四十五億美元的補充利潤。美國在朝鮮的冒險必然使這些數字更加提高。但是問題還不僅僅如此。千百萬工資微薄和絕對無權的勞動者大軍充斥勞動市場，它是華爾街“凍結”工資的政策的外溢工具，並且降低着美國全體工人的實際工資水平。

這就是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在美國發生作用的明顯結果。在從1950年中期到1952年年底這段時期中，即在美國侵略朝鮮的兩年半內，美國壟斷組織共獲得了一千零七十億美元的利潤（納稅前），等於1941—1945年五年內所獲得的利潤，即幾乎等於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所獲得的利潤。華爾街的這一千零七十億美元利潤首先是用最殘酷地剝削美國人民群眾並使他們破產的辦法來保證的。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這種以神話般速度增長的利潤，確鑿地說明

了美国工人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的程度。

1950—1951年的罢工运动

华尔街巨头們指望，当美国进行朝鮮战争的时候，保証壟断組織最大限度利潤的掠夺劳动者的政策不会遭到工人階級的反抗。他們希望能夠出現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国内所存在的那樣一种情况：当时，工人們因考虑到这一战争的反法西斯性質和美国同苏联一起参加了反希特勒同盟，所以都自願放弃罢工而承受巨大牺牲。美国的亿万富翁及其工会走卒煞費苦心地企圖使国内劳动居民相信，仿佛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美国对朝鮮人民的侵略之間并没有原則上的区别，仿佛“爱国主义的天职”和“軍事上的必要”这一次也要求工人階級作“志願的牺牲”。但是工人是欺騙不了的。

如果說，随着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罢工次数和罢工人數急剧下降，那末，对朝鮮开始进行冒险行动，則与壟断集团的期待和希望相反，引起了罢工次数和罢工人數的上升。尽管有瘋狂的沙文主义的宣傳运动、战争的歇斯底里、“緊急状态”和反动的工会領袖的露骨的工賊行为，1950年下半年有案可稽的罢工者总人数，还是比上半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在美国帝国主义对朝鮮冒险行动的头六个月里，罢工席卷了美国各个地区、国内大多数的工業中心和許多最重要的經濟部門。罢工的有汽車工業的工人、汽車司机、鋼鐵工人、电气工人、机器制造業工人、造船工人、化学人員、建筑工人、海員、邮电工作人員、公用事業的工作人員（他們的罢工在美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罕見的現象），甚至原子工厂的工人。所謂“非法的”或“非正式的”罢工，即根据工人群众或

基層工会組織的發起，違反工会領導的意志而發生的，不顧反動的工会領袖公開的和積極的反对而進行的罷工，廣泛擴展起來。電解鋼工廠的工人1950年8月“非法地”舉行了罷工。卡車司機也在同時“非法地”舉行了罷工。三萬工人（歸加萊所領導的、在1949年年底由電氣托拉斯所創立工会——實質上是公司工会——的會員）也都“非法地”舉行了罷工。

鐵路員工的大規模罷工行動是1950—1951年美國罷工運動的發展上的重要事件。必須特別指出鐵路員工的罷工，就因為美國鐵路工人工会——完全是行會性的工会——是由反動透頂的人物所領導的，並且這些工会的會員在1950年以前的二十八年內從來沒有舉行過罷工。

在美國軍隊侵犯朝鮮的前夕，鐵路員工開始罷工。1950年5月，許多綫路的機車司機舉行了罷工；6月，五條干綫的轉轍員舉行了罷工。利用在朝鮮業已開始的軍事行動來進行蠱惑宣傳的杜魯門總統，7月間依靠工会領袖的幫助恢復了已遭破壞的鐵路運輸。但8月間，轉轍員由於得到其他專業的鐵路員工的支持，罷工在顯著擴大了的範圍內又重新開始，擴及全國最大的鐵路中心芝加哥和其他許多重要的工業地區。

迅速擴展的罷工使美國全部鐵路網受到癱瘓的威脅。鐵路工人工会的反動領袖惶惶不安，急忙請求杜魯門對鐵路建立政府的軍事管制。這項要求當然照准，而鐵路員工實際上已被宣布動員。“合法”罷工的可能性從而就被取消了。但是，1950年12月，轉轍員在联接芝加哥的十五條鐵路上又舉行了罷工（這一次是“非法的”罷工）。罷工從這裡還蔓延到其他十四處鐵路中心，席卷了近一萬名轉轍員，並引起司

机和其他專業的鐵路員工中間的團結运动。

罢工者都不理会芝加哥、华盛顿和克利夫蘭等地匆忙頒布的法院关于停止“非法”罢工的命令。只有杜魯門所宣布的“紧急状态”才使它有可能在反动的工会領袖的帮助下破坏業已扩展起来的罢工。可是1951年1月底，大規模的罢工在一些鐵路綫上重新开始，虽然这些罢工由于陆軍部的干涉又被鎮压下去，但是鐵路員工中間的罢工运动的意义并不因此减少。罢工运动清楚地表明了鐵路員工群众的情緒、他們的斗争意志和这些工人群众同領導着他們工会的反动派之間的日益加深的鴻溝。鐵路工人工会的領袖們于1950年12月在和总统的代表們进行会談时亲自說过，他們已經不能控制工人。1951年2月他們向各个鐵路公司的代表們重复說道：“我們不能永远坐在火山上面。”

强大的罢工运动是美国对朝鮮进行冒險行动的最初几个月的特征，它引起了反动的工会官僚陣营中的惊慌失措。工人階級的叛徒們显然高估了沙文主义宣傳和战争歇斯底里的力量；他們最積極地参加傳播和煽动沙文主义宣傳和战争歇斯底里。

反动的工会領袖們坚信沙文主义的濁浪能够迷惑工人，削弱工人的積極性，使群众性工人运动的队伍趋于瓦解，因此在1950年8月急忙向政府担保說，他們决不允許罢工。同年12月，他們表示同意“冻结”工資，并厚顏無耻地声称，仿佛要“向通貨膨脹作斗争”就“必須”降低群众的購買力。这时劳联和产联的头子以及鐵路工人工会的領袖，也在12月成立了所謂“工会政策联合委员会”，并規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支持政府关于“冻结”工資、动員工業和扩大朝鮮战争的各項措施。該委员会的代表都参加了政府的工

資穩定委員會和其他战时經濟的“調节”机关。

但是，在1951年2月，工会上層分子的代表在强大的罢工运动的影响下故意脫离了这些机关，并迷惑人心地抱怨說，战时經濟的“調节”制度是受壟断巨头支配的。可以想像，对于他們这是一次出乎意外的“揭露”。这类廉价的表演并没有繼續多久。劳联、产联和铁路工人工会的领导人还在1951年4月，就一方面虛伪地向工人保証說似乎政府已准备在“穩定”工資方面协助他們，一方面重新担任了他們在2月間丢掉了的政府机关的职务。他們这种不得已的手腕充分令人信服地証明，在国内被人为地煽动起来的沙文主义的烏烟瘴气并不能对美国工人有重大的影响，証明美国侵略朝鮮的真正意图是无法对工人隱瞞的，証明工人們都不願为这种罪惡的冒险行动来承受牺牲。

企業主們也認為必須采取这种手腕。許多主要托拉斯的管理当局企圖防止工人运动进一步發展，急忙声明自己“自願”增加工資的决心。当然，工資的增加額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增加的工資很快就被猛漲的日用品价格超过了。因此，美国罢工运动的浪潮經過若干短時間的退落以后，到1951年中期重又高漲起来。

1951年上半年，除了上面業已指出的曾使全国五十二条铁路运输陷于癱瘓的铁路員工的罢工以外，还爆發了紡織工人的大罢工。2月中旬，产联所屬紡織工人工会在成立的十一年內第一次举行的罢工，席卷了新英格蘭各州（美国东北部）所有一百六十家羊毛工厂的七万名工人。4月間，南部各棉紡厂的四万五千名工人的罢工开始了。在弗吉尼亞州和佐治亞州，随同罢工而来的是罢工糾察队受到警察和由工厂主武裝起来的匪帮的多次进攻和射击，工会

組織遭到破坏和企業主的走狗对罢工者进行其他公开的迫害。这种恐怖手段和紡織工人工会领导者里夫的無耻的背叛行为使南部的罢工者遭到失敗。由于反动的工会官僚的背叛行动，新英格蘭的羊毛工厂工人提高工資的要求未能得到滿足。

但是，美国的罢工运动却以日益增高的速度在繼續發展着。1951年6—7月間，六万海員在国内二十三个最重要港口举行了停止十一天海运的罢工。7月間，女裝縫紉工人工会的六万五千名會員举行了罢工。由現在勞联最反动的領袖之一杜宾斯基所領導的这个工会，差不多在二十年内从来沒有举行过罢工。長时期以来，工人的任何罢工的發动在萌芽时期就被杜宾斯基及其党羽扼杀了。但是1951年夏，普通会员群众的压力却比杜宾斯基这个蠢感家和叛徒的花招更加有力。

8月27日，銅矿和煉銅厂十万工人在1951年最大的一次总罢工爆發了。这次罢工席卷了二十四個州的企業，并且在美国煉銅工業部門的历史上第一次几乎使銅的生产完全陷于癱瘓。有六万會員参加罢工的进步的国际开采冶煉工人工会領導了这次罢工。其余的四万罢工者是勞联和反动分子所領導的工会會員。但是他們都响应进步工会的号召，起而反抗壟断的强盜。这是一个十分明显和值得注意的事例，表明工人們不分工会會籍自下而上的战斗的統一。它引起了統治陣营中的極度不安。美国統治集团对这样一个極重要的軍事生产部門陷于癱瘓也惶惶不安。杜魯門匆忙地重新动用了他已答应廢止的塔夫脫—哈特萊法，在9月初法院便根据这一法律采取行动，要求停止罢工和把罢工延期八十天。

罢工是停止了，但是斗争并未中断。国际开采冶炼工人工会在9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积极准备在八十天延期届满后恢复罢工的一系列具体措施的决议。国际开采冶炼工人工会主席克拉克在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说，当前反动派对工会权利的侵犯是注定要失败的。克拉克的话后来被事件的进程完全证实了。美国主要的炼铜垄断组织由于考虑到工人及其进步的工会领导者恢复罢工的强硬决议，考虑到他们准备重新开始斗争的活动，所以不得不让步。到11月底延期終了的时候，所有的炼铜垄断组织都声明准备满足工人关于提高工资的要求。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政府工资稳定委员会不顾自己的惯例立即批准提高工资，虽然工资的提高已超过了关于“冻结”工资定额的命令中所规定的最高限额。这是工人统一的胜利。这是塔夫脱—哈特莱法和那些企图依靠这一法律的人的新的可耻的失败。

与有色冶金工业中冲突的发展同时，在其他具有军事意义的工业部门中也展开了大罢工。在9—10月间，飞机制造厂和飞机发动机制造厂的工人举行了罢工，并且在个别企业中罢工人数已达一万名，杜鲁门也在给国会的咨文中抱怨“防御计划的严重损失”。10月间，拖拉机工业的两万工人和许多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举行了罢工。10月15日，纽约和波士顿港口三万码头工人持续三星期之久的罢工开始了。这次“非正式的”大罢工不仅反对企业主—船主，而且也反对背着工人独断专横地同企业主签订背叛性契约的美国东海岸码头工人工会的反动主席雷扬——“霸王雷扬”。

雷扬用尽一切方法来镇压由普通的工会会员建立的委员会所领导的不驯服的罢工者。雷扬为了反对罢工者，动

員了碼頭暴徒匪幫。當然，警察也出面干涉罷工。但是任何力量都不能摧毀罷工者的意志。雖然依靠欺騙工人，即答應工人用“仲裁”方式來滿足他們的要求，終於破壞了罷工，可是東海岸數萬碼頭工人的罷工，仍舊是1951年美國罷工運動發展中的最大事件之一。紐約碼頭工人工會的普通會員所組織的機構出版的“碼頭工人新聞”在總結這次罷工時寫道：“我們結束了為我們的要求和工會民主化而鬥爭的第一個回合，現在應當組織起來並將這一鬥爭進行到底。”

罷工運動的新高漲

從美國軍隊侵略朝鮮的時候起到1951年底止的十八個月中，美國有案可稽的罷工者總數達三百五十萬。但是罷工運動的高漲在1952年獲得了更加巨大的規模。在這一年的，根據官方的材料，國內有案可稽的罷工為五千一百七十七次，而在上一年罷工為三千九百一十次；這一年罷工者達三百五十萬人以上，而在1951年為二百二十萬人；由於罷工而損失的工作日達五千五百多萬個，而1951年為二千二百九十萬個。1952年罷工運動的特點，在於時常有數萬、數十萬人參加罷工，罷工的發動常常具有普遍的性質，席卷了整批的生產部門。

美國在1952年一年里發生了三十四次每次至少有一萬工人參加的罷工，1951年這樣的罷工有十九次，1950年有二十二次。在1952年大概沒有一個地區、沒有一個工業部門未發生過罷工。

1952年，一萬三千名卡車司機的大罷工在美國開始了。罷工使十個州的汽車運輸公司的工作陷於癱瘓。3月間，鐵路員工——一萬名司機、司爐和列車員——又舉行罷

工，并且使全国許多最重要干綫的运输完全停頓或局部停頓。4月間，爆發了几乎席卷美国全部領土的三万电报員和六万八千电话網工作人員的罢工，而且电话局的其他三十万工作人員也都声明他們拒絕越过罢工糾察綫，实际上也停止了工作。也是在4月間，俄勒岡、华盛顿、加利福尼亚和蒙大拿等州的四万木工开始罢工，并且美国西海岸各州(首先是上述前三个州)的一万二千名粗木工和細木工也从1926年以来第一次举行罢工。美国石油煉制厂的九万工人也于4月間开始罢工，持續了一个多月。

这次罢工的最重要特点在于：包括劳联許多工会在內的二十一个工会的會員，为了进行反对石油壟断組織的共同斗争，也都团結在参加产联的、拥有七万工人的工会的周圍。尽管反动的工会領袖頑强反抗，这种团結还是得到了保障。反动的工会領袖企圖不讓罢工，把罢工推迟了两个月。但是从下面取得了行动一致的工人的不屈不撓的精神占了上风，終于举行了罢工，并迫使石油托拉斯同意(虽然只是局部的)滿足罢工者提高工資的要求。

到1952年5月1日，美国有八十八万七千工人举行了罢工，其中包括六十五万鋼鉄工人。这些鋼鉄工人在4月29日罢工，5月2日恢复工作，而在6月2日又宣布罢工，这次罢工持續到7月24日——共达五十二天之久。这次鋼鉄工人总罢工是1919年以来这一工業部門中持續最久的一次总罢工，它在國內政治生活中具有極其重大的意义，并在1952年的美国罢工运动中占据中心地位。

在1952年1月1日，即当鋼鉄工人工会和冶金托拉斯之間的集体合同有效期滿的时候，罢工就应开始。工人要求在提高工資和改善劳动条件的基础上簽訂新合同，并坚

持立刻宣布总罢工来支持这些要求。“鋼鐵大王們”力求降低实际工資，也正如在1919年、1946年和1949年一样，抱定目的要破坏鋼鐵工人工会。而且他們也和一般壟斷集团一样，从彻底消灭工人的民主权利，使美国法西斯化和为新的世界大战准备后方的总任务来看待这些当前的目标。冶金托拉斯的巨头們坚决認為，他們在实现其反劳工的陰謀时，不仅可以从政府方面得到协助，而且还可以从反动的工会領袖方面得到支持。在这一点上，他們当然沒有算錯。

鋼鐵工人工会的領袖們在1951年底不止一次發誓担保第二年1月1日宣布罢工，預定的日期剛一到来，他們就指望挫伤工人的斗争意志，無耻地違背了自己的諾言，走上拖延的道路。他們一連四次借口必須給政府的工資穩定委员会以時間来設法“和平”調解冲突，而迟迟不發表罢工的声明。他們劝告工人等待和信賴工資穩定委员会的“公正性”。当壟斷組織的这个衛护“公正性”的机关把鋼鐵工人的要求减去一半时，他們还劝誘工人不要反对。但是，冶金托拉斯的巨头們也和1949年时一样，甚至拒絕接受鋼鐵工人業已減低了的要求。工会的領導集团沒有别的出路，只好同意預定在4月9日举行的罢工。

但是，这又是一种花招。杜魯門总统在罢工前一个半小时，宣布对各个鋼鐵工厂实行政府监督。工会的領袖們便立刻取消罢工，对工人暗示說，似乎現在工資穩定委员会的决定將以总统命令的方式自动地实现。但是过了三个星期，並沒有出現任何关于提高工資的命令。相反地，出現了法院关于撤消政府监督的决定。被这些卑鄙的、指望延期的陰謀激怒了的鋼鐵工人，于4月29日自發地在全国範圍內停止了工作。

鋼鐵工人工会的領導者以最大的努力說服了工人在三天以后重新复工。他們借口說，法院关于撤消政府監督的決定得由最高法院重新審查。但是當6月2日最高法院確認這一決定的時候，施展手法的機會就徹底消失了。

企業主歸根到底用盡了一切手腕，操縱了一切法院決定，从一开始就挑撥工人舉行罷工。正是在罷工的過程中，恰恰也像依靠向國會所提出的反勞工法案一樣，他們打算給鋼鐵工人工会——國內最大的工会之一——以致命的打擊。他們同樣希望各工廠長期停閉，以保證清除堆積在倉庫里找不到銷路的滯存的鋼鐵，從而避免生產過剩，提高價格。此外，各個冶金托拉斯還特別關心能使罷工先延期幾個月，因為這使他們有可能一方面準備鬥爭，另一方面指望挫傷工人的士氣。

鋼鐵“大王”的陰謀詭計雖考慮得很周密，但是都失敗了。無論在罷工前，無論在罷工時期都對企業主、政府和反動的工会領袖的統一戰綫進行了反抗的工人，顯示了出乎壟斷集團意料之外的堅定、團結、勇敢和鬥爭意志。鋼鐵公司白白地在對罷工者進行腐蝕的宣傳方面花了大量的金錢。鋼鐵工人工会的領袖們為了加深罷工者家庭原來就很困難的狀況，無理由地拒絕了其他工会給予他們的援助，竭力瓦解國內已高漲起來的同情罷工者的運動。工会的領導集團徒勞無益地企圖借口許多特种鋼工廠的產品仿佛是為了挽救在朝鮮的美國士兵的性命所必需的，來煽惑工人（即便是部分工人也好）恢復工作。工会領導集團的這種工賊企圖遭到了罷工者的堅決反擊。罷工者甚至不許各個工廠運出還在罷工前就已煉好的特种鋼。

罷工者所散發的傳單，強調指出了美國帝國主義在朝

鮮的冒險行動和美國工人的苦難的命運之間的不可分割的關係。有一張傳單中說道：“匹茲堡（美國冶金工業中最重要中心之一）和板門店之間有着直接的關係。冶金工業中工資凍結和板門店停戰談判停頓是同一個原因……必須不讓關於冶金人員工資的談判破裂，必須不讓關於朝鮮停戰的談判破裂。”

冶金人員的罷工加強了美國工人中間日益增長的對侵略戰爭的憤怒，加強了國內業已發展起來的對華爾街侵略政策的大規模的運動。這甚至比罷工者不屈不撓的意志本身還更加使企業主們和統治集團不安。同時，罷工的持續，國內罷工鬥爭戰綫的進一步擴大，使壟斷組織的巨頭們大為恐慌，因為冶金人員的總罷工在罷工持續下去的時候，必然同時會引起其他工業部門、特別是煤炭工業部門中業已醞釀成熟的大罷工。壟斷集團面對這種前景只好讓步，以便能最快地停止對它們說來是日益危險的鋼鐵工廠的罷工。這樣一來，團結一致的冶金工人隊伍就捍衛了自己的工會不受反動派無恥侵犯，击退了壟斷組織的進攻。但是，由於反動的工會領袖卑鄙的背叛行為，鋼鐵工人所提出的要求只有一部分得到了滿足。

芝加哥和其他許多城市的製造農業機器的“國際收割機公司”工廠三萬多工人在1952年8月開始罷工，持續將近三個月，這同樣可以作為今天美國無產階級所表現的高度戰鬥力和鬥爭意志的范例。

“國際收割機公司”已為美國工人階級所熟知。它的核心是麥考米克商號的收割機工廠，這些工廠的廠主曾倡議美國歷史上最卑鄙的一次挑釁，即在1886年對芝加哥大規模罷工的參加者和工人運動的活動家實行血腥鎮壓。從那

时起，恐嚇、警察暴行、招募工賊匪帮和依靠誣告所謂“不良的”工人領袖犯有刑事罪而加以排除的办法等等，便成了傳統的办法，这些办法在鎮压1952年秋“国际收割机公司”各企業的罢工时全都用上了。

警察当局驅散了罢工糾察队，毆打并逮捕了数十个工人糾察队员。企業主的报刊攻訐罢工者，并以鎮压来威胁他們。“芝加哥論壇报”麦考米克王朝的黑帮喉舌斥責罢工的領導者为“叛逆”，要求把他們处以死刑。罢工領導者之一、黑人华尔德被誣告杀死工賊而交付法院懲办，多亏进步的联合电气工人工会——罢工的主导力量——組織了广泛的运动，才把他从电椅上救下来。联合电气工人工会的芝加哥地方組織在罢工时期遭到了“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的凶手的襲击。但是破坏罢工的陰謀并未得逞。企業主迫不得已作了讓步。他們降低工資和取消“国际收割机公司”各企業里的工会組織的計劃失敗了。

的确，罢工者所提出的关于提高工資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滿足。問題在于，与进步的联合电气工人工会同时参加領導罢工的，还有两个加入劳联和产联的工会，而領導这两个工会的反动分子断然拒絕同联合电气工人工会采取一致行动。一般看来，与其說他們是对企業主作斗争，还不如說是对电气工人工会作斗争。当然，如果三个工会在他們反对一个最强大而又最凶惡的美国壟断組織的斗争中团结一致，那末斗争的結局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了。

在美国，1952年下半年其他的規模巨大的罢工發动中間，应当特別指出二万五千名飞机制造厂工人、四万名电气工人和杜邦康采恩的原子彈企業的建筑工人的罢工。三十二万二千煤矿工人的短暫的、但是强大的罢工，迫使企業主

不敢背弃其提高工資的義務。这次罢工显示了美国在1952年業已扩展起来的罢工运动高涨的情景。在这次罢工中，清楚地說明了企圖压抑这一高涨的反动的工会官僚和为自己切身利益而斗争的、其力量日益增長的美国无产阶级之間的矛盾極其尖銳。

1953年的罢工斗争

1953年的罢工运动，沒有1952年那样强烈。1952年美国主要工業部門大規模的总罢工，迫使这些工業部門的企業主作了有利于工人的讓步，而根据企業主所作的讓步簽訂的集体合同在1953年繼續有效。固然，冶金工業中新的冲突日益成熟，但是这一次鋼鉄“大王”对1952年記憶犹新，不敢采取素常的挑衅立場。他們立刻同意稍許增加一些工資，虽然增加的數額是微乎其微的，但是鋼鉄工人工会的反动領袖已能利用它来抑止冶金工厂中总罢工的重演。作为汽車工人工会主席的路德也同样巧妙地利用企業主同意稍微（更确切点說，甚至只是表面地）提高工資，来阻止汽車工厂总罢工的爆發。一方面，肉类罐頭工厂四万五千名工人業已成熟的罢工也沒有爆發，因为这一工業部門的各个工会紧密合作，迫使企業主接受了工人的要求。

还必須注意到另一种情况。1953年初民主党人——执政达二十年之久的美国財政資本的兩大政党之一——把自己的位置讓給了共和党人——壟斷組織的另一政党。与此同时，由于1952年底和1953年初劳联和产联的主席格林和莫萊几乎同时死去，美国这两个工会中心的領導人也更換了。这些变化實質上並沒有使客觀情况有所改变。但是，这些变化却被共和党政府以及劳联和产联的新的領導人用

来迷惑工人。

共和党政府为了表明准备同組織在工会里的工人“合作”，便采取了一系列迷惑性的措施。它一再重复着共和党人在竞选前关于“重新审查”塔夫脱—哈特莱法的诺言。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十足的假惺惺的态度。但是，劳联新主席米尼和产联新主席路德便急忙声明，他们同意和政府“合作”。他们在1952年底到1953年初的一切行动，都貫徹了利用統治集团的欺騙性诺言的企圖，以便引起工人的即便是最不可靠的希望和某些等待情緒，从而削弱工人的斗争意志。劳联和产联的上層分子也怀着同样的目的——削弱工人的斗争意志，利用1952年中期因經濟危机的加深而开始的大量增長的失業現象。

反动的工会領袖这种奸險的花招，不能不对罢工运动的發展起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花招并不能使罢工运动陷于癱瘓。1953年罢工發动的特点是，規模比1952年小，而罢工范围几乎涉及各个經濟部門和全国各个地区，罢工的次数并不少于1952年。1953年，美国有案可稽的罢工达五千一百次，共有二百万工人参加了这些罢工。1953年的夏秋兩季乃是斗争特別緊張的时期。

仅仅在7、8月間，举行罢工的有：铁路員工、公共汽車司机、卡車司机、五大湖的油船和客船的水手、木匠、自来水管工人、电气工人、電話員以及造船厂、橡膠工業、啤酒厂、罐頭工厂、鋼鐵工厂、汽車制造厂和許多軍火工厂的工人。在肯塔基州和伊利諾斯州，建筑原子工厂和被指定供应它們动力的發電厂的工人，不止一次地举行了罢工。这些企业的建筑地上的罢工一般說来是十分頻繁的。到1953年中期，那里有案可稽的罢工共达一百四十三次。

必須指出有一萬以上工人參加的許多次最重要的罷工。這里包括：匹茲堡“威斯汀豪斯電氣公司”工廠的電氣工人的罷工，加利福尼亞州建築工人的罷工和該州食品工業三萬三千工人的罷工，印第安納州“內陸鋼鐵公司”鋼鐵廠一萬八千工人的罷工，橡膠工業二萬五千工人、加利福尼亞州和俄亥俄州航空工廠三萬多工人、洋鐵罐頭工廠三萬三千工人的罷工，以及五萬三千電話員和紐約、費列得菲亞、波士頓和美國東海岸其他海灣的港口六萬碼頭工人的罷工。夏威夷群島二萬四千碼頭工人與糖和菠蘿種植場工人的罷工，是這個群島歷史上最巨大的罷工之一，並具有政治性質；這次罷工是為了抗議對捷克·霍爾——進步的西海岸碼頭和倉庫工人工會的地方組織的領導者——判罪而舉行的。

企業主試圖取消在最近幾年來對工人所作的讓步，是許多次罷工的最直接的原因。雖然在物價不斷高漲的情況下，工人的工資甚至經常落后於官方宣布的最低生活費用，而提高工資的要求却常常遭到企業主無條件的拒絕。企業主預見到經濟危機（危機逼近的徵兆已日益顯著），因此並不特別關心避免工業中的衝突和企業的停歇。

另一方面，儘管鬥爭日益困難，工人仍舊力求用罷工來回答剝削者降低工資或使勞動條件惡化的企圖。不僅是為了堅持要求提高工資、並且是為了表示抗議延長工作日（可以說上述“內陸鋼鐵公司”一萬八千工人的罷工就是例證）而宣布的罷工越來越多了。旨在反對非人的壓榨血汗制度的罷工也越來越多了。最後，“非正式的”罷工，即未經許可或甚至不顧工會領導集團的禁止而宣布和舉行的罷工，是1953年罷工運動的重要特點。正如“華爾街新聞”所報道

的，在1953年的十個月內，僅美國冶金工業一個部門有案可稽的這類罷工將近二百次，而在1952年大約相等的時期內美國冶金工廠中這類罷工只有一百零五次。大西洋港口六萬碼頭工人的罷工，雖然在形式上是由東海岸碼頭工人工會的領導集團宣布的，但實際上罷工已轉而反對這個領導集團及其背叛政策，反對領導該工會的匪徒雷揚，其程度並不次於反對輪船公司本身。

工人不滿情緒的巨大增長，他們的與日俱增的積極性以及反動的工會領導集團和千百萬普通工會會員之間愈益加深的對抗性，乃是1953年美國罷工運動的最重要的特點。美國階級鬥爭的加劇和尖銳化，是最近幾年來美國國內狀況的實質。國內狀況的進一步發展的前景就是如此。

第 三 章

美国壟断組織的代理人在美国工会 运动中的破坏活动

美国資產階級对工人階級的思想影响

在資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工人階級并不是同資產階級及其思想体系截然分开的。資產階級思想体系通过一切方法侵入無产階級中間，以階級异己的观念和观点来熏染無产階級的个别階層。美国工人階級就是資產階級在好几十年中进行这种思想影响的对象。列宁曾經指出，美国的資產階級，也和英国的資產階級一样，“就欺騙、腐蝕和收买工人的伎倆來說，是举世無双的”。^①壟断組織竭力阻撓美国無产階級在階級斗争的进程中因結自己的队伍，利用全副武器（其中报刊、無線电、电影、宗教宣傳等等具有很大的

① 參看列宁“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社1950年版，第189頁。

意义)来从思想上影响工人。

大家知道,在美国,报纸、杂志和书籍的出版通常都掌握在一些最大的垄断康采恩的手里。美国著名的记者乔治·马立昂在他最近刊行的一本书中说道:“在美国,曾被神话般地描绘为‘自由的’报刊,乃是世界上迄今最强大、最集中和最危险的垄断……” 报纸康采恩——斯克利浦斯—霍华德、赫斯特、麦考米克—潘特逊、法蘭克·伽奈脱等和通讯社——美联社、合众社与国际新闻社,几乎把美国的全部报刊都直接或间接地操纵在自己的手里。要办一种不依附于垄断资本的报纸,会遭到许多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第一,今天在美国,要办一份严正的日报,就需要有几百万美元;第二,不依附于垄断组织的报纸会受到各种迫害:大通讯社拒绝供给消息,垄断联合组织剥夺它的广告收入;第三,这种报纸会遭到报刊发行所的抵制;最后,它的读者会受到各种迫害。在这些条件下,美国的一些进步机关的报刊——“工人日报”等等——的印数就势必受到限制,并且这些出版物也不能销行各处。这样,约一千八百家总印数近五千四百万份的日报和掌握在垄断组织手中的、印数很大的、形形色色的杂志,就得以每天用虚伪的和别有用心报道来毒化美国人民的意识。通常,整个报纸的材料有一半是广告,四分之一是各种“笑料”,而其余的部分则是刊登被算作“新闻”的各种聳人听闻的事件。由此可见,搜集这些“新闻”是为了形成一种为垄断组织所必需的国内的社会舆论。列宁在论述资产阶级报刊的特点时,曾经指出:“最无耻的诽谤、歪曲、粗鲁的谎言和蒙蔽读者的无微不至的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黄色报刊和一般资产阶级报刊极其热心采用的。”①

除了自己私人的报刊以外，“企業主”还通过反动的工会領袖所操縱的大量的出版物“直接向工人运动的血管里注射他們的宣傳的毒藥”(福斯特語)。

以其下流作品充斥市場的國內最大的書籍出版社也都掌握在壟斷組織的手里。

同样为散布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这一目的服务的無綫电广播、無綫电傳真和电影工業，也全部掌握在壟斷資本的手里。無綫电和無綫电傳真，也像好萊塢攝制的影片一样，它們的任务就是不仅要阻碍美国劳动者的階級自覺的提高，而且还要使他們养成犯罪和喪失道德的惡習。無綫电、無綫电傳真和影片的內容，不是进行狂妄的沙文主义和軍国主义的宣傳，就是散布“赶快發財致富、赶快及时行乐和赶快杀人”的觀點。

旨在按照美国資產階級所需要的方針来轉變劳动群众意識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就是利用包括宗教偏見在內的各种偏見。尽管这在二十世紀听起来是怪誕的，美国至今确实还广泛流行着各种最荒謬無稽的迷信。这些迷信在居民中間大力地培植起来了。例如，根据美国社会輿論研究所的材料，每三个美国人中就有一個人認為要使想像中的事情获得成功，只要敲一敲木头就行；而每十个美国人中就有一個人相信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須向肩膀后撒一撮鹽。各种符咒和香囊之类的东西在广泛地流行着。資產階級在散布各种宗教迷信，力圖阻碍無產階級階級自覺的提高。

为了达到分裂工人階級的目的，資產階級加紧煽动宗教敌視，并故意培植大批宗教的派別和社團。在美国，有二

(1) 見“列宁全集”第25卷，第4版(俄文版)，第147頁。

百五十多个形形色色的宗教組織，它們聯合着總計達二十萬個宗教社團。這些宗教社團中，不僅有在其他許多國家也盛行的耶穌教、天主教和猶太教的組織，而且還有各種純粹美國的教派。所有這些組織都在宣傳着俗事茫茫和來世天國生涯的教義，按照資產階級所需要的方針來影響無產階級。不少的教會奴僕們公開地從事與宗教毫無關係的活動。他們宣傳着資產階級的道德，領導着往往是法西斯性質的政治組織。類似這種活動的顯著例證之一，就是1921年由牧師布哈曼發起的所謂“道德重整”運動。布哈曼及其信徒們要求停止階級鬥爭，要求整個社會的調和，等等。布哈曼分子在他們的活動中廣泛地依靠着反動的工會領袖的幫助。美國勞工聯合會過去的主席格林就支持過他們，運輸工人工會（產聯）副主席威廉·格路漢、密執安州產聯組織的副主席福克司等人現在仍在支持着他們。美國資產階級報刊企圖把布哈曼主義稱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學說”。

梵蒂岡的代理人——天主教教會在美國起着十分積極的作用。位於紐約貴族區的豪華的住宅，就是美國天主教教會的頭子弗蘭西斯·斯彼爾曼大主教的官邸。這裡管轄着替美國天主教教會二千萬教徒服務的四萬名天主教神甫。

美國天主教教會本身就是與華爾街有密切聯繫的大金融企業。天主教教會不僅利用龐大的教會機構，而且还領導着由天主教教會的代理人所建立的許多逞凶的組織。其中有些組織帶有明顯的法西斯性質。天主教教會在反動的工會領袖中間也有大批走卒，這些反動的工會領袖在對工人運動進行破壞活動時也同樣樂意依靠教會的支持。例如，產聯前主席莫萊曾斷言說“產聯的精神和思想同基督本

人的学說有着密切关系”。莫萊曾是反动的天主教徒工会會員协会的積極活动家，产联司庫加萊也在这个协会中繼續起着很大的作用。

在令人惊奇的大吹大擂的場面下进行的各种“反共产主义”的行动，都是为麻醉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和恫嚇美国庸人这一目的服务的。在“反共产主义”的旗号下，一切进步的組織和进步的領袖被橫加殘酷的迫害，进步的观点遭到非难。在最近时期，各种各样的国会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的活动具有特別广泛的規模。这些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为了“根絕共产主义”，时而“檢查”各工会，时而“檢查”各大学，时而“檢查”国务院各圖書館，时而“檢查”联合国机构內一些美国職員的工作。在美国，反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已达到了極其狂热的程度。

除了报刊、無綫电广播、影片、教會的宣傳、反共产主义运动和类似的手段以外，美国壟断資本还广泛地利用那些千方百計地阻碍美国無产階級队伍統一的反动的工会領袖，来在工人运动中散布資產階級的思想。

美国工会运动落后的原因

反动的工会領袖們依靠着美国壟断組織直接的支持和幫助，把国内最大的工会中心——美国劳工联合会操縱在自己的手里已有七十余年。另一个工会中心——产业工会联合会以及許多既未参加劳联又未参加产联的工会，也都被反动的工会領袖們把持在手里。

这些为数不多但有势力的、在美国工会中窃据領導地位的反动工会官僚集团，并不是突然产生的。它們是随着壟断前資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随着壟断資本用各种办

法和各种方式收买無产階級的上層分子并使他們变为“工人貴族”，收买和引誘那些出身自“工人貴族”的工会組織領導人到自己这方面来，使他們成为工人官僚而逐漸形成的。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这些工人階級的領袖按其生活方式、按其生活水平、心理状态和世界观來說，是接近于資產階級的，因而脫离了工人群众，不复了解工人群众。資本主义虛假的繁荣日益迷惑了这些領袖們。他們越来越接受了資產階級思想家虛構的資本主义强大和巩固的觀念。他們疏远了無产階級，愈益紧密地把自己的命运同統治階級的利益連在一起，只是幻想“出人頭地”，發財致富，并在資本主义社会里得到一官半职。

美国劳联和产联的头子們正是那些脫离工人群众并轉而全心全意为資本主义服务的工会領袖的显著榜样。他們是美国財政寡头反人民的政策及其給工会运动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的積極的傳导者。这些影响也决定了美国工会直到今天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着思想上和組織上的落后性。美国共产党主席威廉·福斯特曾經指出，阻碍美国工会运动發展的有下列五个基本缺点：

“工会的第一个和最基本的缺点，就是他們思想上的落后性。大多数美国工人还没有摆脫資本主义的思想影响……

美国工会运动的第二个严重缺点以及由它的第一个最基本的缺点——思想上的落后性——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工人階級的經濟組織無論在規模上或質量上都差……

有組織的工人运动的第三个严重缺点在于政治方面。美国工人階級是資本主义世界中还未組織起广大的群众性的政党的唯一龐大的工人階級……

美国工人运动的第四个严重缺点以及它的不成熟性的另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它缺少真正的無产阶级的經濟路綫和政治路綫。工会的現行的官方政策（尽管工会也要求改善工人福利）在實質上帶有純粹資本主义的阶级性。产联、劳联和各独立工会的基本路綫都是如此……

美国工人运动的第五个严重缺点，……就是领导不良，工人运动从美国劳工联合会成立时起，也就是說几乎六十八年以来，不断遭到它的危害。这种官僚主义的工会领导在这个漫長时期中成了工人运动的絆脚石…… 所有这些反动的領袖都公开地維護資本主义，并且他們已成了資本主义政党的政治工具…… 在很多年內，这一小撮無耻的反动分子对年輕的、日益高漲的工人运动所造成的危害是無法計算的。”^①

美国工会运动大大落后于許多資本主义国家，首先是法国和意大利这样一些国家的工会运动。約有三分之二的美国工人和職員至今还不是工会會員。按职业組織起来的工人是分散的和各自为政的，因为在美国还没有一个統一的工会中心。在美国，正如前面已經談到的，有着两个彼此竞争的工会中心：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而且它們并没有包括美国所有的工会。在美国，现在还有許多所謂独立的工会，也就是既未参加劳联、又未参加产联的工会。

劳联和产联所屬工会的會員总数約为一千四百万人（劳联約为一千万人，产联約为四百万人）。此外，約有二百万有組織的工人和職員加入了各种独立的工会。最大的独

① 参看威蒙·羅斯特“世界資本主义的末日”，世界知識出版社1953年版，第100--114頁。

立工会是：火車司機、司爐、列車員、售票員的工会（它們通常被总称为“鐵路工人兄弟会”）、联合矿工工会以及在1949—1950年被产联开除出来的許多进步的工会（其中最大的工会是联合电气工人工会）。相当大一部分的美国工会，特别是参加劳联的一些工会都是些小型的行会性的組織——其中很多工会只有會員五十五到五千人。劳联所屬工会和各鐵路工会的很大一部分會員是工人階級中技术熟練的上層分子。劳联的反动头子們巧妙地把这些“工人貴族”狹隘的私利同美国無产階級的整个階級利益对立起来。反动的工会領袖們的分裂活动，不論在思想上或在組織上都給美国工人运动帶來了巨大的危害。

劳联和产联的反动头子們的真面目

列宁在談到劳联的創始人葛培尔茲和其他与葛培尔茲相类似的工会領袖时說过，他認為这些工会領導人都是資产者。列宁并把葛培尔茲与沙皇时代的秘密警察祖巴托夫相比。

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威廉·福斯特在評述葛培尔茲及其把持着美国工会运动上層的反动官僚集团的代表人物中的伙伴和繼承者时写道，他們中間有不少是老牌的匪徒、雇傭凶手和騙子。

所有这些工会头子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点（它决定着美国工会官僚的一切其他特点和特征），就是他們常常不惜用任何代价来維護資本主义制度。反动的工会領袖和美国壟断資本家的利益之所以是一致的，其原因不仅在于反动的工会領袖們是資产階級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而且在于他們中間有很多人本身就屬於資产階級。哥倫比亞大学

教师米尔斯在他1948年于紐約出版的“国家新貴”一書中，援引了美国工会領袖(在未参加工会工作以前)社会出身的一些資料。根据这些資料，劳联的領袖有百分之二十七，产联的領袖有百分之二十二，按其社会出身都是屬於企業主、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那些自称为工人出身的領袖当中相当大一部分(劳联占百分之六十，产联占百分之四十七)都是“工人貴族”的代表人物。米尔斯写道，他們之中大多数人始終是把工会領袖的職業看作是美妙的官运。实际上，反动的工会領袖正利用他們在美国工人运动中已攫得的領導职务使自己發財致富。

美国杂志“美国新聞与世界报道”写道：“今天工会領袖們的工資还不能跟大公司經理的薪金相比，但是他們中間許多人收入也很可觀。”例如，鐵路职員工会主席哈里遜的薪金每年將近七万六千美元，即比每年領到十万美元薪金的美國總統稍差一些。美国其他許多反动的工会領袖的薪金每年也有好几万美元。此外，有些工会領袖經常从各个政府机关和企業主那里領取优厚的津貼。他們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还大量使用在他們支配下的工会資金。例如，在1943年，当时劳联所屬卡車司機工会主席托平在佛罗利达州迈阿密畢奇美国亿万富翁住宅区里买了一所豪华的別墅。托平为了購買这所別墅，动用了工会的現款十万美元。按生活方式及其收入数量來說，反动的工会領袖是完全屬於資產階級的。

美国工人运动的積極参加者瑪丽·瓊斯对現时的反动工会領袖的特点作了如下描述：“現时的工会領袖中很多人早已远远离开了我們运动的先驅所走的艰难道路。在斗争初期，并不可能看到工人領袖出席貴族的宴会；他們的妻子

不会打扮得像五光十色的孔雀那样眩目耀眼，也不会有任憑打罵的、恭順的有色人种奴僕在服侍他們……普通的工会會員讓自己的勤务員变成了自己的主人和独裁者。現在，工人們不仅必須对剝削者作斗争，而且也要对任意背叛工人、出賣工人、把自己的升官發財放在劳动群众的利益之上并使普通的會員变为他們在政治冒險中的工具的那些領袖作斗争。”^①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反动的工会領袖也沒有掩盖这种情况。例如，現在的卡車司机工会主席戴夫·畢克，在不久以前担任这个职务后曾公开地对“新共和”周刊的記者声称：“我管理这个机关（即卡車司机工会——著者）每年可得到二万五千美元的报酬。工会是一个大商号。为什么要讓卡車司机来通过有关工会政策的重要決議呢？”

反动的工会領袖的一切計謀都是为了不惜任何代价来保持自己有利可圖的地盤；但是这只有在取得国家机关和企業主的支持的条件下，只有在主宰工会运动的各集团的代表互相勾結和在工会內部完全丧失民主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黃色工会的領袖們为了維護对會員群众的权势，就在工会內部建立了毫無限制的独裁制度，并以一切手段（甚至在工会內部組織專門的惡棍）来消除任何反抗。这些惡棍由于得到一定的报酬就幫助工会領導集团来排除一切反对他們背叛活动的人。

工会內部存在着的彼此紧密团結的工会官僚集团和惡棍把自己的亲信提拔到領導崗位上。反动分子所領導的工

① 見米尔斯“國家新貴”，紐約，1918年版，第102頁。

会的“选举”并不是什么新花样，不过是玩弄一套虚伪的把戏而已。在工会里攫取权柄的集团，就利用一切手段——从制造选举到公开的恐怖行动——来使自己的候选人当选。通常，反对派的候选人都被从选票名单中除掉了。各种各样的欺騙伎倆所以得以施展，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普通的工会会员除了参加各地方组织的代表大会以外，通常是不得参加工会代表大会的。

甚至在各部門工会的代表大会上，工人们也沒有表达自己意見的可能。加之，很多工会（特别是劳联的工会）很少召开代表大会。威林頓·洛烏（曾在美国工会运动中担任领导职务多年）1948年在美国發表的著作中援引很多事实，清楚地証明了美国許多工会的独裁制度。洛烏特別引証了美国最大的工会之一——矿工工会的一个实例：“当路易斯（联合矿工工会的主席——著者）的敌对者企图削弱他的权力时，路易斯是殘酷和無情的。路易斯在斗争中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工会的代表大会簡直成了丑剧。在1924年的代表大会上，他在回答对他的批評时，叫嚷說：‘主席現在通知你們，你們尽可以喊到自己的喉嚨嘶啞为止，而他却还是一切照旧！’后来就揮起双拳，迫使那些不滿意的人沉黙下来。”

必須指出：反动的头子們手中握有大批工会官僚，为数已超过三、四万人。这些工会官僚忠实地为自己的工会“老板”服务。

企業主公开地帮助工会官僚把工会把持在手里。提出抗議或有反对情緒的工人都被解雇，并被列入不能在其他企業里获得工作机会的“黑名单”里。劳联和产联的代表大会特別清楚地表明了反动的工会領袖的独裁，以及企業主

和政府集团对反动的工会領袖的支持。政府高級官吏（往往包括美国总统在內）的大量賀詞和一些工会領袖的演說，几乎占去了在代表大会上进行討論的全部時間。领导所委任的各委员会的工作和听取这些委员会的报告以及負責人的“选举”花去了其余所有的時間。

代表大会的許多委员会的唯一任务实际上就是撤消执行委员会不滿意的一切決議案。如果在某种情况下不能撤消时，它們就把这些草案轉交执行委员会“詳加研究”。以后这些草案通常也就不再出現了。如上所說，劳联领导机关和最近几年来产联领导机关的“选举”乃是徒具形式，仅仅是批准由統治集团早就决定了的各种职务的分配而已。

但是，如果認為黄色工会的領袖們在其反对無产階級利益的背叛性的分裂活动中仅仅依靠資產階級的恐怖手段和支持，那就太單純了。事实上，除了上面所指出的这些帮助維持反动的工会領袖把持工会权力的情形以外，还有另外許多因素使工会官僚至少能得到一部分工会會員的支持。

工会官僚上層的代表人物經常把“工人貴族”的狹隘的行会性的利益和無产階級的整个階級利益对立起来。他們無耻地利用工人階級中落后部分的种族和民族的偏見，使移民和“土著的美国人”，使白种工人和“有色人种工人”对立起来。这样，工会官僚上層的代表人物在分裂工人階級的时候，就能保證自己在工人階級的工会組織中的統治地位。反动的工会領袖們有时宣揚自己是無产階級出身，有时宣揚自己有經驗、有“業務能力”、有同企業主談判所不可或缺的知識，力圖为自己树立威信，并往往用这种蠱惑性的宣傳蒙騙住个别工人階層。工会中現行的互助制度起着

很大作用。工人之所以常常要順从工会领导人，就因为怕丧失領取撫恤金和補助金的权利。这种权利是由于他們多年来繳納工会会費才获得的。反动的領袖們巧妙地利用在个别情况下存在的不問政治和漠不关心的傾向，蠱惑地使工人相信不用經過階級斗争就有美好的將來，并宣傳关于“階級合作”和“美国例外”的思想。

这种蠱惑宣傳、思想影响同挑撥無产階級团体之間对立的手段互相結合，工人关心互助組織，他們明显地力圖加入为企业主承認的旧的大工会組織，以及对不服从的工人采取恐怖手段，所有这一切正說明了为什么反动的工会領袖的地位到現在还能相当稳固。在这些条件下，工会的领导职务在許多年内仍保持在这些人的手里，而且这些为资产階級效劳的工人运动的叛徒的活动往往只有到死方才停止，也就毫不奇怪了。美国劳工联合会第一任主席葛培尔兹就是这样。葛培尔兹领导劳联是从該会建立的时候起一直到他死为止。繼葛培尔兹之后担任劳联主席的威廉·格林的情形也是这样。格林从1924年起到1952年底，也是到他死为止，一直担任主席职务。

类似的情形在工会組織的各个环环节——自上到下都存在着，因此劳联和产联的头子以及参加劳联和产联的工会的头子已变为門戶森严的帮派，也只有那些在出卖工人階級利益的活动中特別成功的人才能挤进他們的队伍。劳联現任主席米尼、产联主席路德、劳联副主席伍尔、产联司庫加萊、联合矿工工会主席路易斯以及其他一些反动的工会領袖的工会职业，就是这一事实的显著的証明。

乔治·米尼是劳联第三任主席。自1952年底格林死后，把持劳联大权的反动集团，提拔当时担任劳联司庫的米

尼为该会主席。那时，米尼已在美国工会运动中做了好多年的破坏工作。米尼約在三十年前就在劳联所屬的自来水管工人工会开始了他的工会生涯。米尼是一个为达到其卑鄙目的不擇手段的狡猾而又毫無顧忌的陰謀家。他迅速地沿着“官阶”高升起来。米尼一直是美国壟断組織的奴僕，正是米尼在極端無耻地空談什么“工会和企業主的合作，对于双方要比斗争更为有利”。实际上，米尼認定这种“合作”能使美国無产階級放弃爭取自己的政治权利和經濟权利的斗争。他热烈地主張并衛护美国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政策。米尼是苏联的最凶惡的敌人。还在1946年，他就企圖威胁苏联，并声称：“我們在准备战争，而且已作好了战斗准备。”1951年，米尼發表了一本狂妄的題为“劳联怎样对世界共产主义作斗争”的令人厭惡的小册子。在小册子里，他不仅完全贊同美国对外政策的意圖，而且还誇耀劳联領袖們在执行这一政策时所起的作用。米尼宣称：“如果没有我們的帮助（也就是沒有劳联的帮助），北大西洋公約就会完全等于一紙具文。”無論是作为劳联头子或是作为政府各种委员会和組織的成員（米尼在这些机关里与美国壟断資本家的代表們同桌开会），米尼处处帮助战争挑撥者。

馬休·伍尔是劳联的副主席。他从1929年起就担任这个职务。正如美国共产党主席威廉·福斯特所指出的，伍尔是劳联右翼的極右分子。伍尔早就同美国警察机关發生关系，同警察机关積極合作共同迫害进步工会的活动家。还在1927年，伍尔因为国际毛皮工人工会的領袖之一本·哥尔德被捕，公然声称：“本·哥尔德今天入獄了，我們希望严加監禁。”而伍尔在劳联的伙伴馬克·格萊治当时則补充伍尔的話說道：“我們完全有保証在清洗国际毛皮工人工会

的工作中得到紐約警察局的協助。”

伍尔也同美国資產階級为了鎮压工人階級而成立的各种亲法西斯的組織有直接的联系。1950年初，伍尔積極地参加了美国軍团所召开的代表會議。美国軍团的目的正如代表會議的头子所宣称的，是“消灭世界共产主义”。

在伍尔直接参加下，终于在1947年就策划好了反对世界工会联合会的陰謀和制訂了建立工賊“国际”的卑鄙的計劃。

伍尔仇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簡直到了瘋狂的程度。他是美国許許多多反苏謠言的制造者和鼓吹者而聞名的。

伍尔公然惡意地反对保衛和平运动。他和其他反动的工会領袖——格林、米尼、莫萊、路德、加萊一起，公开地号召抵制1948年召开的美国科学和文化工作者保衛和平大会。伍尔和劳联执行委員會的其他的委員反对美国代表团参加世界保衛和平大会。他們对朝鮮人民的英勇斗争散布駭人听闻的謊言，帮助美国帝国主义者在美国煽起战争歇斯底里，并在战争歇斯底里的掩盖下以空前未有的規模向美国人民的政治权利和經濟权利进攻。

产业工会联合会的領袖就其反动性來說并不亞于已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中攫得大权的領袖。

华尔特·路德是产联的主席。路德于1952年底在大西洋城召开的产业工会联合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繼任在大会前夕逝世的莫萊的职务。爭夺产联主席职位的斗争極其尖銳和殘酷，而汽車工人工会主席路德在这次斗争中获得胜利决不是偶然的。路德是美国資產階級报刊和資本家集团所一致公認的寵兒。甚至美国商会在一本專門性

的小冊子里也為路德吹噓一番，認為他是所有其他的反動工會領袖們的榜樣。路德經常是以勞工部長的候補者出現在資產階級報刊的篇幅上的。

1949年，福斯特對右翼社會民主黨人路德及其伙伴作了如下的評述：“這些人……對於美國整個工人運動的發展來說，具有最深刻的危害性……路德是最有害的反動分子、蠱惑者和野心勃勃的可恥的傢伙。”^①路德同罪惡世界直接聯繫在一起，並在其反對工人階級的鬥爭中大大仰仗於罪惡世界的幫助。

路德在他所領導的工會中建立了毫無限制的獨裁制度，殘酷地鎮壓着一切反對他的背叛政策的人。他極其巧妙而狡猾地破壞了汽車工人的罷工。在最近幾年來，路德曾經破壞了“通用汽車公司”、克萊斯勒汽車公司和福特汽車公司的汽車製造廠的三次大罷工。由於這種“領導”的結果，福特汽車公司甚至堅決拒絕考慮工人提高工資的要求。

1950年，路德對壟斷組織卑躬屈節已達如此程度，竟背着工人同汽車康采恩簽訂了對工人來說是奴役性的合同。合同實際上禁止汽車工業在合同整個有效期間（即在五年內）舉行罷工。路德受到了資產階級報刊的熱烈歡迎。例如，“芝加哥太陽時報”在1950年5月寫道，路德又一次表明自己對於維護美國資本主義體系的關心。美國資產階級指望路德的發起能推動其他一些工業部門簽訂一系列類似的合同，並幫助建立一種制度來阻止美國工人階級反對壟斷

① 參看威廉·福斯特“世界資本主義的末日”，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3年版，第119頁。

組織对它的政治权利和經濟利益进攻的斗争。但是华尔街富豪們的美夢并未实现。

路德在新的世界战争的挑撥者中間占有显著地位。路德在他当选为产联主席的前夕，曾拜謁了美国新总统艾森豪威尔，并担保自己是完全支持他的。最近几年以来，路德已成为美国在全世界进行侵略的鼓吹者。

詹姆士·加萊——产联司庫——同路德沒有任何差别。美国無产阶级的利益对于加萊永远是格格不入的。無論就其社会出身或社会地位來說，加萊与工人阶级毫無共同之处。他为了从资产阶级那里領取优厚的报酬，經常出卖和背叛工人阶级的利益，在战后时期，加萊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强迫欧洲各国人民接受奴役性的馬歇尔计划和美国资产阶级旨在准备新的世界战争的其他一切措施的積極的推銷員。美国国务院曾把在世界工会联合会內部进行破坏活动的任务寄托在他的身上。而破坏世界工会的統一的活动遭到可耻的失敗，却并不是加萊的过錯。

加萊在美国国内政治生活中起了不少的反动作用。他几乎在整个数十年里总是千方百計地想把进步的领导从电气工人工会中排挤出去。当这些企圖遭到徹底破产的时候，加萊便在1949年依靠产联领导集团和电气康采恩的帮助，成立了他自己的“工会”；这个工会現在用尽一切最卑鄙的办法来对进步的联合电气工人工会进行分裂活动。

加萊認為沒有必要掩盖其作为帝国主义者和法西斯盟友的内心。不是別人，正是加萊本人在1959年曾經声称：“我們要在新的战争中联合法西斯主义来击潰共产党人。”世界工会联合会主席朱塞佩·維多里奧在給加萊的信中对他的“活动”作了如下的評述：“……你和你的产联以及你的黃

色的国际联合会准备和法西斯分子結成联盟。这就証明，你完全意識到这样的事实：你所服务的事業和法西斯主义的事業合而为一了。”朱塞佩·維多里奧在自己的信中接着写道：“在自己的下賤的職業开始的时候，总多少保持着一点羞耻心，并且还敢于坚持自己的‘廉潔’，后来就急轉直下，瀕于深淵，并丧失了一切，包括羞耻心在內。”如維多里奧所指出的，現任产联司庫的加萊所經歷的也正是这样。

約翰·路易斯——从1919年起即担任联合矿工工会主席——是美国臭名昭著的反动的工会头子之一。路易斯在政治方面倾向于美国資产阶级的最反动的集团。他是美国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組織的不可調和的敌人。在美国未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年代里，路易斯采取了“孤立主义”的立場，是慕尼黑政策积极的拥护者。

路易斯依靠卑鄙的陰謀窃据了工会主席的职位，并以極其殘酷的恐怖手段和欺騙性的蠱惑宣傳来保持这个职位。路易斯广泛地采取恐怖手段对付进步分子。路易斯把他的亲信安插在一切最重要的崗位上。他把自己的亲戚提升为許多組織的領導。例如，他把联合矿工工会所屬的建筑工人联合会主席的职务交給了自己的兄弟捷尼。

当然，路易斯在这方面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其他一些反动的工会領袖都把他們所領導的組織視为私人的世襲領地。例如，自1916年起就領導木匠工会（屬劳联）而于1952年因年老退休的哈契遜，就隨便地把工会主席的职务交給了自己的兒子。美国东海岸碼頭工人工会主席乔瑟夫·雷揚在1943年把自己的主席职务固定为終身职务。工人們甚至諷刺地把他叫作“霸王雷揚”。

反动的工会領袖欺騙群众的形式和方法

反动的工会領袖既是資本主义制度的热烈的衛护者，为了欺騙广大劳动群众，就不得不掩盖其在工人运动中的背叛活动。他們的一切策略的手段和方法都是为这种伪装的目的服务的，其中基本的东西就是进行“階級合作”和“階級利益調和”的蠱惑宣傳。这里所談的这一类型的工会領導人千方百計地想把最反动的思想，即似乎在資本主义社会里可以協調两个对抗階級的利益，并使資產階級和無产階級“協調地团結起来”的反动思想灌輸到美国工人的思想意識中去。并且美国反动的工会領袖中有些人为了無限地討好資產階級，甚至硬說似乎在美国是沒有階級的。

劳联副主席大衛·杜宾斯基公开地声称：“工会运动需要資本主义，正如魚需要水一样。”前面已經提到的哥倫比亞大学教师、“美国工会运动”一書的作者米尔斯在援引杜宾斯基的声明时指出，今天在美国，工会和私有制是“同一体系的組成部分”。米尔斯竭力帮助工人階級的叛徒来掩盖他們的背叛行为，騙人地在工会和工会的反动領導人之間画上等号。反动的工会領袖無可爭辯地是美国資本主义制度十分重要的部分。他們是美国資本主义的支柱和資本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

反动的工会領袖們企圖以其“階級合作”的煽动性的号召来迷惑無产階級，迷惑工人，阻碍他們的階級自覺的提高。并且，反动的工会領袖們不仅妨碍工会中有組織的工人的階級自覺的提高，竭力使工会运动“不致損害”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还企圖使工会为資產階級服务，特別是企圖把工会变为企業主进一步提高劳动强度和从工人身上榨取

最大限度利潤的工具。根据美国劳工联合会前任主席格林的声明，工会的任务就是成为提高劳动强度和扩大采用血汗制度的方法方面的“代办所”。反动的工会領袖們想方設法地利用他們所領導的正是作为这种“代办所”的組織，他們向来就力圖保證企業主有可能無限制地加强对工人的資本主义剝削。

还在二十年代，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后不久，劳联的上層分子就發表了“生产合理化”、即加强血汗制度的計劃，并向企業主表示自己將在这方面給予支持。在1929—1933年的經濟危机剛开始的时候，劳联的正式机关刊物“美国劳联會員”發表了一篇文章，要求进一步極度地提高劳动强度，而这是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失業現象的巨大增長的。当工人階級遭受真正的慘剧，当半数工人無工可做和千百万劳动者陷于真正絕望的处境的时候，劳联的領袖們却只圖替資本家“節約”，要求劳动者成为这种“節約”的牺牲品。不錯，劳联的头子們硬說“節約”有可能提高那些还没有停止工作的工人的工資。但是这种断言，一方面只不过是騙人的謊話，一方面也反映了劳联上層分子靠牺牲广大工人群众以支持“工人貴族”狹隘階層的意願。劳联副主席馬休·伍尔曾經極其厚顏無耻地說过：“拥有一个不大的相当滿意的团体，要比拥有不称心的和騷扰不安的群众来得好些。”不消說，国家的統治集团是完全贊同这种“观点”的。

反动的工会領袖的背叛活动現在較过去越来越猖獗，它促使劳动强度極度地提高，使工人精疲力尽，并使美国的失業人数大大增加。当美国工人力圖反对許多諸如此类的殘酷的条件时，企業主和反动工会領袖則結成統一战綫同他們相敌对。

乔治·米尼在1951年所作的声明在这方面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他在黄色的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机关刊物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得不使我们所代表的劳动者同意接受严格的监督，我们要负起这一监督的责任。我们应当告诉这些劳动者，他们不能获得他们所追求的那种如他们想像的、他们应当获得的工资和劳动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讲来，我们应当成为执行政府命令的代理人。不过我们都准备担任这一不得人心的角色。”^①

试问这究竟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扩大美国的军事生产，为了准备新的世界大战和垄断组织的最大限度的利润。

反动的工会领袖依靠奴役性的秘密契约和蛊惑的宣传活动束缚着工人阶级的双手。当他们虽已竭尽全力仍不能阻止罢工的时候，他们就力图来领导罢工，以便最后叛卖罢工。他们一步一步地阻止斗争的发展，瓦解罢工者的队伍，竭力破坏罢工者的战斗力，使他们遭受失败，使他们对于积极起来反对企业家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丧失信心。

工会的行会性结构为这些工会叛卖罢工斗争大开方便之门。

福斯特写道：“整个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例如，当某一企业的机械工人举行罢工的时候，这个企业里的有组织的锅炉工人还若无其事地在工作；木工在建筑工地上举行罢工的时候，有组织的瓦工还在继续工作；码头工人企图停止船坞一切工作的时候，海员工会的会员还继续为工贼分子所装运的船只服务；印刷所排字工人在举行罢工的时候，印刷工人还停留在机器旁边；铁路司炉在宣布罢工的时候，司机

^① 参看“世界工会运动”杂志，中文版，1951年第24期，第6页。

还頑強地繼續工作，并幫助企業主击破罢工者的反抗。”^①

美国劳联和产联的反动領袖們不仅竭力不讓工人階級一致行动，而且还阻撓在不同的生产部門中同时發生大罢工。他們尽一切可能来破坏團結一致的罢工。劳联的領袖們在其反对罢工运动的活动中表現得最徹底而又露骨。劳联的某些領袖一再硬說罢工似乎是一种“胡鬧的表現”，而且是在現代文明世紀中所不能允許的。反动的工会領袖不止一次地对政府和企業主承担了不許罢工的责任。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1929—1933年的經濟危机时期，当时的劳联主席格林曾同美国总统胡佛簽訂了所謂“君子协定”。协定責成工会不得采取罢工手段，也就是說甚至当企業主在策划和实行大大降低工資的时候工会也不得企圖阻止。反动的工会領袖在以后时期就一再地这样干了。

反动的工会領袖的工賊活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別加强起来了。在1946年罢工运动巨大高漲的时刻，劳联的領導集团首先竭力拒絕参加这一运动，并声明說，他們同罢工是沒有任何关系的。

甚至对那种反劳工的、特别是反罢工的法律，如剝夺劳动者起碼的政治权利和經濟权利的塔夫脫—哈特萊法，反动的工会領袖也只是在表面上加以指責而已。劳联的領袖和产联的右翼領袖虽然也声明过他們对这项法律的否定态度，但是他們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塔夫脫—哈特萊法的拟訂和实施，而他們中間的一部分人（劳联的哈契遜和馬休·伍尔等人）甚至秘密地协助这项法律的实施。無論

① 見威廉·羅斯特“美国的工会騙子”，工会国际出版局1928年版，第109頁。

勞聯的領袖或是產聯的右翼，實際上都不反對限制工人的罷工權利；他們總是非常害怕工人群眾的積極性。當然，勞聯的上層分子和產聯領導集團的反動分子絲毫不反對塔夫脫—哈特萊法的那些旨在反對工人運動的進步力量的章節。勞聯的領袖們甚至歡迎該項法律中那些使產業工會受到重大損失的威脅性的條款，因為他們所領導的工會基本上是一些行會性的工會，並且他們可以指望在與產業工會聯合會中的反動分子爭奪華爾街奴僕首位的競爭中鞏固自己的地位。

由此可見，無論是勞聯的領袖，無論是產聯的許多領導人，都決不努力組織、也不領導群眾對塔夫脫—哈特萊法進行鬥爭。但是，工人群眾要求進行反擊，並已準備進行。1947年春，在全國許多州和城市里，成立了一些代表產聯和勞聯的工會地方組織的聯合委員會，其目的在於同反動派侵犯工人階級的工會權利作鬥爭。4月21日反對反勞工法的政治罷工，席卷了整個衣阿華州的企業。參加這次罷工的工人達十萬。杜魯門總統接到了將近七十萬封對已經準備就緒的塔夫脫—哈特萊法表示憤慨的信件和電報。當該項法律已被批准的時候，在紐約州舉行了十萬人表示抗議的示威遊行。該項法律的批准激起了為勞聯和產聯的領袖們所竭力反對的一系列表示抗議的罷工。

塔夫脫—哈特萊法通過以後七年來，勞聯和產聯的領袖們始終對要求廢除該項法律的群眾運動實行消極怠工。在勞聯和產聯的上層分子的默許下，有時也在他們的代表的直接支持下，全國許多州為了補充已被聯邦議會所通過的塔夫脫—哈特萊法，都實行了反對工會和罷工鬥爭的地方法律，並往往被稱為“小塔夫脫—哈特萊法”。在廣大勞動

群众日益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情绪的情况下，劳联和产联的领袖们不久以前才不得不重新对塔夫脱—哈特莱法采取了煽动性的相机行事的手腕。在劳联和产联最近一次（1953年秋）的代表大会上，这些组织的反动的头子们装腔作势地“批评”了艾森豪威尔总统，责备他违反了自己在选举前所作的“重新审查”塔夫脱—哈特莱法的诺言。同样为了这种蛊惑宣传，劳联的代表、反动的工会领袖达尔金故意辞去劳工部长的职务。民主党参议员希尔对达尔金的辞职讽刺地声称：“共和党人失去了达尔金这样一块工会的遮羞布。”

为了使工人阶级的斗争陷于瘫痪和从思想上解除美国无产阶级的武装，反动的工会领袖们坚决劝阻工人不要用任何的积极行动来捍卫被肆无忌惮地践踏了的劳动者的民主和社会权利。米尼、路德之流虚伪地断言，由于美国国家的民主性质，这种斗争似乎是多余的。他们企图依靠弥天的谎言来掩盖这一事实：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民主乃是一种少数剥削者反对大多数被剥削者的假民主。

反动的工会领袖们用尽他们欺騙宣传的一切手段，竭力想使美国工人阶级相信，似乎工人阶级只要依靠美国法院和国会就可以达到社会正义。这种宣传同美国政治制度法西斯化所特有的日常实际情形有显著矛盾，这一事实并没有使美国工会的头子感到惶恐不安。尽管在最近几年以来，美国通过了一系列反劳工的、亲法西斯的法律，把原来就有限的和有条件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最后一点残余也化为乌有，但是劳联和产联的领导人仍像过去一样要工人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即将来临的国会选举的结局上面。

对资本主义制度崇拜得五体投地和完全否認阶级斗争

——这就是美国反动的工会領袖的全部思想和政策。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引起了他們的無限憎恨。他們在对科学共产主义的战無不胜的思想的瘋狂而又卑鄙的攻击中極尽詆毀和誣蔑之能事，完全不擇手段。例如，在1952年底以前，当时的产联主席莫萊毫不害羞地硬說似乎“社会主义是一种反美的外国学說”。当然，这种毫無价值的謊言本身，只是証明了美国资本主义衛护者的严重的外强中干。把美国資本披上新的、似乎是“人民的”外衣的企圖也証明了这种外强中干。这些企圖已被資產階級的哲学家、經濟学家和反动的工会領袖一再地嘗試过了。

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即二十年代，美国产生了曾被威廉·福斯特諷刺为“工会的資本主义”的运动。劳联的領袖在依靠工会資金建立所謂工人銀行和保險公司的同时，并展开了广泛的蠢感宣傳运动。他們断言，似乎工会會員都要成为这些銀行和保險企業的集体所有者，成为这些企業收入的分享者，从而也就成了資本家。另一方面，劳联的領袖，也和工業公司的領導人一样，鼓励工人購買这些公司的股票。反动的工会領袖，也和資產階級的經濟学家一样，声称：如果工人購買了股票，就加入了資產階級的行列，因而他們和資本家之間的差別似乎也就消灭了。例如，資產階級的經濟学家卡尔威尔直率地写道，股份公司的發展能够消除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差別，使工人变成資本家；而“火車司机兄弟会”的工会杂志發表的文章說，“工人銀行乃是世界上唯一的价值無比的革命”，工会应当告訴自己的會員，他們怎样才能成为資本家。

不消說，所有这些声明都是直接的蠢感宣傳；而整个的“工会的資本主义”及其散布在工人中間的一切“工人”銀

行、保險公司和股票，都完全是欺騙。工人在分期購買股票的時候，把自己菲薄的勞動所得也貸給了資本家。況且股票還使工人產生關心企業利潤的錯誤觀念，從而使他們放棄罷工和完全放棄爭取提高工資的鬥爭。但是，企業主的收入中按工人所持有的股票進行分配的那一部分是微乎其微的，往往甚至毫無所獲，因為工人從股票上獲得附加收入要等股金完全付清後好幾年才能開始。至於所謂“工人”銀行和保險公司，那末它們的建立只是為了讓工會領袖侵吞工會的資金。這些工會領袖實際上已經成了上述企業的主人，從而真正更加接近於資產階級。不過，工會的銀行和保險公司是不能與強大的資本主義銀行和保險公司相競爭的，1929年開始的經濟危機迅速使工會的銀行和保險公司幾乎全部破產。1929—1933年的危機根本消滅了二十年代的“工會的資本主義”，因此甚至留在工人手裡的少數股票也都大大貶值了。

雖然如此，現在還有人在重新尋求依靠類似性質的蠱惑宣傳來欺騙工人階級的方法。全國製造商協會和美國商會的宣傳專家們現在正在加緊尋找這樣一些術語，依靠這些術語就可以掩蓋與千百萬勞動群眾深刻敵對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性質。美國雜誌“一周間”在1951年初發表了一篇題目囂張的“要求給資本主義以新的名稱”的文章。文章的作者抱怨地說，用“資本主義”一詞，很難把資產階級的社会描繪成美妙的世界。作者由此得出結論說，應該發明如“人民的資本主義”或“民主的資本主義”之類的新的名稱。其他各種雜誌也都發表了關於這種謬論的文章。例如，“星期六文學評論”雜誌在1953年一月號上所刊載的許多文章，都企圖斷言壟斷資本似乎可以促進文化的發展和人民的物質福利

的增長。

尽管二十年代的“工会的資本主义”已遭到可耻的破产，但是反动的工会領袖們現在仍企圖恢复“工会的資本主义”的欺騙口号，从而帮助美国資產階級掩盖其階級統治的反人民的反动性質。反动的工会領袖們始終忠实于自己的“階級合作”的“思想”，他們越是难以欺騙美国人民，他們的蠱惑性的謊言就越令人厭煩，他們的反劳工活动就更越加積極。从这一观点来看，劳联和产联的領導集团在馬歇尔計劃被通过时所持的立場是特別显著的。資產階級在这一“計劃”的幌子下所进行的思想破坏活动，得到了工会官僚的最積極的支持。劳联和产联的上層分子立即利用馬歇尔計劃作为借口，以便根据这个新的理由把自己的“工会和工厂主合作”这个老一套的綱領塞給工人。1948年底，莫萊曾允諾杜魯門依靠这一个綱領来在美国“消灭階級斗争”。

領導着劳联和产联的反动集团也積極参加了联邦調查局(政治警察局和特务机关)、“非美活动”調查委員會以及其他政府机关所进行的迫害进步力量的运动。联邦調查局局長埃德加·胡佛本人承認說，这两个工会中央机关的領袖已同他合作。而且除了这种直接的合作以外，劳联和产联的領導集团在对待美国工会运动的左翼方面所采取的截然敌对的立場，也帮助了美国統治集团对工会的进步力量实行警察迫害。

反动的工会領袖不仅在美国資本主义体系中扮演着工人运动破坏者的角色，充当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在無產階級中間的傳導者，而且往往成为資產階級所編造的、旨在分裂工人階級的最卑鄙“理論”的衛護者。这里首先是指最惡毒的种族論。

反动的工会領袖中有不少人是仇視人类的种族主义政策的最热烈的傳播者。例如，在1948年紡織工人工会的代表大会上，該会主席爱米尔·里夫竭力撤銷了普通會員所提出的要求禁止私刑和譴責种族歧視的決議。工会領袖在他們所領導的組織內建立了种族限制的整套制度。在劳联和各鐵路工人工会中特別流行着的这种制度，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根本堵塞了黑人工人参加工会的途徑，从而使他們在企業主面前仍然是無組織的和散漫的。在产联中，这种狀況稍好一些，那里黑人可以加入工会，但不准担任工会的領導职务。而且允許黑种工人参加工会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使他們無論在工資方面，無論在劳动权利方面不被歧視。产联的領導人往往协助企業主竭力解雇由他們領導的工会中的黑人會員。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他們都千方百計地使黑人和白种工人对立。反动的工会領袖們在蓄意加强对黑人剝削的同时，偽善地把降低一般工資水平的責任推卸在黑人的身上。由此可見，工会官僚唆使白种工人反对黑种工人，給企業主創造了便于利用工賊活动的条件：当白种工人在罢工的时候，就利用黑人来代替白种工人；当黑人在罢工的时候，就利用白种工人来代替黑人。

在工会“中立”的招牌下对工人階級 政治利益的背叛行为

在美国工会运动史的全部过程中，反动的工会領袖乃是阻撓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創立的最凶狠的敌人。他們的世界觀和物質利益同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因而企圖用一切手段來阻撓工人階級建立自己的独立的、群众性的政治組織。他們从过去到現在都在硬說，工会运动应当“中

立”，“政治活动会破坏工会”。这种欺騙性的“理論”已經反映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章程中；章程中着重指出，在劳联的代表大会上不应当进行任何政治活动。当然，这决不是說，劳联和产联的领导人真正是中立的，真正是超政治的。劳联和产联的领导人是一切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政策敌人，这正因为他们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方针的拥护者和积极的传导者。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阶级利益要求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解除武装，使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俘虏。因此，美国反动的工会领袖們就經常把工人阶级组织的低级形式工会同它的高级形式工人政党对立起来，从而阻碍着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的美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上必然的发动。

劳联和产联的头子們不遺余力地使工人阶级相信，似乎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对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作一些改善就是工会的唯一任务，似乎戈比之集成盧布对于劳动者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策都更亲切和更宝贵。他們硬說，工人阶级的政党根本是多余的。按照劳联领导人的說法，工人只要充分支持那些贊同劳动者的要求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代表，就能够达到必要的結果。实际上，产联领袖的論証也正是这样，他們通常不仅号召工会会员支持民主党，而且声称民主党的领袖——华尔街政治走卒集团——乃是劳动者利益的保护者。

当然，反动的工会领袖的这种“無党”政策实际上乃是对广大群众的巧妙的欺騙行为。这种政策使广大群众脱离了唯一正确的道路——組織具有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治方针的无产阶级自己的政党。这种政策阻碍着消除资产阶级对美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反

動的工会領袖就瘋狂地仇恨那些为使美国無产階級摆脱資产階級政党的影响，为使無产階級最終地摆脱雇佣奴隶地位而斗争的美国共产党人。

从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初几天起，反对共产党和美国工人运动中一切进步力量的瘋狂运动，在美国反动的工会官僚的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劳联的历届代表大会几乎是經常在反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的气氛中进行的。在历届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決議中，劳联的領袖一再証实了他們对共产主义的敌对态度。

最近几年来，产联的領袖在迫害工人运动的进步力量方面也表现了同样的热心。他們在竭力地加深着美国工人运动队伍的分裂，使美国劳动者为了对壟断資本向他們的起碼的政治权利和經濟权利的进攻作斗争而建立統一战綫的任何試圖归于失敗。当共产党向各工会組織提議以統一战綫来反对塔夫脫—哈特萊法的时候，产联执行委员会就正式宣称，它不贊成共产党人的倡議。

美国的选举运动清楚地显露出劳联和产联的头子們所鼓吹的工会“中立”这一欺騙政策的背叛性質。工人选举共和党或民主党的政客作为自己的代表，并不能保証维护即便是他們的直接的、純粹經濟上的需要和利益。不錯，在选举运动期間，某些共和党或民主党的代表人物，甚至共和党或民主党往往都主張滿足劳动者的任何要求。但是，在选举前夕欺騙选民乃是这两个政党慣常玩弄的政治伎倆。

例如，在1948年总統选举期間，民主党候选人杜魯門曾不惜立下諾言，并担保說，如他当选总統，就廢止反劳工的塔夫脫—哈特萊法。反动的工会領袖們佯裝相信这种諾言，号召工人都投杜魯門的票。但在选举以后，果不出所

料，杜魯門已“忘掉了”自己在選舉前的諾言，而塔夫脫—哈特萊法仍舊有效。在1952年的總統選舉的時候也是這樣。

反動的工會領袖的背叛政策不僅阻礙了工人階級政治自覺的提高和妨害了群眾性工人政黨的建立，而且使將近三千八百萬人在1952年的總統選舉時沒有參加投票。

反動的工會官僚是阻礙美國工人階級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出現的最重要的障礙。

反動的工會領袖同美國法西斯組織 和警察組織的關係

工會的領袖們為了保持自己在工會里的權力而利用暴徒惡棍以及同警察組織和法西斯組織的密切聯繫，這是與分裂和瓦解工人運動的政策同時並進的。大家知道，美國壟斷組織在企圖阻礙工會的成立和發展的同時，常常利用各種專門的特務機構和工賊機構。還在1936年，由參議員拉福列特擔任主席的美國參議院小組委員會，查明瞭對工人——企業內的工會積極分子進行經常的間諜活動和在罷工時利用職業的工賊分子的事實。小組委員會所提出的報告是由十五冊具體材料組成的。

報告書的作者列舉很多例子，證明企業主怎樣利用間諜活動使工人和職員不能參加真正的工會，企業主怎樣解雇那些參加工會的工人和把他們列入黑名單，企業主怎樣在無賴之徒（他們過去往往是刑事犯）中招募大批的工賊，並用使人嘔吐的催淚彈、手槍和機槍來武裝他們。

在拉福列特的小組委員會報告所談到的時期內，反勞工的間諜——工賊機構的活動遍及全國。根據美國政論家哈尤別爾曼關於同一時期情況的證明，反勞工的特務和工

賊地方組織在美國幾萬個居民點上都有。它們領導了幾十萬個按照“計件工資”為企業主效勞的特務。哈尤別爾曼寫道，在每一個工人組織里都有特務分子，假如沒有特務組織所僱用的特務在場就不能召開群眾大會。沒有一次挑釁和背叛活動不被這些特務機構用來反對工人階級。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特務機構提供了僱用的殺人犯來“剷除”在企業主看來是“不合心意”的工人組織的活動家。它們也提供了挑撥者來組織各種謀殺、爆炸等等活動，以便為警察的干涉、對罷工者的血腥鎮壓和大批逮捕工人領袖並加以判罪製造借口。

現在在美國，特別是在那些工人很少組織起來的地區和經濟部門，都在採用這些鎮壓工人運動的方法。

特務一奸細機構分布很廣。大家知道，眾議院的法西斯化的所謂“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就大量利用這種機構的“證據”和“材料”。對共產黨和進步工會的領導者和活動家所提出的“控告”，以及最近幾年來對他們所進行的審訊，都是完全以職業的奸細分子的“見証”為根據的。

1947年美國商會發出的指示是值得注意的。這個指示不僅教導企業的行政當局如何在進步工會里進行破壞工作的最好方法，而且建議為此要在“體面的、抱有美國情緒的工會工作者”中間，即在反動的工會領導人中間招募代理人。這個指示直率地把杜賓斯基（勞聯所屬女裝縫紉工人工会主席）、路德（產聯和汽車工人工会主席），最後把天主教徒工會會員協會的活動家（顯然是指加萊之流），稱為這種“體面的、抱有美國情緒的工會工作者”。有趣的是：這一厚顏無恥的文件首先着重指出反動的工會領袖，同時也建議企業主不要忘記暗探局和一切法西斯團體。換句話說，

它劝告劳联和产联的活动家們要同暗探局及法西斯恐怖分子和挑撥分子暴徒惡棍实行合作。这种合作在現時是具有特殊性質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反动的工会官僚同暗探局、“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资产阶级的司法机关和像法西斯化的美国軍团乃至三K党一类的組織的关系明显地加强了。劳联和产联的領袖在其反对美国工会运动左翼的殘酷的运动中是不会因任何阻攔而裹足不前的。1952年初，路德公开地呼吁“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加以协助，以便能用强力排除掉代表着六万工人的底特律第六〇〇号地方工会組織的領導中的进步分子。其他反动的工会領袖也都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例如，1948年秋，产联司庫加萊挑撥起由反动头子凱尔斯頓担任主席的众議院劳工問題小組委员会进行了所謂对“共产党人潛入”进步的联合电气工人工会的“調查”。

凱尔斯頓的小組委员会仿效“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的法西斯的方法，傳見工会的領導人和積極分子，訊問他們的政治观点，并根据加萊的証詞“控告”他們同共产党有联系，后来“被告們”因此被企業行政当局列入“黑名單”，并被解除工作。在那什維尔(印第安州)“通用电气公司”托拉斯的工厂里，凱尔斯頓的小組委员会要求工人具結，要他們不相信共产党的原則，要他們相信上帝并常上教堂。“調查人”依靠这种具結，以及采取挑撥离間和收买的手段，企圖分裂联合电气工人工会的地方組織。加萊也在千方百計地企圖分裂这个工会的地方組織。反动的工会領袖和国会許多委员会的法西斯“調查人”的目的和方法的一致，很少表現得像在凱尔斯頓及其伙伴的活动中那样明显。

1950年初，在对西海岸碼頭工人工会的进步領導人加

里·布里治所扮演的审讯丑剧的日子里，加莱招募并指示伪証人提出控告。同年1月底，加莱在美国军团的大会上发表了关于反动的工会官僚准备同法西斯主义结成同盟这一前所未闻的公然无耻的声明，实际上他并没有说出什么新的东西。大家知道，劳联和产联的统治集团和美国法西斯团体之间早就保持了关系，而反动的工会领袖和美国军团之间的这种关系是特别密切的。

美国军团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美国财政寡头建立起来的。从1919年起，它成了美国工贼活动的主导力量。在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时期，美国军团在破坏劳动者的罢工和大规模发动方面已同警察积极合作，并且美国军团分子往往用希特勒匪徒的办法使受害者受到恶毒的凌辱和拷打。

劳联的领导集团在这几十年内正以自己的活动配合着这伙反劳工的横行霸道的恶棍。美国军团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都把他们所领导的组织看作是维护美国垄断资本专政的力量中的最重要的力量。例如，在1944年劳联的代表大会上，美国军团的首领沙依伯林曾公开宣称，美国劳工联合会和美国军团之间存在着兄弟般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在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共同斗争的基础上产生的。

1950年1月在纽约召开的亲法西斯团体的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在美国建立“常设的反共产主义的联合组织”的决议。全国制造商协会是这次集会的倡议者和鼓吹者，而美国军团则是主要的组织者。反动的工会领袖在代表会议的工作中占有极其显著的地位。除加莱以外，劳联代表马休·伍尔也出席了。加莱在产联的伙友哈里·列特在这次代表会议上被委任领导开展法西斯主义宣传和准备破坏美

國國內或國外的進步組織的委員會。

勞聯和產聯的領導人并不仅仅只和美国軍团实行合作，他們还与狂暴的种族主义的組織三K党結成統一戰綫。勞聯和產聯的反动头子同一切逞凶的法西斯組織和警察机关結成統一戰綫来反对美国工会运动中的进步力量。

第四章

美国反动的工会領袖在国际舞台上的分裂活动

劳联和产联的头子是美国壟断組織的 帝国主义計劃的傳导者

米尼、伍尔、布朗、路德、加萊之类美国反动的工会領袖，不仅在国内生活問題方面，而且在国际性質的問題方面，过去和現在都是壟断資本的綱領的積極傳导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反动的工会領袖为了美国壟断組織的利益，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特別積極起来。他們同国务院、軍閥、間諜、特务和破坏机关一起，企圖保障华尔街的世界霸权。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帝国主义領導了世界反动陣营，美国工会官僚在国际机会主义陣营中的作用和意义日益增長。現在，工会官僚的代表人物和領導人要求在資本主义世界各国工会运动中充当独裁者。他們也并不掩盖他們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首先是为美国的对外侵略政策服务的。劳联过去的司庫米尼（自1952年底起担任劳联主席）在劳联正式机关刊物“劳联会員”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十分露骨地声称，不可能美国工人有一种对外政策，而美国企業主义有另外一种对外政策；共和党人有一种对外政策，

而民主党人又有另外一种对外政策。米尼声称：“我們不是取得胜利，就是遭到失敗。”当然，米尼之类活动家是同美国帝国主义分割不开的。这种情况已为美国资产阶级报刊所承認，有时也直接为美国政府机关所承認。例如，美国劳工部長在1951年的报告中就談到反动的工会領袖給美国政府的帮助，并且承認美国工会运动乃是“在現代思想意識的冲突中”的最强有力的“美国武器”之一。美国商会过去的主席爱里克·瓊斯頓甚至提議用反动的工会領袖来充实美国駐国外的外交官員。

工会的反动領袖們早已对美国統治集团表明自己是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狂热的傳导者。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劳工联合会和產業工会联合会的許多領導人就積極支持美国主要壟断集团的慕尼黑政策。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是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公开的或秘密的拥护者。美国反动的工会領袖們坚决反对苏联工会在三十年代末期为保障世界工会統一所作的試圖，对工人阶级反对日益增長的战争危险的斗争实行消極怠工。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反动的工会領袖們仍不止一次地企圖以其反苏宣傳分裂反希特勒同盟。劳联主席格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后便立刻發表关于同苏联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声明，并号召軍备竞赛。

1947年3月所公布的、宣布对一切进步力量开火并担保美国支持全世界一切反动势力的“杜魯門主义”，受到了美国工会領袖的完全贊同。在“杜魯門主义”公布以后接着發表的馬歇尔計劃也同样受到了劳联和产联的上層分子的全力支持。这两个工会中心的領袖們最積極地参加了强迫西欧各国接受这一計劃。業已攫取了劳联和产联的权柄的

匪帮也完全贊同美国統治集团其他的侵略行动：組織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北大西洋軍事联盟，建立在希特勒的將軍指揮下的西德复仇主义者的軍隊，复活日本軍国主义，准备建立由美国的僕从国家組成的太平洋联盟，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支那各国以及亞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进行武裝干涉。

在美国工会报刊上，經常發表加紧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冷战”的号召。劳联和产联的領袖們完全贊同对朝鮮人民的罪惡进攻。他們要求“取消三八綫”，也就是強占整个朝鮮，并使美軍侵犯人民中国的国境。1951年初劳联执行委员会所通过的決議，拒絕和平解决朝鮮問題，坚决主張封鎖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張美国繼續占領台灣和进一步援助国民党匪帮。产联現任主席路德也發表了支持美国侵略朝鮮的一本骯髒的小冊子。劳联和产联的領袖不止一次地企圖使工人們相信美国武裝干涉印度支那的“必要性”。1954年4月，米尼發表了一篇实际上要求把印度支那变成“新的朝鮮”的文章。米尼的文章与壟断集团和軍閥的狂妄的代表人物的演說，沒有任何不同之点。

在美国侵略亞洲开始以后，两个工会中心的宣傳机器也和資本主义壟断組織的报刊和無綫电一样，广泛地散布关于似乎有一种外来的危險威胁着美国的欺騙論調。反动的工会領袖在似乎存在着“危險”的騙人的借口下，要求劳动者为軍备竞赛而牺牲，并对拥护和平的运动进行卑鄙的迫害。战争挑撥者的工会帮凶們力圖扼杀这一不仅在美国、而且还在其他国家盛行的現代不可抗拒的运动。

在他們的直接参与之下，美国的和平拥护者遭到迫害，美国和平友人所召集的代表大会和代表會議的工作受到千

方百計的破坏。

勞联和产联的头子們一貫主張反对国际舞台上的拥护和平运动。勞联的欧洲特派員布朗甚至企圖領導握着手槍的暴徒惡棍迫使馬賽的法国碼頭工人把美国武器从輪船上卸下来。勞联主席吩咐在所謂“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中他的西欧傀儡們采用一切手段，其中包括如土匪行为、間諜活动和破坏手段，来对和平拥护者和爱好和平的各国作斗争。这种反对和平拥护者的罪惡活动是与反对国际舞台上的进步力量的瘋狂运动結合在一起的。勞联战后几次代表大会的特点就是一貫公开地号召对苏联和民主陣营的其他国家进行战争。

馬歇尔計劃出現以后，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右翼領袖在美国統治集团的支持下，業已公开地同反动势力勾結起来了，产联的代表大会也开始和勞联的代表大会相类似。从1949年起，产联的代表大会也始終一貫地支持美国壟断組織的战略計劃和侵略的对外政策。

产联和勞联的头子們積極地帮助壟断組織將美国保持在經常的战争歇斯底里的状态中，这种战争歇斯底里正是統治集团为了繼續加强国家的軍国主义化所必需的。“商务日报”1952年6月在評述战争歇斯底里对于軍备竞赛的意义时写道，“为了要使国会能够撥款，需要社会輿論的支持”。1953年底召开的勞联和产联的代表大会，又一次表明了米尼和路德集团不惜任何代价使美国保持战争狂热的願望。例如，在9月于聖路易召开的勞联代表大会上，国家的軍国主义化的政策又一次得到了完全的支持。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代表大会上發表了惡毒的反苏演說。美国国务卿的声明正是勞联的头子們为了促使代表大会的代表通过决

議來全力支持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所必需的。在1953年于克利夫蘭召开的产联的代表大会上，美国政府代表和反动的工会領袖企圖借反苏宣傳來轉移代表們對美國工人階級的迫切問題的注意力。

劳联或产联反动的工会領袖之所以不停地進行反苏和反共的活動，是由于他們對擺脫了資本主義桎梏的人民的國家無限憎恨。美國反動的工會領袖對俄國工人階級的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和對社會主義強國在全世界影響的增長產生了簡直失去理性的驚懼，所以從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最初的日子起，他們就看到了自己在反對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國家的鬥爭中的基本任務。

由此可見，反動的工會領袖及其資本主義“主子”現時的反蘇行動，乃是華爾街一貫反對已擺脫資本主義桎梏的我們社會主義祖國人民的運動的繼續。在目前美國公開地持着建立世界霸權的方針的時期中，反動的工會領袖們對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陣營的瘋狂仇恨，具有特別殘酷的性質。

美國反動的工會領袖的破壞活動

美國帝國主義者撥出了大量經費在民主陣營的國家中進行破壞活動。下面就是發表在美國商會機關刊物“國家商業”上的一個最典型的供認：

“……我們正訓練間諜、破壞者和最危險的心理戰爭方面的專家，教他們怎樣鑽進俄國的企業去探聽任何的機密，教他們破壞橋梁、火車站和軍事工廠…… 他們精通秘密的通訊方法，這樣就能夠傳遞他們所探聽來的消息。他們混入居民里面，散布令人不安的謠言。”

反动的工会領袖們在美国壟斷組織訓練这种間諜—破坏分子的工作中起着不小的作用。

1948年，美国甚至建立了所謂“外国公务工会軍团”。青面獠牙的美国特务机关代理人欧文·布朗被作为劳联特派代表派駐欧洲。欧文·布朗需要以劳联代表的身分来作他进行破坏活动的官方掩护。証据确鑿地查明，欧文·布朗曾与波蘭的反革命秘密团体的头子們有过联系，他是在美国間諜处長官領導下的美国偵探管理局的一个部門的代表。欧文·布朗認為無須特別掩盖其似乎是“工会”活动的真正的性質。布朗在与法国“世界报”談話时供認，劳联从1945年开始，便有了对共产主义作斗争的特別綱領。布朗宣称，但在开始对共产主义作斗争以前，必須在必要的地方找到必要的人……从1945年开始，劳联在欧洲每年支出十万美元，其中絕大部分用在法国。除了布朗以外，其他許多反动的工会領袖也干着这种行業。因此，工会領袖在战后往往参加美国駐国外的外交机关和美国在西欧的占領行政机关，就毫不奇怪了。他們取得了各种名义，如劳工問題的顧問和參事，他們根据国务院和美国特务机关的指令，力圖用“劝告”、橫暴的压力和收买手段来加强反动分子在欧洲工会运动中的影响。在战后时期，美国各个特务机关和美国反动的工会領袖协同工作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赫斯特报纸联合組織評論員韋斯特布魯克·培格勒1952年在美国發表的几篇文章中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正撥款給劳联和参加劳联的女裝縫紉工人工会，供給它們經費在西欧各国进行破坏活动。

例如，1953年6月17日在柏林所組織的罪惡的冒險行动就是这种破坏活动的明显的事例。美国反动的工会領袖

参与了柏林的叛乱活动。例如，有一个以工会的招牌为掩护的和在欧文·布朗领导下的法西斯团体，在这次事件中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参加業已失败的柏林挑衅事件的还有其他一些仰仗美国面包过活的法律法西斯匪帮。

世界工联执行局在关于6月17日事件的声明中指出，劳联和产联的领袖们“奉行美国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政策，企图利用柏林的挑衅行动阻止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并加深各国劳动者之间的分裂……他们在工人之间散播仇视，并在各国人民之间煽动战争”。实际上，美国反动的工会领袖不仅亲手组织了柏林的叛乱，而且还企图围绕这次挑衅展开嚣张的、诬蔑的宣传运动。根据他们的直接指令，在1953年7月于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工贼的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例行代表大会上出现了几个无耻之徒，他们企图冒充为柏林事件的“蒙难者”。这些无耻之徒在代表大会的讲坛上所制造的煽动性的言论乃是反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卑鄙运动的信号；布朗、米尼和路德等人都积极地参加了这一运动。他们请求艾森豪威尔总统来干涉“柏林事件”，甚至建立了“援助东德工人”特别委员会。由路德率领的特派代表团曾出发到柏林。但是这种新的广泛策划的挑衅，和6月17日的挑衅一样，终于也遭到可耻的破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所发表的一本“被揭破的叛乱者”小册子，撕去了在柏林的法西斯行动的鼓舞者和组织者的假面具。業經确鑿証明，刑事犯伏里茨·叶吉凯和受骗的大学生赫容特·艾克什坦伪装为东德工人代表出席了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但是，劳联的头子们仍疯狂地把“解放东德”，即把侵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列入了劳联执行委员会1953年向劳联年会的报告里。这样一来，美国反动的工会领袖们就按

照美国战争挑撥者的指示，結成了一張既反对民主陣营国家，又反对資本主义国家(包括同北大西洋侵略集团有关国家在內)的工人階級的陰謀和挑釁的網。

劳联和产联的头子是 美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統一的敌人

战争挑撥者反对工人階級統一的斗争具有特殊的意义。1949年11月召开的共产党情报局會議的決議中說道：“战后的經驗証明，分裂工人运动的政策，乃是帝国主义者用以实行发动新战争、鎮压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急剧降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各种策略手段中的一种主要手段。”^①因此，美国帝国主义的工会走卒們都集中自己的注意力来对进步的美国工会中心和世界工会联合会进行破坏活动。

还在1946年劳联第六十五屆代表大会上，就通过決議在联合会內設立專門机构来领导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这个机构的名义是“国际劳工关系处”。领导这个机构的是美国最反动的工会領袖之一馬休·伍尔。后来在产联內也建立了类似的机构。在欧洲，以欧文·布朗为首的劳联的破坏中心开始了工作。接着产联也設立了这种代表机构；它的领导是維克多尔·路德(产联現任主席华尔特·路德的兄弟)。这些破坏中心毫不吝惜地撥付它們所拥有的美元来对进步的工会进行分裂活动。劳联和产联的反动的工会領袖为了極力討好美国壟断組織，甚至誇耀自己的这种活动，希望得到他們的資本主义“主子”的感激。1952年12月11日，劳联主席米尼在全国新聞俱乐部的演說中就是

① 見1949年11月29日美联“真理报”。

这样諂媚地提到他和艾森豪威尔的談話。米尼声称，艾森豪威尔憂慮的不是組織軍隊的問題，而是西欧的政治局勢，艾森豪威尔因处在共产党人影响之下的工会而不安。接着米尼指出，劳联已把大量經費用于分裂法国总工会……

米尼声称：“我們正为这种成績而驕傲，我們將繼續这种工作。”

業已攫取了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权柄的路德—加萊集团并不落后于劳联。路德—加萊集团同样积极地参加了破坏国际工人运动进步力量的活动，这在正式文件中也反映出来了。例如，产联在1950年10月9日第一一七七号公报中这样說道：“产业工会联合会决定派遣若干工会問題專家前往欧洲，使欧洲工会的领导人能够学习美国工会的领导人领导工会运动的方法。这些專家对欧洲工会的領袖在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也应当給予精神上的支持…… 預料，实现这项計劃得花十五万美元。”

为了华尔街的利益，劳联和产联的密使并不仅仅在欧洲进行活动。他們千方百計地把自己的破坏活动遍及世界各洲。美国反动的工会領袖們特別頑强地企圖破坏进步的拉丁美洲劳工联盟的影响。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分裂性的所謂美洲本土劳工組織于1951年在墨西哥成立。这个組織形式上是在“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庇护下，但实际上是在劳联和产联的領袖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整个战后时期，劳联和产联的密使也在日本横行霸道。

但是，尽管从美国壟断組織方面得到無数的津貼和从国务院方面得到經常的支持，美国反动的工会領袖的破坏活动在世界舞台上也并未奏效。無論在哪个国家，分裂分子也沒有能够損害进步的工会联合組織的地位。他們在

法国、意大利和拉丁美洲各国所建立起来的不大的分裂性的工賊組織处境十分困难；而各国进步的工会中心——法国总工会、意大利总工会、拉丁美洲劳工联盟——仍旧是这些国家工会运动的重要組織，是为民主、为和平、为劳动者迫切需要而斗争的强大力量。在日本，与劳联和产联的領袖們的拟望相反，在他們的積極支使下并在他們的忠实奴僕领导下所建立起来的工会总評議會，却并没有成为美国帝国主义的工賊工具。在参加“总評”的各个組織的普通会员群众的压力下，“总評”的領袖不得不表示拒絕美国反动工会領袖的苛刻要求。1953年2月在維也納召开的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的會議指出，美国国务院的代理人、产联的代表唐森赴东京，帶了七十万美元来收买“总評”的領袖。但是，“总評”的代表大会拒絕了唐森关于把这个組織并入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要求。这样，唐森特使終於彻底失敗。

代表大会通过了規定为爭取和平、反对使日本重新軍国主义化、不許美国在日本領土上享有軍事基地而斗争的行動綱領。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在“选举”領袖人的时候，使分裂分子的候选人遭到失敗，选出进步的代表来代替他們。

劳联和产联的头子們企圖消灭体現在世界工会联合会內的国际工会的統一，但是遭到了慘重的失敗。世界工联从1945年成立起，就受到国际反动派、首先是美国工会領袖不間断的、殘酷的破坏。

在表面上，劳联和产联的領袖們对待世界工联成立这件事的态度各不相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領袖人立即对它采取公开的敌对态度，并拒絕参加世界工会联合会；而产业工会联合会的領袖則决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世界工联，并考虑到在失利的时候从內部来破坏它。由此可見，产

联的領袖实际上在世界工联內起了美国帝国主义的“第五縱队”的作用。他們利用一切手段对世界工联的进步活动实行消極怠工。他們反对德国的工会联合組織，阻碍世界工联在殖民地和附屬国劳动者中間开展工作。他們企圖使世界工联为美国帝国主义服务。产联領袖們的这种企圖，从1947年美国帝国主义者通过馬歇尔計劃以后更加昭然若揭了。

在这一年，美国駐欧洲各国大使館的代表們在瑞士举行會議，劳联和产联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會議。产联的代表在会上公然声称，他們要“迫使”世界工联接受馬歇尔計劃，否則就瓦解世界工会联合会。在瑞士举行的會議为一系列类似性質的會議奠定基础。产业工会联合会和英国工会大会的領袖們在世界工联內扮演了馬歇尔計劃的直接傳导者的可耻角色，他們为实现这一背叛的目的而联合起来了。处在世界工会联合会队伍之外的劳联的头子們也对世界工联进行了破坏活动。

美国壟断組織的奴僕們对世界工会联合会的陰謀徹底失敗和他們迫使世界工联接受馬歇尔的帝国主义計劃沒有成功以后，他們在1948年世界工联执行局羅馬會議上企圖用强制的方法力求把进步的活动家排挤出联合会的領導地位，并代之以自己的亲信。他們指望用这种方法使世界工联变成宣傳和执行馬歇尔計劃的機構。

当这一破坏行动也遭到失敗的时候，美英兩國反动的工会領袖便抱定取消世界工联的方針，并用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它自行解散。美国、英国和荷蘭工会的反动的代表們在受到世界工联領導机关內大多数进步分子坚决的回击以后，便在1949年1月以退出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會議为

要挾，并宣布他們所領導的組織退出世界工聯。資產階級報刊對這些事件歡天喜地。

但是，歡樂並不長久。美國壟斷組織及其奴僕們顯然是失算了。他們沒有考慮到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工人運動中業已產生的深刻變化。他們沒有考慮到獲得世界工人運動一切進步力量支持的蘇聯工會的巨大威信。他們對世界工會聯合會的破壞行動遭到了可恥的失敗。世界工會聯合會清除了自己領導機關里的工人階級的怠工者和敵人以後，格外加強和鞏固了。世界工聯的會員成分是靠新的各國工會中心的加入而補充的。與此同時，反動的工會領袖的分裂活動引起了包括美英兩國在內的全世界勞動者的極大憤慨。

美英壟斷組織的工會走狗對世界工聯的陰謀遭到完全失敗以後，便着手成立他們自己的、如他們所希望的能夠與世界工聯相對抗的工賊“國際”。但是，無論是花費了的千百萬美元也好，或是美國國務院和英國外交部的直接支持也好，都不會、也不能產生如美英兩國帝國主義者及其勞聯、產聯和英國工會大會的奴僕們所指望的那些結果。1949年底分裂分子在倫敦召開的國際代表會議，乃是被工人群眾唾棄的并早已被揭穿是工人階級最凶惡敵人的工會官僚的集會。美國工會官僚的一切“精華”都出席了這次會議。甚至當時擔任勞聯主席的年邁的格林也離開自己在華盛頓的華麗住所前往開會，以便親自監視他們怎樣執行他的“主子”——美國壟斷資本家的指示。工會頭子路德率領了產聯的代表團。狄金、勞瑟及其一類的工人階級的叛徒代表英國工會參加了會議。西歐大陸國家到會的代表有：背叛了工人階級，靠美元在法國建立分裂團體“工人力量”的年已七

十的石屋；意大利工会运动中的美国雇用的代理人巴斯托尔；西德工会的分裂分子貝克列尔和狄特里赫。

會議的組織者不惜用任何手段来粉飾似乎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門面。美国代表团强迫与会者接受自己的意志，完全公开地执行了美国国务院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方針。美国人要求“代表們”完全支持按照华尔街指示簽訂的一切条約。劳联代表欧文·布朗在开导“代表們”的时候指出，新“国际”的基本任务將是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他大肆贊揚奴役性的馬歇尔計劃，并要求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都变成美国資本的附屬品。美国代表格林、路德、布朗等人在他們的演說中極尽了反苏和反共的無耻誹謗的能事，甚至连戈培尔也会自嘆不如。在会上，世界工会联合会受到了特別激烈的攻訐。美国代表要求西欧政府对世界工联和参加世界工联的各国工会中心进行警察迫害。

当然，除了極一般性質的蠢感的声明以外，倫敦集会的导演者們对于工人階級的社会經濟要求和需要是絲毫不加注意的。

分裂分子在倫敦代表會議上所成立的組織，为了伪装而美其名为“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这个組織从它存在的最初几天起，就已成为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和美国战争挑撥者在世界工人运动中的代理机关。但是，自由工会联合会沒有而且也不可能对工人階級群众發生影响。它的处境非常困难。十分典型的是，甚至反动的資產階級報紙也極其不安地承認在自由工会联合会队伍內部存在矛盾的事实，就中特別指出这个組織的美英兩國领导人之間的严重分歧。分歧之点是关于基本問題——“与共产主义作斗争”

問題，如所周知，这个“联合会”存在的全部意义也就在这里。还在1951年12月，当时担任劳联司庫的米尼从布魯塞爾“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执行局常会回到美国以后，就公开表示不满意英国和其他西欧僕从的态度，斥責他們沒有考虑“与共产主义作斗争”而单独讓美国反动的工会領袖来关怀这件事。接着，劳联領導集团拖延撥交經費給“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1952年7月初，“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总委员会在西柏林召开常会，格林—米尼集团拒絕派遣自己的代表出席會議。但是，問題究竟在哪里呢？

問題是，狄金、陶遜和巴斯托尔虽然極其反动，但也不得不考虑到西欧工人的情緒。西欧工人对奴役西欧国家和为了軍备竞赛而夺去他們飯碗的美国帝国主义的暴行表示憤慨。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西欧領袖們認為必須在反对工人运动的进步力量的活动中稍加小心謹慎。他們主張用更巧妙和更狡猾的方法来“与共产主义作斗争”。例如，当时由于在世界工人运动中的分裂政策遭到破产而老羞成怒的劳联的头子們，要求用美国式的方法，即采用在暴徒匪帮广泛参加下的法庭—警察恐怖手段，以暴力来鎮压欧洲的进步力量。

这个似乎是“自由的”工会联合会在1953年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暴露了內部的矛盾。英国铁路工人工会的机关刊物“铁路評論”在論述美国工会領袖对英国工会大会領導人的攻击时写道，美国代表們在代表大会上抨击英国工会大会总書記文森·陶遜为“海盜”。結果陶遜被迫撤消了自己作为自由工会联合会主席职务的候选人的資格。产联和劳联的机关刊物写道，陶遜沒有被选为“联合会”主席，是因为“他对待共产主义采取过于寬容的政策所致”。

当然，美英兩國帝国主义者的最高庇护人用尽一切办法来制止华尔街工会走卒中間的类似的家庭丑剧。但是，問題并不因此有所改变。美国工会上層的反动分子正处在他們的罪惡和卑鄙的“对外政策”徹底破产的前夜，他們無論用什么方法——無論是奸狡的，無論是粗暴的，無論是英国式的，無論是美国式的，都不能挽救这种政策的徹底破产。米尼和路德这一政策，正像美国壟断組織和战争挑撥者陣营中他們的資本主义“主子”的計劃和陰謀注定要破产一样，也是注定要破产的。

第五章

美国进步力量反对壟断組織、爭取工人 团結和爭取和平的斗争

进步力量的增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后的整个时期中，美国社会和政治發展的特点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断急剧尖锐化。这一斗争——反对壟断掠夺者、反对降低群众生活水平、捍衛人民的民主权利和爭取和平——对于美国工人来说，是不得不在極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

阶级敌人拥有大量的财力物力并依靠着强有力的組織。他們是不擇手段的。对工人运动采取肆無忌憚的恐怖手段，从来就是美国社会关系的特点，不过，这种恐怖手段現在在美国日益加紧法西斯化的条件下更具有特別广泛的規模和特別殘酷的形式。

工人阶级不仅必須战胜由于壟断組織拥有大量物質資源所引起的种种困难，不仅必須战胜来自資本主义托拉斯及其国家方面的暴力和恐怖手段，它还必須对资产阶级的腐朽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作斗争，资产阶级是依靠“工人貴族”和工会官僚并拥有騙人的报刊、無線电、电影以及其他不断腐蝕人們意識的工具这种龐大宣傳机器来散播其思想影响的。

美國亿万富翁及其卑鄙的僕从們——反动的工会領袖，在几十年內企圖以怀疑和不信任的毒藥来毒害美国工人階級的意識，阻撓工人階級自覺地成为美国社会中一支独立的有組織的力量。这些企圖已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即比西欧大多数資本主义国家中統治階級的类似努力产生了更显著得多的效果。美国工人階級在思想上和組織上較西欧工人运动相当落后的原因就在这里。

但是，美国無产階級階級自決的过程正在一往直前，而它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提高，也和对自己队伍的組織性、統一和團結的向往一样，是無庸置疑的。美国共产党不顧巨大的困难、国家的法西斯化和猖狂的法庭—警察恐怖，在对工人階級的政治教育方面勇敢地进行着自己的活动，給工人階級在反对壟斷組織的进攻、爭取工人統一和和平的斗争中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进步工会坚决地捍衛着工人的利益，因而它們的斗争更具有重大的意义，反动的領袖所领导的工会的队伍里进步的傾向正在日益發展。業已破产的农民群众都逐漸行动起来，奋起反对壟斷組織的政策。这为在美国开展爭取和平的群众性的斗争創造了最为有利的条件。

大規模的罢工是“美国生活方式”的特点

美国無产階級的階級自覺是在对老板—資本家的頑强的日常斗争中、首先是在大規模的罢工进程中發展起来的。大規模的罢工乃是“美国生活方式”的最大的特点之一。越来越加頑强而又有組織的罢工斗争，鮮明地貫穿着美国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里，美国罢工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闊規模。整个战后时

期，有案可稽的国内罢工人數每年就不下二百万人。从1945年中期到1953年底这段时期中平均每年罢工人數达二百八十万人，而1917—1922年平均每年則为一百八十万人。这五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間整个时期中还是罢工斗争最高漲的时期。

还必须指出1917—1922年和1945—1953年这两个时期罢工运动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結果。在这两个时期，工人阶级都奋起反击了资本主义壟断組織的無耻进攻。但是，在1917—1922年，壟断組織却得以击潰工人阶级的反抗，得以直接地大大降低工資定額，并使工会遭到严重的打击。工会中有組織的工人总数从1920年的四百万减少到1933年的二百万。与此相反，壟断組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并没有能够直接降低工資定額（虽然实际工資已因通貨膨脹和捐稅增加而減低）。壟断組織一再企圖在1945—1953年的罢工战斗进程中取消大的工会：美国西海岸碼頭工人工会（1948年），鋼鐵工人工会（1946、1949和1952年），联合矿工工会（1949—1950年）等等，都同样沒有成功。正如这些年的事件所表明的，美国工会扩大了自己的人數并在一些具有决定性的工業部門扎下根基，現在它們已拥有充分的潜在力量来反击壟断組織的掠夺性的进攻。

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后，在1945—1946年，罢工运动的浪潮立即在美国大大高漲起来。当时壟断組織战后第一次进攻在頑强的罢工战斗进程中被击退了。最近两年来，軍事—通貨膨脹的“景气”、塔夫脫—哈特萊法和馬歇尔計劃，降低了罢工运动發展的水平，虽然它仍旧比战前时期平均水平高得多。但是，在1948年底出現的經濟危机以及后来美国帝国主义对朝鮮的侵略，引起了美国罢工斗争的新

高漲。从侵朝冒險行动开始到1953年底，罢工者总数已超过九百万人，而在1952年（这一时期中罢工浪潮最高漲的一年），甚至根据官方的材料已达三百五十万人。

虽然，这一时期和1945—1953年整个时期中的罢工，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帶有經濟性質，但它們的政治意义也是無可爭辯的。

不管罢工者本身要求的意圖和性質怎样，他們的斗争都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根本原則的。正如1953年美国共产党全国代表會議所着重指出的：“經濟斗争是目前时期中爭取和平斗争的最直接而又最重要的方面，因为它是反对战争經濟影响工人生活水平的斗争。”美国千百万工人以自己的罢工行动明确地表示：他們决不願意为軍备竞赛和靠軍备大發橫財的亿万富翁的最大限度利潤承担牺牲。美国千百万工人起而反对“冻结”工資定額的强盜制度。在物价高漲的条件下意味着实际工資不断降低的“冻结”工資定額的制度，以及稅賦的暴增，乃是美国帝国主义战争計劃的撥款的最重要的源泉。在1951—1952年，矿工、鋼鐵工人、鐵路員工以及其他許多生产部門的工人都給予这个制度以一系列的打击，并在頑强的罢工斗争中把工資定額提高到超过政府所規定的最高限度。因此，美国壟断集团便在1953年初着手修訂关于国家“調整”和“冻结”工資的办法。它們打算不仅阻止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力求用別的手段、主要是通过利用日益增長的失業現象和反对工会与罢工运动的新的殘暴的立法措施，来进一步降低群众的生活水平。

美国罢工斗争的規模和范围以及在对朝鮮进行冒險的最初几个月中罢工斗争的高漲，令人信服地說明，統治集团

是不能以沙文主义和战争狂热的毒藥来毒害大多数美国工人的意識的。假“爱国主义”的口号、“战争必要”的借口和“紧急状态”，显然都不能影响正在罢工的工人。美国無产阶级的罢工发动証明，美国有不少一部分工人阶级已經認識到对朝鮮人民发动的战争的非正义性，証明美国工人群众越来越具有坚决反对华尔街正在准备的那种規模更大的战争的情緒。

一切大罢工、首先是1952年冶金工人的罢工都說明了这一点。罢工的鋼鉄工人拒絕复工，即使是供应美国武装力量的某些企业也是这样，这就确鑿地表明了美国劳动居民已理解到在朝鮮冒險的强盜性的战争是与他們的利益完全背道而馳的。1952年和1953年的罢工战斗，無疑問地表明了美国工人群众中这种情緒的增長。

战后时期的罢工証明了美国工人阶级日益增長的積極性、工人阶级組織的意义和工人阶级队伍統一的重要性。在1945—1953年的整个时期中，企业主完全沒有击破过任何一次大罢工。每次罢工或以罢工者的胜利，或以罢工者的要求得到部分滿足（最通常的情况是如此）而結束，或最低限度以保持罢工前所存在的那种工資定額和劳动条件而結束。并且，即使对工人說来是不順利的罢工，通常也沒有削弱他們的工会組織。統治集团曾不止一次地企圖动用塔夫脫—哈特萊法来反对大罢工，但都沒有得到它們所指望的那种結果。1945—1953年的大規模罢工的經驗又一次証實了反劳工的立法对于充滿斗争意志的千千万万工人团结一致的对抗是無能为力的。

在罢工者結成統一战綫、而工人阶级的敌人不能分散罢工者的力量和使工人队伍互相隔离的情况下，企业主遭

斗争失败。美国工人从这里得出了必要的结论。在罢工战斗的火焰里，美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日益提高，阶级团结的精神日益加强。工人（尽管他们的工会会籍不同）的团结过程，席卷着越来越广泛的劳动群众，战胜着反动的工会领袖的反抗。像1951年有色冶金业和1952年石油工业中有些经常相互竞争的工会的会员协同一致的罢工、这些不同工会所提出的共同要求和它们在斗争过程中所建立的有组织的联系这样一些事实，都清楚地说明争取工人阶级自下而上行动一致的运动的成就。

一系列的罢工的进程和结果表明反动的工会领袖——工人运动的分裂者和破坏者——使工人阶级遭到多么巨大的损害，同时也暴露了这些领袖的政策严重失败以及他们同工会中有组织的工人群众之间的对抗性的尖锐化。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的领袖们，从美国帝国主义对朝鲜冒险的最初几天起，便直接或间接地答应杜鲁门总统不准罢工和竭尽最大努力来完成自己所承担的这项任务。可以回想一下，钢铁工人工会的领导集团1952年力图阻挠钢铁工厂中的罢工所表现的努力、顽强性和坚决性。但是，反动的工会领袖们既未能破坏罢工运动，也未能阻止罢工运动的发展和高涨。

准备和要求对垄断组织作斗争的工人群众或是使工会领导集团服从自己（1950年的矿工总罢工），或是战胜工会领导集团的反抗，以强力迫使工会领袖接受他们的意志（1949年和1952年冶金工业中的总罢工）。美国东海岸码头工人在1948年、1951年和1953年的历次罢工，铁路员工在1950—1951年不止一次的罢工，电气工人——加莱的公司“工会”的会员——的罢工等等，实际上都是直接反对工会

領導集團及其反動的、反勞工的政策發動。美國群眾性的罷工運動必然破壞勞聯和產聯的領袖們的威信和影響，從而提高工人運動的進步力量的威信和影響。

在戰鬥崗位上的美國共產黨

美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偉大思想在美國勞動群眾中的傳播者。正如黨章所論述的，共產黨“是以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為基礎的美國工人階級的政黨”。黨章中說道：“共產黨為爭取工人、農民和所有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的根本的切身利益，為反對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而鬥爭。”共產黨從它在1919年成立的時刻起，就不顧巨大的困難和殘酷的法庭—警察恐怖，勇敢而堅決地捍衛着勞動居民的切身利益。

共產黨人始終一貫地積極參與解決擺在美國工人運動面前的最重要的問題，力求在這方面作出在最大程度上符合鞏固和平民主陣營的要求的決議。美國共產黨人為反對美國參加反蘇武裝干涉、爭取承認蘇聯并同蘇聯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而進行了鬥爭。他們為美國工人階級的統一、為根據產業原則改組工會運動進行了鬥爭。他們在三十年代爭取在美國工業主要部門建立群眾性的產業工會的鬥爭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共產黨人是爭取在美國實行國家社會保險的運動的倡導者。他們始終反對種族歧視和民族歧視，忘我地捍衛着黑人的平等、人權和公民權利。在所有這些問題上，他們始終使無產階級的真正利益同右翼社會黨人和反動的工會領袖的背叛政策相對立起來。他們的功績就在於徹底而無情地揭穿了這些領袖是資本主義壟斷組織在工人階級隊伍中的代理人。

美国共产党也积极地参加了反对国际舞台上的反动势力的斗争。它积极地反对法西斯轴心国家——德国、意大利、日本——奴役人类的企图。美国共产党人在美国成立以林肯命名的国际志愿队中起了主导作用。国际志愿队曾于1936—1939年在西班牙对希特勒的走卒佛朗哥和德—意干涉者的武装匪帮作战。国际志愿队的许多战士和指挥官都是美国共产党党员。在1952年被借口“煽动叛乱”而判处五年徒刑的宾夕法尼亚州美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史迪夫·奈尔逊，就是曾在西班牙作过战的志愿队的指挥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一万五千名美国共产党员曾为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武装部队、捍卫欧洲和亚洲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而战斗。

美国共产党在这几年里遭到曾是党的领导人之一艾尔·白劳德的背叛行动所引起的严重的内部危机。白劳德甚至颂扬美国资本主义，并企图把党推向灭亡的道路。始终为自己队伍的纯洁性和思想统一而进行坚决斗争、始终顽强地反对自身中间一切与无产阶级背道而驰的派别的共产党，击溃了白劳德分子，胜利地克服了内部危机。1945年7月，美国共产党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恢复共产党的决议，并选出以威廉·福斯特为首的共产党全国委员会。

威廉·福斯特的一生是和美国工人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从十二岁起就积极参加美国工人阶级反对垄断组织的斗争。威廉·福斯特是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在把阶级敌人的代理人清洗出党的队伍的斗争中、在同白劳德分子作斗争和恢复党的工作中起了显著的作用。福斯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坚定

的信徒、杰出的組織者、政論家和关于工人运动問題的一系列著作的作者——在美国工人階級的斗争事業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福斯特的著作、共产党其他領導者和活动分子的言論、党的定期刊物——首先是存在三十年之久的“工人日报”，不断地揭露美国資本主义“例外論”和所謂“美国生活方式”的有害的謊話。它們揭露美国帝国主义的深刻的反动本質、独霸世界的侵略計劃，以及为了壟斷資本的最大限度利潤而使美国法西斯化和加紧掠夺劳动者的政策。共产党在捍衛着和平。它反对“杜魯門主义”和馬歇尔的奴役性計劃。它反对北大西洋侵略集团、反对在西德建立由希特勒的將軍們統率的复仇主义者的軍隊和复活日本軍国主义。它为停止对朝鮮人民的强盜性战争进行了頑强的斗争。它要求在朝鮮建立持久的和平，要求各大国之間用協商的办法来消除国际緊張局势，要求禁止原子彈和氫彈，要求裁減軍备、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友好。

共产党向工人群众揭露压迫着他們的資本主义制度的惡毒的机械論，并指明工会的領袖一叛徒的卑鄙作用，这些宣傳活动和政治活动在美国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在美国，报纸、無線电、电影、电视、文学、艺术和教会，几乎全部掌握在壟斷組織手中，变成了制造謊言的龐大的康采恩。因此，美国共产党的宣傳工具很有限。但是它的言論的意义却是很巨大的。在共产党人的言論中可以听到美国的真正呼声，知道人民群众的真实願望；在共产党人的言論中可以听到美国無产階級先鋒队預告群众关于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威胁的呼声。正如美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決議所着重指出的，“只有美国的普通人民、首先是工人階級才能

改变国家所遵循的方针，才能使它免于灾难。”

美国垄断资本的主要集团企图使国家的历史发展开倒车，取消全国人民群众在十九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所取得的那些起码的资产阶级民主权利，正把美国推向灾难的道路。因此，如果说过去美国无产阶级面前没有任何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巨大的全民族的民主主义任务，那末在现时美国工人阶级和它的共产主义先锋队正面临着这样的任务。美国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是国内唯一能够高举起已被资产阶级抛弃在一边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旗帜的力量。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才能阻止那些企图使历史开倒车的人。动员群众捍卫他们的社会经济权利和民主权利、特别是工会权利去反对警察专横制度和已抬头的法西斯主义，也和反对战争威胁一样，今天在美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占据主要地位。

1954年3月初，共产党的领导公布了新的党纲草案“美国走向就业、和平和民主的道路”。这个文件提出击破麦卡锡主义是“今天的主要任务”。党纲草案着重指出，为了解决这一任务并堵塞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必须使一切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力量团结一致……为了建立这种民主团结并且使之及时地建立起来，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应当担负主要责任”。①

美国共产党现时也正在为争取这种民主团结而斗争。共产党的活动及其为反对垄断资本、反对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的忘我斗争，使共产党人的口号和要求在人民中间深受欢迎。现实生活处处说明共产党

① 见1951年3月7日美国“工人日报”。

人从劳动者利益的观点出發的口号是正确的，他們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美国統治集团認为“共产主义的危險”的来源也就在这里。

美国壟断集团極端不安地注視着虽不算大但是勇敢坚强的、显示出巨大生命力的共产党的影响的增長。美国资产階級依靠奸細白劳德及和他相类似的叛徒們从內部来破坏共产党的企圖遭到失敗以后，它們又企圖用卑鄙的誹謗和凶暴的恐怖的办法来扼杀共产党。壟断組織利用强大的宣傳机器在全国居民的面前污蔑共产党。史密斯法和麦卡倫法主要就是对付共产党的。

1954年8月，美国国会兩院通过了禁止共产党活动的法案。法案剝夺共产党的政党的法权，并要求它的党员按照1950年通过的麦卡倫法向司法部登記，即把他們置于公开的警察監視之下。8月19日通过的这项法案，借口“共产党员滲进”工会而剝夺了进步工会代表它們的有組織的工人的权利。

这种对人民的民主权利的进一步的襲击乃是美国在法西斯化道路上的新步驟。但是，也和过去一样，它并不能摧毁美国工人階級及其进步組織的队伍的坚强的斗争意志。紐約共产党組織主席杰尔遜曾着重指出：“共产党將繼續为自己的法权和有組織的工人的权利而斗争。”

美国自从1949年以来，根据史密斯法共逮捕了一百十五名共产党的积极活动家。在国内接二连三地制造了对共产党领导工作人員的审讯。

但是，美国反动派这种逞凶的污蔑的进攻并没有、也不能产生如它的鼓舞者和組織者所指望的那些結果。仿效希特勒德国萊比錫审讯案而导演的对共产党人的审讯，当然

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审讯。实际上这是私刑，是垄断资本对工人阶级先进代表的阶级迫害行为。但是类似的迫害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从工人运动的队伍中取缔它的最忠诚的战士和把他们关进铁栏。反共产主义的审讯恐怖的鼓舞者指望从精神上来摧毁共产党的领导活动家，并在国内广大居民群众面前污蔑他们。然而，这一点他们过去做不到，现在做不到，而且将来也做不到。

恐吓坐在被告席上的共产党人的企图并没有成功。共产党人在阶级敌人的法庭前保持着镇静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气概。在他们的供词、发言和最后谈话中，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对自己事业的正义性、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思想的胜利的信心。例如，1953年2月初在纽约审讯时被判刑的美国工人运动的宿将爱里查贝特·盖里·福林说道：“当你们把我们投进监狱的时候，和平、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并不会消亡。”另一位被告皮蒂斯·佩里说道：“你们无论用什么审讯的办法也不能消灭共产党。共产党在美国人民中间有着深厚的根基。”

共产党人利用审讯案向劳动群众揭露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及其使美国法西斯化的政策、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最后残余的消灭和对国内一切进步力量的镇压。皮蒂斯·佩里在法庭上指出垄断组织正把美国推向战争。

佩里说道：“我们之所以被列于被告席，是因为我们党竭尽全力去帮助人民意识到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是因为我们党始终为着争取强大的、团结一致的工会运动而斗争。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我们党证明了它是争取黑人权利的战士。我们因为我们党是个社会主义政党而受到审讯。”

被告共产党人的勇敢行为、他們在法庭面前的大胆辯論在國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共产党对由于史密斯法而来的多次审讯迫害所进行的斗争，是党在捍衛美国人民民主自由的活动的历史上光荣的篇章。1953年美国共产党全国代表會議曾經確認：“这种斗争將作为最大事件之一載入美国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史册。”这种反对战争威胁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的政治意义和作用日益（虽然是緩慢地和逐漸地）为越来越多的美国广大人民群众所了解。值得注意的是，1951年底以前产联上層分子对于史密斯法还保持緘默，而劳联上層分子甚至已表示贊同，但从1952年起情况有了一些变化。在1952年和1953年期間，产联所屬各个工会的一系列代表大会曾經通过了要求廢除史密斯法的決議。1953年底，無論是产联的代表大会，或是劳联的代表大会，都不得不在它們的決議中反映出群众因在美国經常有侵犯起碼的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現象而产生的日益增長的不安情緒。

共产党反对亿万富翁掠夺劳动者、維護和平事業、高举已遭壟断者踐踏的民主自由旗帜的活动，是符合美国人民的期望、迫切需要和根本利益的。共产党总書記尤金·丹尼斯充滿热情的文章的字里行間蘊含着对美国工人階級、对共产主义先鋒队的坚定不移的信念：

“尽管遭到迫害和暂时失利，我們一定要建立一个起作用的、經受鍛煉的、有信心的共产党。共产党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針为依据，引导美国人民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保障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向新的战斗和新的胜利迈进。”^①

进步的工会

美国工会会员总数现在大约达到一千六百万，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则为一千零五十万。这些数字对于美国来说是决不算大的。根据1953年的材料，在美国，已组织在工会里的不过全部雇佣劳动者的三分之一。但是，工会队伍的增長速度是惊人的和十分有代表性的。美国工会运动数量上的增長，意味着“工人贵族”上层代表人物在有组织的劳动者中间的比重不断下降。

这个过程还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中就已经发展起来。在1920年包括工长在内的熟练工人占工作者总数的百分之十三点五，在1930年占百分之十二点九，而在1940年则只占百分之十一点七了。这些“工人贵族”的代表在工会群众中间的比重的下降还更大些，因为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中组织在工会里的工人总数已增加了一倍半。这一过程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地加快了。虽然在战争年代里反动的工会官僚在美国也有一定程度的加强，但是它的社会基础——“工人贵族”——却相继失去先前那样的稳固，而进步力量的社会基础则相应地扩大和加强起来。

把美国工业主要的、已被垄断的部门中的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基本群众联合到工会里来这一事实本身，特别是在最大企业中工人高度集中的条件下，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威廉·福斯特指出，这些大工业部门中的工会组织已成为美国工人运动的巨大潜在力量的源泉。这些部门

① 見1950年2月22日美国“工人日报”。

中的大的产业工会实际上已为美国群众性的工会运动奠定了基础，并第一次为国内工会运动中进步力量的增长和发展保证了必要的支柱。

曾经组成产业工会联合会左翼并在1949—1950年被产联开除出来的一批工会，是美国工人运动的巨大的进步力量。

这些工会中最大的一个工会是1936年建立起来的联合电气、无线电和机器工人工会（简称联合电气工人工会——译者）。联合电气工人工会在被从产联开除，接着又遭到以加莱为首的反动的工会领袖进行分裂活动（他们在电气公司的支持下成立了自己私人的、实质上是公司的工会）以后，根据最近的材料，共有会员三十万人以上。

在1898年建立起来的美国最老的工会之一——国际开采冶炼工人工会在进步的工会中占着重要地位。这个工会是六十年以前建立起来的，当时名为西部开采工人联合会，它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激烈的罢工战斗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国际开采冶炼工人工会的机关刊物“联合”杂志的编辑霍姆格林写道：“这个工会的会员是还保持着由他们祖辈在西部开采工人联合会中所树立的早先的光荣传统的战斗部队。”根据1953年的材料，这个工会约有十万会员。

1934年在旧金山汹涌澎湃的总罢工（这次总罢工是美国工人运动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中产生的战斗的、进步的西海岸码头和仓库工人工会在美国享有盛名。根据1953年的材料，这个工会共有七万会员。工会主席哈里·布里治——全国最著名的进步的工会活动家之一，引起美国资产阶级和反动的工会领袖仇恨的、太平洋海岸和夏威夷

夷群島上許多次頑強而又始終不可被戰勝的罷工的領導人——在美國工人中間有很大的聲望。

國際毛皮工人工會在美國進步的工會運動中占著顯著的地位。它成立於1913年，並以積極參加這一時期以及二十年代許多次戰鬥的罷工而著名。國際毛皮工人工會在美國勞工聯合會內的時候，是最先反對勞聯的反動政策的工會之一，它在1936年以前，始終頑強而不斷地為反對這一政策而鬥爭。1936年，它被勞聯開除以後，即積極參加籌組產聯。根據最近的材料，這個工會共有會員十萬人。

在其餘的進步工會中，必須指出全國海船廚師侍者工會。這個工會是美國最老的工會之一，它同西海岸碼頭和倉庫工人工會有密切聯繫，很早就積極參加了美國太平洋港口的海上運輸工人的一切戰鬥發動。工會主席海尤·布萊遜也和哈里·布里治一樣，是國內最著名的進步的工會活動家。哈里·布里治和保羅·羅伯遜是這個工會的名譽會員。

進步工會在自己的活動、組織工作和其他工作中，始終體現著三十年代中期強大的群眾運動所提出的、奠定了產聯基礎的那些原則。它們拒絕“階級合作”的政策，為反對剝削者、反對國家的法西斯化和華爾街的對外侵略政策的冒險行動進行了鬥爭。它們勇敢地捍衛著組織在工會里的工人和全體勞動者的真正利益。

在勞聯和產聯所聯合的工會里，民主、領導人的選舉和他們對普通會員群眾應盡的責任只是徒具形式，而在進步的工會里，它們章程上的這些原則實際上是作為它們內部生活的確定不移的法律來實現的。在勞聯和產聯的代表大會上工會官僚代表占優勢，而在進步工會的代表大會上普通會員的代表却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參加這些工會的代

大会的代表是在工厂、矿山和矿井里用秘密投票直接选举出来的。他們可以自由地批評領導，提出自己的建議，擬定捍衛勞動者利益的共同行動的綱領。

在反動分子所領導的勞聯和產聯以及鐵路工人工會里，黑人照例遭到歧視，而在進步的工會里却是另一種情況。例如，1951年秋國際開采冶煉工人工會司庫特拉維斯寫道：“我們的工會有權因它在組織工人——黑人和墨西哥人，保證他們有（與其他的工人——作者）平等的工資和較好的勞動條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完全可以理解，如果說整個美國工人運動的特點是工會領導人和組織在工會里的工人羣眾之間的鴻溝日益加深，那末，進步工會的特點，就在於領導人和組織在工會里的工人之間的內部團結一致，就在於這些工會的領導人真正捍衛他們的會員的利益。

在進步工會的一切最重要的行動中，表現出民主精神、對勞動者利益的保護和對這種利益的清醒的考慮。

在馬歇爾計劃出現以後的最初幾個月里，資本主義的宣傳對壟斷組織的這一計劃大肆贊揚以迷惑居民的耳目，勞聯領導集團和產聯領導集團中的反動分子偽善地向工人們解釋說，馬歇爾計劃是擺脫失業現象的可靠的方法，進步的工會則勇敢地起而反對這一計劃。進步的工會從一開始就對作為壓迫無產階級的工具和作為美國億萬富翁對外政治擴張和侵略的綱領的所謂“援助”歐洲計劃，做了清醒而又正確的估計。

1948年1月，進步工會的代表們在產聯執行委員會會議上反對贊同馬歇爾計劃的決議。

當1949年初產聯執行委員會因反動分子的投票通過了

关于退出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決議的时候，西海岸碼頭工人工会、联合电气工人工会、国际开采冶炼工人工会和国际毛皮工人工会，也和其他的进步工会一样，都立即以激烈的抗議来反对这种分裂行动。1949年4月侵略性的北大西洋公約締結的时候，所有的进步工会都譴責了这个公約。国际毛皮工人工会主席本·哥尔德在严厉批評与該公約有关的、力求夺取世界霸权的美国壟断組織的險惡陰謀的时候，在他所發表的文章中写道，美国人民希望和平并将为和平而斗争。

也是在1949年春，产联左翼的代表、进步的食品工人工会主席同美国其他的工会活动家一起积极参加了巴黎第一届世界保衛和平大会。他向大会代表保証說，他們“用不着替領導着人民的美国工人階級害羞，普通美国人都不願战争，尤其是不願对苏联作战”。1949年10月，在进步工会的积极参加下，于芝加哥召开了全美工会保衛和平會議，并設立了一个也叫做“工会保衛和平會議”的常設機構。

此外，进步的工会坚决反对反动的工会領袖企圖鎮压罢工运动、反对他們越来越經常地拒絕工人提高工資的要求。进步的工会并不仅仅积极地領導着自己會員的战斗的罢工运动。进步的工会在1949—1950年矿工長期罢工斗争时期，在給矿工組織粮食和其他援助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它們对于1950年克萊斯勒汽車工厂中罢工的九万工人同样也組織了援助。1949年中期，在華盛頓举行了由产联左翼召集的关于組織群众运动爭取廢止法西斯的塔夫脫—哈特萊法的代表會議。代表會議在其決議中主張有必要把群众的發动、特別是群众的罢工發动，同反动的工会領袖千方百計地阻撓动員工人为廢止塔夫脫—哈特萊法而坚决斗争的

怠工行为相对立。

左翼的积极活动使产联的反动领袖及其资本主义的主子深感不安。经济危机日益逼近，罢工运动的浪潮越来越高，资产阶级根据马歇尔计划所采取的思想破坏活动显然不能达到反动阵营的头子们所寄予的希望。在这些情况下，进步工会（在产联中占相当大的部分并在产联领导集团中有自己的代表）的战斗发动，被美国统治集团视为特别危险。

在壟断集团的直接影响和领导下，产联的反动头子们急剧加紧对产业工会联合会左翼代表的猛烈的攻讦和残酷的迫害，力图迫使他们放弃反抗产联执行委员会的反动政策。1949年5月，执行委员会以反动分子的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对那些不同意它的决定的领导成员给予撤职处分。问题还不限于决议，布里治被解除了加利福尼亚州产联地方组织领导者的职务。在1949年底产联的年会上，对进步力量的迫害达到极点。在这次年会上，反动的工会领袖力求通过这样一种对产联章程的“修正案”，即允许执行委员会可以根据“它们的政策和活动是经常实现共产党或其他组织的纲领和任务，而不是实现产业工会联合会章程所规定的目标”这个借口，把任何一个工会活动家和任何一个工会从工会联合组织中开除出去。这样一来，就为把进步工会从产联中开除出去准备了“法律”根据。立即动手的开除本身，是用对加入左翼的工会组织特别“审讯”的手段来进行的，并且“审讯”是按照纽约对共产党领袖的审判方式来导演的。

联邦调查局的奸细、警察局的偵探和其他的工会伪证人，成群地来到由最無可救藥的反动分子组成的产联执行委员会所组织的审判委员会，借助“物证”——剪报——企

圖證明“被告”工會的主張和共產黨的主張之間有共同之點。對“被告”工會提出了荒謬絕倫的“控告”，例如，說它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要求開辟反對希特勒的第二戰場，或者干脆說它們有某種“可疑的秘密意圖”。這種以煽起反共產主義歇斯底里為目的而提出的“控告”，只不過掩蓋了迫害進步工會的真實原因。按照莫萊的“權威性的”解釋，進步工會的過錯在於它們曾反對杜魯門政策！進步的工會為反對馬歇爾計劃、侵略性的北大西洋公約進行過鬥爭，而它們竟為此被開除了。

在1949年和1950年期間，下列幾個代表產聯左翼的工會被從產聯中開除出去：聯合電氣工人工會、農業機器製造工人工會（這個工會於1949年併入電氣工人工會）、國際開採冶煉工人工會、美國西海岸碼頭工人工會、漁業工人工會（這個工會於1949年加入西海岸碼頭工人工會）、海船廚師工會、國際毛皮工人工會、食品和煙草工人工會、美國電訊工人工會、職員工會、聯合公務人員工會。

壟斷集團對於開除這些工會表示滿意。反動的報刊因分裂分子對工人階級的統一所犯的卑鄙的罪行而大肆慶祝。它們贊揚產聯的領袖是“英明的”工會活動家和國務活動家。華爾街的統治集團及其在美國兩個工會中心的領導集團中的走卒們，指望被產聯開除的一些工會都很快由於它們被開除，和由於從反動的工會領袖營壘中派遣到這些工會隊伍里的“第五縱隊”的破壞活動而成為內部分裂的犧牲者。反動的工會領袖們也同樣指望被產聯開除的進步工會在國內日益加強的法庭—警察恐怖的情況下不能堅持下去。但是這些打算落空了。

產聯的分裂分子並沒有達到他們所預期的結果。進步

的工会在法庭—警察恐怖的情况下已經坚持下来。它們并没有成为内部分裂的牺牲者，而保持了对进步方針的忠誠。

例如，1949年召开的全国海船厨师侍者工会代表大会的決議中說道：“全国海船厨师侍者工会自豪地宣布自己屬於左翼的工会。”決議指出，工会所取得的提高自己会員工資的成就，是由于反对企業主、塔夫脫—哈特萊法、战争准备、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約的斗争而获得的。決議还談到工会要努力繼續爭取和平、爭取加强同世界工会联合会的联系的坚强意願。国际毛皮工人工会、西海岸碼頭工人工会和其他的进步工会也發表了类似的宣言。

反动的工会領袖們用加强反产联左翼运动的办法来对付这些工会，力圖用一切手段来瓦解进步的工会。他們在这方面日益广泛地开展了所謂“侵襲”运动。

在美国，强迫一个工会的地方分会（通常联合着一个企業或一批企業的工人）合并到另一个工会的企圖称为“侵襲”。这里惯用的方法是收买領袖人、威胁、盛感性的宣傳和利用雇傭的暴徒惡棍以所謂“組織者”的名义大肆活动。当产联还在奉行进步政策的时候，它几乎沒有这类的活动，参加产联的工会之間一般也沒有相互竞争。但是从1946年起，由反动分子所領導的产联的工会就开始日益經常地“侵襲”参加同一工会联合組織的进步工会。塔夫脫—哈特萊法頒布以后，反动的領袖們一方面不厭其煩地重复說，好像他們是这个法律的敌人，一方面却乐意利用它来扩大对产联左翼进攻的战綫。

塔夫脫—哈特萊法規定：“如果某一企業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工人声明对代表他們同企業当局簽訂集体合同的工会的政策不滿，那末，劳工关系局就有責任在这个企業的工

人中間進行選舉，即投票決定到底由哪一個工會（原先那個工會或另一個工會以及任何別的工會）來代表他們。這條規定乍看起來似乎是民主的。但是，事實上它卻為剝奪進步工會代表最重要企業的工人的權利保證了“法律”根據。剝奪進步工會代表最重要企業工人的權利，從而也就意味著把它們聯合的這些企業的工人（即它們的基本會員群眾）的最重要的地方分會，強制地并入由反動分子所領導的其他工會。勞聯和產聯的上層分子中塔夫脫—哈特萊法的“根本”反對者抓住不放的正是這種機會。

依靠企業主的壓力、利用形形色色的工賊分子、恫嚇、收買、欺騙甚至干脆捏造，使得百分之三十的工人在投票請願書上簽了名。選舉——投票本身通常也是用這類方法籌備起來的。這種選舉在最近幾年來也已經成為反動陣營中進攻進步工會的“侵襲”活動的參加者的主要戰場。

通常，為了支持“侵襲”活動，勞工關係局把投票定於對進步工會是特別困難的時刻：當工會正因同本企業管理當局進行關於重訂集體合同談判的時候，更經常的是因為企業主對談判怠工，工會正在準備罷工或已經進行罷工鬥爭的時候。接近投票日期時，在企業內將要進行投票的地点布滿了由反動的工會領袖所雇用的大批“組織者”。他們在那裡製造恐怖氣氛，故意挑起流血衝突，以便製造對進步活動家進行警察干涉和迫害的借口。“組織者”還依靠反對進步力量的猖狂的誹謗運動、依靠頌揚馬歇爾計劃的宣傳以及沙文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宣傳，力圖為企業主準備所需要的投票結果。

例如，正像進步的國際開採冶煉工人工會主席克拉克所指出的，1948—1949年鋼鐵工人工會的反動的領導集團

为“侵襲”倍色默(亞拉巴馬州)开采工人工会地方分会而招募的以姓卓納里奇的人为首的“組織者”匪帮，“在最激烈的种族主义分子的全力支持下”横行霸道。他們“动用了武器、炸藥、刀子和磚塊，并施予肉体上的暴行和威胁”。在1949年卓納里奇匪帮对倍色默开采工人工会地方分会的一次襲击中，該工会司庫特拉維斯受了重伤并成为殘廢。他的双眼失明了。

但是，無論是恐怖手段，無論是扣上“紅帽子”，無論是种族主义的口号，無論是馬歇尔計劃以及企業主和政权的支持，都不能保證“侵襲”的鼓舞者和組織者获得所期望的成就。开采工人工会执行委员会在1950年中期确定說：“我們工会所有大的分会仍旧留在我們的队伍里。”产联各个工会的反动的领导人仅仅对一个进步的联合电气工人工会在1948—1949年內就組織了四百五十六次“侵襲”；其中有四百一十八次完全失敗了。身为汽車工人工会主席的路德在好多年內都力圖把进步的农业机器制造工人工会排挤出“国际收割机公司”托拉斯——这一生产部門中的主要托拉斯——的企業。但是，他的試圖并没有什么成效，于是1949年底产联执行委员会認為有必要去帮助路德。产联执行委员会最后通牒式地要求农业机器制造工人工会并入汽車工人工会，但是仍旧遭到坚决的反击。西海岸碼頭工人工会在1951年初發表了关于已被它們击退的来自产联所屬卡車汽車司机工会上層分子方面的十八次“侵襲”的統計材料。

1949年11月—1950年8月进步工会紛紛被开除出产联，与此同时發生的是“侵襲”运动急剧地尖銳化起来。加萊1949年12月剛与“通用电气公司”托拉斯管理当局共同建立了自己的“工会”，就从产联财务处获得了八十多万美元

来組織对进步的联合电气工人工会的“侵襲”。加萊“工会”在这次“骯髒的战争”中的总支出到1950年中期已超过一百万美元。鋼鐵工人工会执行委员会單是对进步的国际开采冶煉工人工会进行“襲击”，在1950年上半年每月就用去了二十五万美元。数百个“組織者”帶着大量的金錢像蝗虫一样向开采工人工会的地方分会扑去。

1950年中期美国在朝鮮进行侵略和战争歇斯底里籠罩着美国的时候，劳联和产联的領袖們便急忙利用这种歇斯底里来加强对进步工会的“侵襲”活动。正如国际开采冶煉工人工会主席克拉克在1950年秋所指出的，莫萊—加萊—路德集团开展了“瘋狂的运动来利用朝鮮战争作为分裂并消灭开采工人工会的手段”。反动的天主教神甫積極地支持劳联和产联的領袖。在电气工業的大中心，数百个修道士鼓动工人們支持加萊的“工会”，并宣称，工人如果投进步的联合电气工人工会的票，就是犯了重大的罪过。1950年在林納(麻薩諸塞州)“通用电气公司”的一个最大的工厂里举行投票的时候，当时的劳工部長托平在工人大会上致詞，亲自号召會議的参加者把自己的选票投“美国的工会”，即加萊的“工会”。

但是，無論是美元或是战争歇斯底里，無論是政府的直接干涉或是进步工会的困难处境(它們被从产联开除以后立刻成为法院、警察和“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大大加紧迫害的对象)，都不能保証完全实现反动派的陰謀。在那些工人們已被組織到进步工会內的企業里，工人們現在和过去都几乎始終如一地把絕大数的选票投进步的工会，并認為它們是最可信賴的代表和自己利益的捍衛者。

“侵襲”国际开采冶煉工人工会的提議者遭到了慘重的

失敗。1952年9月这个工会的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六年多来，国际开采冶炼工人工会成了“侵袭”者随时施以最残酷和最集中的打击的对象。对该工会的“侵袭”早在1946年就已开始了。从那时起，参加产联的钢铁工人工会、汽车工人工会、煤气、焦炭和化学工人工会、玻璃工人工会以及联合矿工工会和劳联许多工会的领袖们便不止一次地对国际开采冶炼工人工会进行“侵袭”。而代表大会后不到一个月，無論在美国或加拿大^①的任何地方该工会都無需对“侵袭”进行防御战了。

钢铁工人工会的反动的上层分子企图孤注一掷，以便从进步的国际开采冶炼工人工会那里夺取其在特累尔（加拿大）的地方分会。他们集中了巨额金钱和大批“组织者”。在这里，“侵袭”活动几乎继续了三年之久。但是，当1952年春最近一次投票计算结果时，“侵袭”者遭到了如此惨重的失败，以致他们的领导机构关闭了自己的办事处，并离开了城市。

反动的工会官僚对进步工会的“侵袭”所引起的斗争，在1951年最为紧张。在这一年内，开采工人工会击退了二十五次大“侵袭”。仅在1951年春夏期间，开采工人工会便在有色冶金业最重要的企业里连续取得了十四次辉煌的胜利：“侵袭”的组织者获得的选票比开采工人工会的地方分会少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

加莱的“工会”对进步的联合电气工人工会所组织的“侵袭”，大多数也同样失败了。1951年9月，进步工会在史

^① 国际开采冶炼工人工会是国际性的工会，即联合着美国和加拿大的工人的工会。

凱奈克塔德(紐約州)“通用电气公司”康采恩拥有二万工人的最大的工厂里的胜利，在反动派集团中产生極強烈的印象。在那里，根据这个工厂中已經遭受一次失敗的加萊“工会”的坚持，第二次进行了投票；一万六千七百名投票的工人中有一万一千五百人又一次坚决拥护进步的工会，虽然根据“紐約时报”的供認，加萊曾受到杜魯門政府中高級官員的強有力的支持。不久以前，进步的国际毛皮工人工会在匹波德(麻薩諸塞州)給了“侵襲”者以更加致命的打击。匹波德的美国最大制革厂的工人以百分之九十七的选票投毛皮工人工会。

1952年，“侵襲”的組織者繼續遭到重重失敗。对特累尔(上面業已提到的)和倍色默(阿拉巴馬州)开采工人工会的“侵襲”，在春天都遭到了失敗；在倍色默主宰一切的还是那个在投票前夕在城市里挑起流血激战的以卓納里奇为首的武裝流氓匪帮。同时，联合电气工人工会战胜了戴頓(俄亥俄州)和布里治頗特(康涅狄格州)的“侵襲”者；在这些地方，几年前曾被加萊“工会”霸占的地方分会又回到了进步工会的行列里。1952年10月，联合电气工人工会对伊利諾斯州、俄亥俄州、新澤西州的“通用电气公司”、“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和“国际收割机公司”最大康采恩的企業里加萊匪帮的分裂分子，在很短時間內就取得了四次巨大的胜利。

1953年爱达荷州、加利福尼亞州和新墨西哥州开采工人的工会取得了巨大胜利，联合电气工人工会打退新澤西州“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工厂中加萊“工会”的第三次进攻和蒂夫納(俄亥俄州)“通用电气公司”工厂中加萊“工会”的第二次进攻而取得了胜利。产联执行委員會的代表在加萊“工会”的代表大会上發言时不得不承認，要战胜进步的联

合电气工人工会是有“困难”的。

保衛劳动者的切身利益，爭取工人階級的統一

自从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反动的领导集团开始把进步工会开除出产联以来，快有五年了。进步工会被开除以后，它们的个别地方組織便脱离了这些工会。进步工会中最大的联合电气工人工会，由于企业主、政府和反动的工会領袖的联合进攻而遭到特別严重的損失。在反动的工会官僚看来，依靠“侵襲”，他們可以比較容易而迅速地徹底清算过去产联左翼中反对他們的人。但是，进步工会在这严重考驗的关头显示了高度的坚定性，表現了自己的生命力、战斗力和它們具有的充分广泛的社会基础。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們都能保持住自己的主要陣地。从1951年起，数千名新會員陸續加入了西海岸碼頭工人工会，联合电气工人工会、开采工人工会和国际毛皮工人工会的會員人数也都增加了。在1952年5月国际毛皮工人工会代表大会上，有八分之一的代表代表了在南部——北卡罗里納、佐治亞和佛罗利达等州建立起来的国际毛皮工人工会的新的地方分会。

“侵襲”的組織者遭到失敗，是因为进步工会在實踐中不止一次地証明自己有能力爭取到提高工資和改善劳动条件。“侵襲”的鼓舞者的失敗也同样証明了工人的階級覺悟的提高：工人們日益清楚地开始了解，支持着壟斷組織政策的反动的工会領袖背叛了他們的利益。

美国工人群众并不相信欺騙性的諾言。这种諾言起初由于馬歇尔計劃、以后由于对朝鮮人民的侵略而被美国統治集团和反动的工会領袖描述得天花乱墜，現在又由于軍备竞赛和准备对亞洲和欧洲的新的侵略冒險而盛行起来

了。允諾过的“繁荣”到来了，但这仅仅是壟斷組織的。無产階級只知道它的反面——实际工資的降低和失業現象的增長。無产階級以朝鮮戰場上成千上万的犧牲者償付了摩根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最大限度的軍事利潤。美国越来越广大的工人群众已开始意識到，华尔街的政策对于他們除了生活水平进一步降低和在壟斷組織所策划的軍事冲突中增加新的無数犧牲者而外，并不会有什么別的结果。在美国工人階級的队伍中，失望、不滿和憤怒的情緒日益增長起来。美国工人階級正在寻求摆脱愈益惡化的狀況的出路。美国工人階級正在寻求严酷的現實向它所提出的課題的答案。

进步工会的活动保證了工人在捍衛自己的切身利益的斗争中有正直的和战斗的領導。劳联和产联的領袖們都不安地注視着群众积极性的提高，企圖对罢工实行消極怠工，要求劳动者为剝削者的利益牺牲。与此相反，进步工会坚决反对这类牺牲，反对在“緊急状态”的幌子下掠夺工人，反对“冻结”工資。它們組織并領導着工人的罢工發动。这些罢工發动通常的特点是：准备周密，罢工者积极，罢工者队伍团结一致和罢工群众与工会領導之間行动一致。

进步的国际开采冶煉工人工会在1945—1951年这段时期內組織和領導了十三次大罢工，而在1952年一年內就組織和領導了八次大罢工。这个工会在1951年所組織的銅矿和煉銅工厂工人的总罢工，是反对“冻结”工資制度的一次强大的發动，并头一次給这个制度以重大的打击。持續达十五个月——从1950年底到1952年初——之久的新墨西哥州鋅矿工人的罢工，具有重大的意义。尽管企業主力圖用武力破坏这次罢工，尽管采取了猖獗的恐怖手段，大規模地逮捕和屠杀罢工者，警察和武裝工賊匪帮經常对罢工糾察

队进攻，但是罢工还是赢得了胜利。这些罢工发动表明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忠实于劳动者利益的工会领导的全部意义。

几乎任何一次都取得壟断康采恩讓步的开采工人工会的坚决的罢工发动，也带动了其他工会的会员工人起来斗争。我們已經指出，在1951年銅矿和煉鋼工厂的总罢工中，除了进步工会的会员以外，劳联工会的会员和铁路工人工会的会员也参加了。在1952年康涅狄格州煉鋼企业中爆發罢工的时候，劳联和产联的工会的会员們在进步工会的领导下又参加了这次罢工。进步的联合电气工人工会的頑强的罢工斗争，对那些被用欺騙方法誘騙加入加萊的傀儡“工会”的工人同样是一个值得仿效的范例。美国东海岸碼頭工人在1948年、1951年和1953年的大罢工，也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受了以哈里·布里治为首的进步工会所领导的西海岸碼頭工人胜利的战斗的影响。

进步工会方面的阶级团结的許多积极表现也对工人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工会对所有的正在战斗的工人，不管他們属于哪一个工会，都乐意給予支援。甚至可以指出，开采工人工会組織在1952年給了鋼鐵厂罢工工人以相当大的物質援助。产联所屬海輪机师协会于1952年在美国西海岸宣布罢工的时候，进步的碼頭工人工会会员支持罢工者，拒絕为布置了罢工糾察队的海輪服务。

进步工会对無产阶级阶级团结原則的坚定不移的忠誠及其反对剝削者的团结一致的战斗行动，对美国罢工运动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并且是为美国工人阶级的統一而斗争的重要因素。統一乃是进步工会活动的指导原則，乃是这些工会的代表1950年11月在华盛顿第一次代表會議上所

提出的綱領的基礎。

綱領規定：1. 各个进步工会之間的行动要更加密切地協調一致；2. 組織工人統一委員會以保證进步工会和由反动分子所領導的工会的基層組織采取共同行动。工人自下而上的統一，这就是担任會議主席的哈里·布里治所說的華盛頓代表會議參加者的任务。

可以指出，在执行这一綱領方面已獲得許多重大成就。还在參加产联左翼的工会被开除出产联的前夕，有兩個不大的进步工会与較强大的进步工会，即按生产性質和它們相近的工会联合起来了：農業机器制造工人工会加入了联合电气、無綫电和机器工人工会（正如已指出的，該工会事先拒絕了产联执行委員會关于与路德的工会合并的最后通牒式的要求），而漁業工人工会和生产性質相近的工人工会并入了西海岸碼頭和倉庫工人工会。

1952年9月，即在国际开采冶煉工人工会于紐約召开代表大会的期間，这个工会和联合电气工人工会的代表之間举行了談判。联合电气工人工会主席費茨热拉德后来在代表大会上宣称，考虑到談判的結果，兩個工会之間將建立比过去更加密切的合作。他又說，我們已决定协同工作，以使用統一战綫来与那些企圖消灭我們的势力相对抗。开采工人工会主席克拉克也对代表大会着重指出，应当注意的基本事实就是必須学会与其他工会會員在和双方利益都有關的問題上共同进行工作。

此外，进步工会的努力并不仅仅在于扩大和巩固它們之間的相互关系。1952年9月，西海岸碼頭工人工会的領導提議恢复在三十年代所存在的太平洋海洋运输工会联合会。建議規定，一切在太平洋航綫的海船和港口工作的工

人工會都聯合在這個聯合會里，在各個工會保持內部獨立的條件下消除它們之間的競爭，確定簽訂集體合同的一般期限，以共同行動來捍衛大家的權利和利益。進步的聯合電氣工人工會提出了一項類似的建議，即關於聯合着電氣和無綫電工業工人的所有十六個工會協同行動來對降低羣眾生活水平和企業主現在所實行的意味着大大加強剝削勞動者的各種措施進行鬥爭的建議。

根據進步的工會活動家的倡議，在美國各個大城市開始建立了聯合的工會行動委員會，參加委員會的既有進步工會的代​​表，又有產聯和勞聯的工會的地方組織的代​​表。1951年，已有十五個大城市有了這樣的委員會。這些委員會中最積極的是代表着約十五萬會員的一百多個工會組織的紐約委員會，和領導着三十個基層組織的舊金山的北加利福尼亞委員會。

工人羣眾向往着自己隊伍的團結，他們力圖以工人階級的統一戰綫來與壟斷組織的進攻相對抗；這種向往和意圖非常強烈，甚至不僅在進步工會的活動中，而且在勞聯和產聯所屬的工會的活動中都反映出來了。1953年5月，產聯所屬靴鞋工人工會的代​​表大會通過了號召各個工會“經常表現認真的團結精神”的決議。勞聯所屬的旅館和餐廳工人工會主席雨果·恩斯特也主張“廣泛的工會同盟”。1954年2月，總共代表着二十萬以上工人的二十個石油工人工會的代​​表，在費列得菲亞舉行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把這些分散的組織合併為統一的總工會的決議。商業工作人員的許多工會正在準備聯合起來。勞聯和產聯所屬的肉類罐頭工人工會也密切地進行合作。產聯最大的工會——汽車工人工會與勞聯所屬的機器工人工會（它的許多會員也

在飞机制造厂做工)彼此之間簽訂了互助合作的協議。

無論是从劳联的領袖，或是产联的領袖方面看来，他們在1952年底所作的关于准备把他們所領導的組織联合起来，并在美国建立統一的工会中心的声明，当然都是口是心非的。但是，这些声明还是有代表性的。劳联和产联在声明以后的談判、它們关于互相放弃“侵襲”的協議(1954年6月已由参加这两个工会中心的大多数部門工会批准)証明，甚至反动的工会領袖也不得不考虑到工人要求統一的情緒。

正如美国工人运动史上不止一次有过的情形一样，工人运动的左翼所提出的思想总会深入到工人的意識中去，因而也在这些思想的敌人所領導的工会队伍中受到欢迎。

进步工会及其口号和策略的影响，在反动分子所領導的許多工会里清楚地表现出来。这些工会包括：联合矿工工会(在1950年煤矿工人总罢工时期，这个工会里的进步傾向表現得十分明显)；劳联所屬的刷牆工人工会、旅館和餐厅工人工会以及1953年底被劳联开除的东海岸碼頭工人工会；产联所屬的鋼鐵工人工会、汽車工人工会、肉类罐頭工人工会、海員工会和运输工人工会。

其中有几个工会(东海岸碼頭工人工会、海員工会、运输工人工会)建立了普通会员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进行着反对工会領導集团的反动政策的斗争。在刷牆工人工会、旅館和餐厅工人工会、肉类罐頭工人工会和飞机工人工会里，进步的傾向在許多地方分会里占据优势。特別應該指出汽車工人工会第六百地方分会，这个工会中最大的一个地方組織，联合着近六万名福特工厂的工人。

在第六百地方分会的領導中間，进步傾向不仅占据优

勢，而且还得到分会主席和其他中的右派分子的正式支持。后者还在不久以前，即1951年以前，都是支持工会主席反动分子路德的，但是现在，他们害怕丧失对工人的影响，迫不得已采取另外一种态度。福特工厂工会组织中的情况使路德集团如此焦虑不安，以致他们赶紧唆使“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来反对第六〇〇地方分会。当“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遭到工人的坚决反击不得不匆忙避开的时候，路德在工厂管理当局的协助下，竭力从第六〇〇地方分会领导中排除了不驯服的活动家，委任了自己的代理人来代替他们。但是，工人们坚决抗议。路德只得同意用选举的办法来解决福特企业中的工会领导的成员问题。路德在选举中遭到了彻底失败，他所委派的人也不得不离开这个地方分会。

在福特工厂里发生的鲜明地反映了数万工人情绪的事件，再一次证明了美国劳动群众和他们的工会的反动领袖之间对抗性的尖锐化，证明了工人阶级的积极性，证明了工人对分裂分子的憎恨和对统一的向往，证明了工人队伍中进步力量的增长和巩固。1951年底在辛辛那提(俄亥俄州)的代表大会上全国黑人劳工理事会的成立，也是一件大事，它反映了人们对统一的向往和进步力量信心的日益增长。

理事会联合着黑人——工会会员，依靠着捍卫黑人权利的、坚决反对美国野蛮的种族歧视的进步工会和工会组织的支持。理事会是在白种工人和有色工人为保证黑人与白人有同等获得工作机会、同等工资和同等劳动条件而共同斗争这一纲领的基础上成立的。地方的黑人劳工理事会的数量的迅速增长，它们的行动与全国理事会协同一致，证明了这种斗争的顺利发展。1951年，全国约有二十个这样的地方理事会。1952年11月，即在克利夫兰(俄亥俄州)召

开全国黑人劳工理事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地方理事会已有三十五个。

为了正确地评价号召成立全国黑人劳工理事会的运动，必须估计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里黑人工人的比重在企业中，特别是战时军火生产的最重要中心的密执安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增長。由于许多大企业从北部各州迁到南部各州（这里在美国侵略朝鲜期间建立了为数众多的工厂，主要是具有军事意义的工厂），所以黑人在美国工业中的作用现在还在继续增长。许多次罢工的經驗证明，作为工人阶级最受压迫的組成部分的代表，黑人是美国无产阶级一支积极的和具有战斗力的部队。总之，黑人工人正在日益成为美国黑人民族解放斗争的最重要的动力。

統一的思想在美国工人的意識中日益成熟。它掌握着工人阶级越来越多的广大群众，正在为自己开辟一条歷經无数障碍的道路，战胜着法庭—警察恐怖、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和政治影响以及美国工会运动反动上层中分裂分子的拚命反抗。国际工人团结、国际工会統一的思想影响，尽管有一切障碍，也在美国工人群众中增长起来。世界工会联合会积极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和经济权利的斗争，在美国产生了日益深刻的印象。“这一斗争經驗在美国工人中喚醒了这样一种意識：只有由勇敢的、坚决的和久經考驗的领导人所领导的统一的国际工人运动，才是劳动者和全体人民对自己的敌人进行有效的斗争和取得胜利的保証。”这是美国国际毛皮工人工会在1953年底給世界工会联合会的信中所說的話。

自从产联反动的领导人背信弃义地与世界工联断絕关系以来，美国的进步工会曾不止一次地力图恢复已遭分裂

分子所破坏的国际联系。我們可以指出西海岸碼頭工人工会与全国海船厨师侍者工会参加了海員、碼頭工人工会国际——世界工联产业部——的活动。我們可以举出国际毛皮工人工会参加了相应的国际联合組織的工作。国际毛皮工人工会曾經企圖派代表团参加世界工会联合会于1953年10月在維也納召开的第三届世界工会代表大会，但是代表們沒有領到护照。他們只得寄去一封信，在信中声明自己和會議参加者（共有七十九个国家八千八百六十万劳动者的代表出席这次會議）是团结一致的。在这封祝賀世界工联的活动并表示深信美国工会很快便会参加活动的信中，不仅可以听到美国工人的先进部分的呼声，而且也反映出掌握着越来越多的劳动群众的情緒。

但是，美国工人階級在爭取統一的斗争中要力求加以解决的任务是什么呢？这些任务已由美国共产党和坚决为解决这些任务而斗争的进步工会闡述得十分清楚。工人們，不管他們属于哪个工会，在捍衛他們的民主权利、防止实际工資进一步降低和压榨血汗的剝削制度进一步加强与扩大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是工人的統一、自下而上的統一的綱領的基础。

这种維護实际工資和反对血汗制度的斗争，正是属于不同工会的有色冶金工人1951年联盟罢工發劲和二十二个石油工人工会1952年联盟罢工的基础。正是工人們对团结自己的队伍来共同反对血汗制度的不可遏止的愿望，迫使福特工厂工会組織领导集团的右翼分子与路德断絕关系，轉而同左翼合作，并支持左翼所提出的进步的要求。

反对剝削和反对降低群众生活水平的坚决斗争，在美国工人运动中越来越經常地与捍衛無产階級的工会权利和

一般民主权利結合在一起。进步力量所提出的廢除反动的反劳工法的要求，由于麦卡錫主义的濁浪氾濫全国和对劳动者一切民主权利的威胁加剧，而在美国受到日益增長的欢迎。紐約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在1952年11月給所有工会組織的領導人的信中着重指出：“工会的数千會員都决心和渴望联合在捍衛工会权利的总綱領的周圍。”联合电气工人工会主席費茨热拉德1954年8月在紐約群众大会上發言时說，現在爭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与五年前进步工会被开除出产联的时候的斗争規模相比，“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运动和越来越多的人在进行斗争”。共产党人和进步工会在美国也和在其他国家一样，高举着已被資产階級抛弃在一边的民主自由的旗帜。他們的口号号召工人階級队伍团結起来，把其他怀有民主情緒的劳动者与小資产階級分子团結在工人階級的周圍。

美国工人階級和保衛和平运动

爭取和平、爭取和平解决一切国际争端和爭取資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和平共处的斗争，在美国共产党和进步工会的活动中占据显著的地位。常常在某种程度上同工人階級有联系的其他許多社会团体也在美国进行着保衛和平和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斗争。

这些組織是在不同時間、根据不同原因和动机而产生的。其中有些組織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存在，或是在战争时期出現的。有些組織是在战后国际緊張局势普遍加剧的影响下产生的。另外一些組織的成立則是对惡毒的“杜魯門主义”、对侵略性的北大西洋公約的簽訂、对美国在朝鮮的侵略的回击。还有一些組織是由于全世界保衛和

平运动的扩大而产生的。这些組織的成員也并不是清一色的。它們联合着工人、職員、农民、知識分子、科学家和艺术家、家庭主妇、白人和黑人以及具有不同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人們。但是，这些組織中每一个組織的生命力和積極性首先取决于它們从工人运动方面取得的支持的程度。

这些組織，也和进步工会一样，都遭到法院、警察、“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和其他这一类的委员会的殘酷迫害。

在所談到的这些組織中，首先应当指出于1948年在共产党和进步工会的支持下、在保罗·罗伯遜和全国海船厨师侍者工会主席海尤·布莱遜的積極参加下成立的进步党。按其結構來說，进步党是不同政治組織的联盟。这些組織中有在自己的活动中依靠紐約州許多城市里几十个政治俱乐部的美国劳工党；加利福尼亚州和伊利諾斯州的进步党組織拥有大量的政治俱乐部。前面已提到过的1953年中期美国共产党全国代表會議的报告曾經指出：“进步党首先是一个和平的政党，是一个得到工人階級和黑人的先进团体支持的統一战綫的政党。無論是在1948年，或是在1952年，它在全国竞选中所提出的候选人的名單，都是唯一表达国内先进力量的意願的。这种意願就是爭取和平、反对战争計劃和反对兩大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譯者）所提出的候选人。因此，尽管它有許多弱点，进步党还是在爭取和平的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并且今后仍將起重大作用……”^①

在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后的头几年里，除了进步党以外，还雨后春笋般地出現了其他許多反对华尔街冒

^① 見安德魯·史蒂文斯“在爭取和平和民主斗争的新时机”，紐約，1953年版，第77頁。

險的對外政策的組織，其中包括1946年在許多工會積極參加下成立起來的民權保障大會和藝術、科學及自由職業工作者全國委員會。參加這一委員會的有許多著名的學者以及像保羅·羅伯遜、阿爾貝特·堪恩這樣一些因接近工人運動而聞名的演員、作家和政論家。應當特別指出，1943年成立的美蘇友好協會總會正在進行着反對華盛頓侵略的對外政策、爭取美蘇和平合作的鬥爭。它在給美國勞動居民介紹蘇維埃國家、在揭露反動報刊和無線電的反蘇誹謗宣傳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民主遠東政策委員會的活動是在保衛和平、首先是保衛太平洋和平的綱領的基礎上在美國開展起來的。主要聯合着工會代表以及學者和文化工作者的民主遠東政策委員會，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和貿易關係，為給人民中國在聯合國中應有的合法地位、把現在仍毫無理由竊據着聯合國席位的業已破產的國民黨匪幫的代表驅逐出聯合國而進行了鬥爭。我們還須指出，1936—1939年的西班牙國內戰爭結束以後，在美國建立了反法西斯流亡者聯合委員會，它依靠着工人的支持，動員社會輿論反對華爾街利用法西斯西班牙與西德復仇主義者作為北大西洋侵略集團的實際參加者的計劃。

上面所說的保衛和平的組織的活動，也和美国保衛和平運動一樣，在1949年（當時第一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正在巴黎—布拉格召開）初次極顯著地積極起來，並具有明確的目的性。美國的先進工人和國內一切進步力量，也像響應當時蘇聯政府所提出的關於各大國之間締結和平公約的建議一樣，熱烈地響應了大會的號召。

美国共产党支持苏联关于締結和平公約的建議。它并号召人民要求政府放弃1949年4月在華盛頓簽訂的侵略性的北大西洋公約。共产党总書記尤金·丹尼斯着重指出，参加这个公約，就会推动美国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采取敌对政策，准备侵略战争，而“这些行动归根到底只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如上面業已指出的，进步的工会全都采取了这样的立場。一切进步的社会团体也都采取了这种立場。例如，其中有一个团体所發表的宣言中說：美国政府在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暴露了自己是新的、更加可怕的世界战争的主要鼓吹者。

憤怒抗議北大西洋公約的決議和要求締結和平公約的信件和电报紛紛寄到白宮。1949年群众性的五一示威游行，具有反对北大西洋侵略集团、爭取締結和平公約的示威性質。在1949年春夏期間，共产党、进步工会和其他进步組織所召开的二百多次人数众多的群众大会的参加者，都要求通过同苏联和平协商的办法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国际問題。可是，正如美国进步的工会活动家杜納德·汉德遜在巴黎世界保衛和平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五十二个美国代表，其中包括十八个工会代表）上發言时說的，“这种斗争在美国不过刚开始”。

1949年6月，进步工会組織了華盛頓进军，三千名进军的参加者把有数十万工人签名的、要求美国放弃北大西洋軍事同盟的請願書送到了首都。寻求和平方法代替大西洋公約来解决国际爭端的委员会7月間在芝加哥成立了。既有进步工会、又有劳联和产联所屬工会以及铁路工人工会的許多地方組織的普通会员代表参加的代表會議，10月間也在芝加哥举行了。

在代表會議(一千二百名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上成立了一個經常性的組織——全國勞工和平會議。它根據禁止原子武器、通過各大國之間和平協商的方法解決國際爭端和發展各民族之間友好的商務關係的要求，給自己確定了為保衛和平而鬥爭的任務。

這些口號的影響以及全國勞工和平會議的聲望開始增長。勞工和平會議的地方組織——勞工和平委員會——不僅在芝加哥，而且在其他許多工業城市(底特律、克利夫蘭、舊金山、洛杉磯、費列得菲亞、波士頓、紐約、米爾俄基和明尼阿波利斯等地也出現了。1950年1月杜魯門頒布的關於開始製造超級氫彈的挑釁性的命令，激起了國內勞動居民新的憤怒抗議的洪流。

1950年3月發生了大大推動世界各國(包括美國在內)保衛和平運動進一步發展的事件。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保衛和平大會常設委員會執行局會議，向各國人民和政府發出要求無條件地禁止原子武器的宣言。宣言建議把首先使用原子武器來對付別的地方的政府的政府視作戰爭罪犯。常設委員會號召全世界一切渴望和平的人們，不分他們的政治信念和宗教信仰，都在宣言上簽名，以使宣言具有全人類對侵略者發出的警告的性質。

斯德哥爾摩宣言鼓舞了各大洲千百萬人民，在美國也產生了深刻的印象。1950年4月，在保衛和平運動和黑人民族解放運動的著名活動家杜布依斯教授的領導下，保衛和平宣傳站在紐約成立了。宣傳站領導着美國征集斯德哥爾摩宣言的簽名運動。各州相繼成立了數百個以征集簽名和保衛和平為目的的委員會。全國勞工和平會議組織了二百多個車間和工廠的委員會。美國共產黨全國委員會書記

盖斯·霍尔指出，征集斯德哥尔摩宣言的签名运动的开始，标志着争取和平运动的发展前进了一步。他强调说，这个运动“中止了和平的敌人用以包围运动的缄默抵制”。

当1950年6月美国开始侵略朝鲜的时候，美国统治集团指望利用已形成的局势、它们所煽动起来的战争歇斯底里和沙文主义的狂热来压制保卫和平运动。征集斯德哥尔摩宣言签名的人开始遭到逮捕。他们被罚款和解除工作。反动报刊要求政府严厉地镇压他们。虽然如此，到1950年11月已有二百五十万美国人在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了名。

共产党、进步工会和其他进步组织从一开始就正确地评述了美国在朝鲜的干涉，谴责它是美国帝国主义对捍卫着自己民族独立的朝鲜人民的强盗般的进攻。早在6月29日，美国共产党在它发表的呼吁书中就号召国内一切正直人士要求政府从远东撤回美国武装部队。7月7日，狄波纳(密执安州)福特工厂的工人写信给国会内该州的议员范登堡，要求美国停止在朝鲜的干涉行动。进步的联合电气工人工会、国际开采冶炼工人工会、西海岸码头和仓库工人工会、全国海船厨师侍者工会发出了同样的呼吁。全国劳工和平会议也要求美国终止在东亚的侵略行动。在进步组织所召开的一切集会和群众大会上都可以响亮地听到“不许干涉朝鲜！”的口号。

1950年8月2日，在这些口号下，于纽约举行了由保卫和平宣传站和全国劳工和平会议纽约委员会所组织的数千人的示威游行。示威游行遭到了大队警察的进攻。骑警残酷地殴打他们和乘马践踏他们。凶暴的警察迫害只是加强了人民反对美国干涉朝鲜的运动。在8月2日事件的直接影响下，过了一个星期以后，新的进步组织——美国妇女

保衛和平委員會在紐約成立了。領導這個委員會的是著名的女社會活動家、紐約醫師克萊門蒂娜·巴奧朗。10月24日，約有一千名婦女——新組織的會員前往紐約聯合國總部，要求調解朝鮮的衝突，以利緩和國際緊張局勢。

華沙第二次世界保衛和平大會(1950年11月)和柏林世界和平理事會第一次會議(1951年2月)开辟了全世界保衛和平運動發展的新階段，并把反對西德重新軍國主義化和保衛朝鮮人民的鬥爭任務提到首要地位。在世界和平理事會(參加理事會的有：保羅·羅伯遜、杜布依斯教授和其他著名的美國社會活動家)中有着自己的廣泛代表的美國進步組織，使自己反對復活德國軍國主義、首先是反對美國侵略朝鮮的努力更加積極起來。

1951年春，進步的美國西海岸碼頭和倉庫工人工會的代表大會在其通過的有關國際問題的決議中提出了下列幾點要求：

1. 普遍裁減軍備，停止軍備競賽；
2. 承認社會制度和政體不同的國家有和平共處的可能；擴大一切國家之間的貿易；
3. 反對重新武裝西德和日本；
4. 決不派遣美國士兵去印度支那、台灣、馬來亞、印度尼西亞或去援助菲律賓地主；
5. 立即停止朝鮮戰爭和立即把一切外國軍隊撤出朝鮮；為了實現遠東和平而舉行談判。

立即停止朝鮮戰爭！——這是1951年6月在芝加哥召開的群眾性的人民保衛和平大會一切演說和決議的基本思想。全國四十八州的將近五千名代表出席了這次大會。其中至少有二千名代表是代表着進步工會及產聯和勞聯的許

多基層組織的。

在芝加哥召开的**人民保衛和平大会**一致支持苏联代表在联合国提出的关于停止在朝鮮的軍事行动和和平解决朝鮮問題的建議。

1952年召开的进步的**国际毛皮工人工会**、**联合电气工人工会**和**国际开采冶煉工人工会**的代表大会，相繼通过了要求恢复朝鮮和平、召开关于緩和**国际緊張局势問題**的**五大国会議**（毛皮工人代表大会）、恢复和平經濟和“消除阻碍發展美国和世界一切其他国家之間和平繁荣貿易的壁壘”（电气工人代表大会）等項決議。1952年12月，联合电气工人工会主席代表組織在这个工会里的三十万工人写信給杜魯門总统，要求立即停止在朝鮮的軍事行动，并火速从朝鮮撤退美国士兵。

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在1952年底發表的宣言着重指出，还在1950年中期，“共产党便在战争歇斯底里的情况下，不顧殘酷的迫害，勇敢地譴責这个战争（朝鮮战争——作者）是反动的并和美国人民的利益相抵触的。今天这种正确的立場正为絕大多数吸取了慘痛經驗的人民所贊許，他們同意朝鮮战争……是对我們民族昌盛和全世界和平的威胁”。①

“联合矿工新聞”杂志——联合矿工工会的机关刊物——在1952年底写道，結束朝鮮战争乃是美国劳动者首要的願望。1953年初刊登在“劳工报”——铁路工人工会领导集团的机关报——上的許多文章也都証明了这一点，几乎美国工会官僚中最反动的分子也不得不顧虑工人群众的这

① 見1953年10月24日苏联“真理报”。

种情緒。1952年在大西洋航綫海員中間所进行的投票也說明了这一点，这次投票得出了十分明显的結果：百分之八十八的选票表示拥护在朝鮮立即实现和平。还必须指出这样的事实：1952年秋在斯普林腓特(伊利諾斯州)在“救救我們的孩子”的口号下召开了在朝鮮作战的美国士兵的父母和亲屬代表會議。

当然，渴望和平和为和平而积极斗争的程度，在各国并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正如美国进步杂志“政治事务”在1952年9月所正确地强调指出的，美国的保卫和平运动“比起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来是相当薄弱的”。杂志在说明这种落后状况时写道，美国工人阶级受到了右翼社会党和反动的工会领袖的重大影响，因此它还不能像西欧各国无产阶级那样大规模地、有组织地和自觉地参加争取和平的斗争。可是，“政治事务”杂志指出，“美国的保卫和平运动虽然相当薄弱，但将继续在日益增长的程度对争取和平的(国际)斗争作出重大贡献”。杂志指出了美国工人日益增长的战斗精神和不断提高的觉悟，指出“人民反对朝鲜战争的情緒是过去民族的历史上无可相比的”。

在1947—1948年，“某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力量的呼声，当然除了左翼的呼声以外，是和平阵营中最响亮的呼声……现在争取和平的斗争的特点开始表现为，右翼所领导的工会里的工人阶级广大阶层……都主张争取和平……这就意味着，在确立工人阶级在这一斗争中的领导……方面已经首次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1953年中期召开的美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人关于美国保卫和平运动发展中的现阶段的情况就是这样说的。

要求停止在朝鮮的軍事行动——最近三年来保卫和平

运动的最重要的口号之一——始終在全国人民群众中享有声望，并且越来越得人心。这个要求得到了美国工人和全体劳动者的日益广泛而又积极的支持。1953年3月，紐約的許多基層工会組織派遣代表团向联合国秘書处遞送了声明，声明中迫切地呼吁“結束朝鮮的流血战争”。华盛顿接到了許多信件，用一个評論家的話來說，这些信件都开始“表示愤怒的心情”，并提到“千百万妇女……之所以投票选举艾森豪威尔將軍，是因为他說过要結束战争（朝鮮战争——作者），并讓我們的孩子返家……”（“紐約邮报”所引用的一封信中这样說）。

甚至首要的反动工会領袖的發言和反动分子所领导的最大工会和工会联合組織的正式文件也都肯定地說，1952—1953年反对朝鮮战争的运动在美国具有巨大的規模和群众性。例如，1952年12月产联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決議着重指出，“現在大多数人民都認為”美国武装部队侵略朝鮮“是失去理性的”。1953年3月，产联中最大的工会汽車工人工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決議宣称，代表大会的代表“不同意那些主張侵犯朝鮮和扩大对中国战争的狂妄的軍事冒險家”。我們还可以回想一下产联所屬肉类罐頭工人工会的領導集团所發表的刊登在工会机关刊物“肉类包裝工人”1953年5月号上的宣言。

虽然，宣言的作者决不是拥护进步观点的人，但是他們却指出，他們認為在保衛和平的問題上保持中立和仍旧把自己的活动仅限于經濟問題是不可能的了。宣言中說道：“當我們生活在原子彈和氫彈的陰影下的时候，當我們被从我們的家里直接送到朝鮮戰場、并遭致过早的死亡的时候，當扩大軍事生产和为战争机器的撥款征收高额的稅賦几乎

吞去我們全部工資的時候，我們還在這方面努力，会有什么好处呢……”^①

这几句話，無疑地反映了美国千百万工人意識中所發生的重大的变化。历来的傳統的工联主义世界觀及其政治“中立”和对工人运动的任务所抱的狹隘的“單純經濟”观点，开始遭到許多事件的無情打击。朝鮮战争十分令人信服地說明：保衛和平决不是抽象的問題，而是直接关系到美国劳动居民利益的切身問題。

1953年7月27日在板門店簽訂的停战協定是和平力量在国际範圍內的胜利。它也是美国和平力量的胜利。1954年7月21日在日内瓦达成的关于停止印度支那軍事行动的協定，也正是和平力量不仅在国际範圍內、而且也是在美国的胜利。

美国帝国主义把印度支那变成“朝鮮第二”的企圖也遭到了虽然是非正式的、但無疑是来自美国居民方面的广泛而又群众性的反对。国务院的傳声筒、华盛顿一份周刊“美国新聞与世界报道”在1954年5月坦率地說出这一点。这个杂志在引用社会輿論研究所在居民中間所举行的測驗的材料时指出，百分之八十五的美国人都反对把美国軍隊派往印度支那。这个杂志写道，有一个參議院委員會的主席說过，“写信給他的人中有百分之九十九要求不再讓美国人参加像朝鮮和印度支那那样的亞洲战争”。

劳联所屬屠宰工人工会反对派遣美国軍隊参加对越南人民的殖民战争。联合着福特工厂工人的汽車工人工会中最大的分会反对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武裝干涉。縫紉工人工

^① 見“肉類包裝工人”，1953年5月号。

会一个領袖在1954年5月这个工会的代表大会上的演說中批評了华盛顿的对外政策。值得注意的是，他要求美国放弃“原子彈—氫彈外交”。他說：“我們应当进行协商和利用更加文明的外交方式。”1954年上半年，紡織工人工会、肉类罐頭工人工会、国际毛皮工人工会的代表大会以及联合矿工工会的机关刊物“联合矿工新聞”，都表露了同样的要求。所有上述工会，除了一个工会（国际毛皮工人工会）以外，都是由反动分子领导的。这些工会迫不得已發表的反映着工人群众的情緒和压力的言論，是更加可以作为例証的。

1954年5月威廉·福斯特在英国工人刊物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国拥护和平的情緒，虽然基本上还是缺乏领导的、無組織的和未定型的，但是仍代表着一种巨大的潜在力量。”他着重指出：“美国的工人階級現在正进入政治覺醒和斗争的时期，这种斗争会引起、而且無疑地正引起深远的后果。逐步的群众性的左傾化正在發生，不过速度暂时还是緩和的。”①

美国工人群众不仅反对在远东的軍事冒险，而且也主張禁止原子彈和氫彈。

进步力量的代表所提出的其他一些要求同样得到了美国工人的越来越多的支持。反对西德建立以希特勒时代的將軍为领导的复仇主义者軍隊、反对复活日本軍国主义、爭取和平解决国际爭端和消除妨害發展世界貿易的障碍，——所有这一切进步力量的綱領，在美国享有日益增長的声誉。这些条款甚至已反映在以反动领导集团领导的工会所通过的決議中，反映在产联所屬縫紉工人工会、肉类罐頭

① 見“劳工月刊”（倫敦），1954年5月号。

工人工会，劳联所屬旅館和餐厅工人工会、屠宰工人工会的領袖的言論中。主張談判和改善与苏联关系的言論也在美国工人群众中受到欢迎。

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在給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賀詞中強調指出：“美国人民基本群众希望和平，并誠懇地願同苏联建立友好合作。”

帝国主义者現在不容易驅使不久以前業已認識到流血的軍事行动的全部重負的人民去进行新的世界大戰。人民群众越清楚地認識到現代的希特勒繼承者——大西洋彼岸企圖統治世界的人——威胁着全人类的重大危險，就会越加積極地反对新战争的挑撥者，越加坚决地要求同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密切合作。美国在这方面并不例外。苏联的和平和国际合作的政策，得到千百万美国人的同情。毫無疑問，美国的工人階級和劳动者將更清楚地理解到苏联的利益是和全世界和平事業分不开的，从而也是和美国劳动人民的利益分不开的。

譯 后 記

這本書簡要地介紹了美國工人運動和工會運動的發生、發展的历史，論述了从1945年至1954年这一时期美國工人階級的經濟斗争和政治斗争，以及美國工會的活动和工會运动中兩種傾向的斗争。而从1955年以来，美國的工會运动和工人的罢工斗争已有重大的發展，現就这方面的情况作概略的介紹，以供讀者参考。

* * *

1955年美國工會运动有着重大的發展。在这一年，美國工人要求工會內部團結、要求消除分裂和对立狀況的斗争获得輝煌的成就。美國兩個最大的工會——美國勞工联合会和產業工會联合会——在12月5日正式宣布合并成为一个統一的組織，名为“美國勞工联合会和產業工會联合会”，簡称“勞联—产联”。这个組織拥有一百四十多个全国性工會，約有一千五百四十万會員，占美國全国参加工會組織的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八左右。这个組織的建立結束了二十年来兩大工會的分裂和对立状态，將对美國工人运动的發展，对美國政治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勞联和产联的合并是符合于美國工人階級的利益的。正如美國共产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威廉·福斯特所指出的：这个合并將使美國有組織的勞工成为一支大大增强了的潜在力量。福斯特号召美國工人热烈地支持这个合并，爭取

进步的綱領……，同时在工会組織內部为民主的制度展开斗争。

劳联和产联合并后的重要成就之一是成立了产业工会部，并在章程中承認了按产业形式建立工会的原则。

劳联和产联合并后的另一重要成就是美国工人团结的加强，这表现为白种工人和黑人工人之間团结的加强。黑人偷道夫和堂遜德当选为劳联—产联执行委员会的副主席。黑人被选进全国性的工会联合会的领导机构，这在美国工会运动史上还是第一次。

* * *

美国工会运动中的右翼领袖过去一贯是资产阶级在工会运动中的代理人，是美国侵略政策的热烈的鼓吹者。他们背叛工人阶级利益的行动，给美国工会运动带来了重大的损害。但是，也应当指出，这些右翼工会领袖与美国统治阶级之間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矛盾，特别是近两年来在“万隆精神”的影响下和在广大工人群众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考虑到自己的言行，甚至这些曾经支持过美国侵略政策的工会领袖們也对美国统治集团的“冷战”政策公开地表示不满。例如，劳联—产联副主席华德·路德 1956 年 4 月访问印度的时候，在记者招待会上曾表示支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并表示赞成裁军，希望伦敦裁军会议能达成某种可行的方案。

同年 5 月，路德在华盛顿举行的有三千代表参加的大会上，抨击共和党政府袒护大企业主，并且号召工会“集体”警告民主党：工会今后将不像过去那样无条件地支持它了。

* * *

一般說来，無論是劳联，或是产联，并非始終是反劳工法

的热烈的支持者。因为，它們十分清楚，它們对待反劳工法的态度，最容易在工人面前暴露自己真正的立場。正因为这样，劳联和产联对于反劳工的塔夫脱—哈特莱法也曾公开地表示反对。例如，产联主席华尔德·路德就曾公开宣称，塔夫脱—哈特莱法是“一項穷凶極惡的法律”，并主張加以廢止。1953年9月，劳联第七十二届代表大会，也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拒絕履行关于修改塔夫脱—哈特莱法的協議的行为，表示激烈反对。1956年4月，合并后的劳联—产联在广大工人群众的要求下，向国会提出了下列立法主張：減輕劳动人民的捐稅負擔，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加强失業救济，改善社会保險制度……，反对种族歧視以及修改反劳工的塔夫脱—哈特莱法。

* * *

近兩年來，美国罢工运动有所發展。根据美国官方的統計材料，1955年1—9月份，美国共發生了四千八百多次罢工和停工，比1954年同一时期多五百次。参加罢工的人有三百四十多万，比1954年同期多一百多万。有一些罢工的規模相当巨大。七月初举行的要求提高工資的鋼鐵業罢工有六十多万工人参加。8月底举行的汽車業罢工有十多万工人参加。虽然企業主和政府多方迫害和威胁，工人們在罢工中还是表現了頑强的斗争精神。在华盛顿举行的三千名电車和公共汽車司机的罢工坚持了五十三天。新英格蘭一万二千名紡織工人的罢工坚持了好几个月。甚至在工人运动比較薄弱的南方，罢工也坚持了数月之久。

1956年上半年，美国工人在要求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許多次罢工中，表現了不屈不撓的斗争精神。例如，在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四万四千工人的罢工中，尽管企業主履

用工賊来破坏罢工，警察也出来向工人糾察队襲击，但是电气工人在其他行業的弟兄的支持下坚持罢工一百五十六天，成为美国二十多年来有几万工人参加的坚持最久的一次罢工。在1—4月，西南六个州的邮电工人，巴尔的摩的公共汽車司机，紐約的卡車司机，西部十二个州的“西部航空公司”的工人和職員，紐約的梅西百貨公司的職員，底特律的牛奶工人，洛杉磯的建筑工人等先后都举行了罢工。

1956年11月16日，美国东海岸的六万名碼頭工人發动了在美国碼頭工人罢工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罢工，它使整个大西洋和墨西哥灣沿岸的航运陷于停頓。美国西海岸一万六千名碼頭工人在19日举行了二十四小时罢工，支持东海岸碼頭工人的大罢工。据美国工会报纸“劳工日报”的消息，根据初步材料，1956年美国一共發生罢工三千八百起，参加罢工的工人約有一百九十万。罢工的结果使美国損失了三千三百万个劳动日，約比1955年多損失五百万个劳动日。这一些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表明，美国工人阶级为捍衛自己的切身利益，正在更广泛地动用罢工的武器来反抗资本主义剝削制度。罢工的进程也表明了，工人阶级的团结更坚强了，而工人阶级的团结是取得重大胜利的保証。

美国工人团结的加强，美国罢工运动的高漲，毫無疑問，将会大大推动美国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进一步的發展。

繁凝、鄧生

1957年1月